《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李道生◉著

神秘怒江大峡谷历史文化丛书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

《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怒江调研

峡谷传人

原始之痕

峡谷深处的土司制

ISBN 7-5415-3152-9

9 787541 531521 >

定价: 9.50元

神秘怒江大峡谷历史文化丛书

《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李道生　编著

顾问

王仕宗

李四民

褚有本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李道生编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12

（神秘怒江大峡谷历史文化丛书；1）

ISBN 7-5415-3152-9

Ⅰ.山… Ⅱ.李… Ⅲ.历史地理—研究—云南省 Ⅳ.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9786号

责任编辑：黄　敏

封面设计：陈　旭

神秘怒江大峡谷历史文化丛书

《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李道生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22000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15-3152-9　定价：9.50元

作者简介

李道生，白族，1936年生，云南省剑川县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1950年参加工作后一直在怒江州工作。曾任福贡县人行行长、《怒江报》记者、怒江州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怒江州政协文史委主任、《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神奇怒江的大峡谷旅游文化丛书》等刊物主编。主编出版各种图书44部636万字，参编出版图书12部、440万字。致力于怒江民族历史资料的收集研究，发表作品200余件、140余万字；出版专著《片马烽火》、《片马风云》、《神秘怒江大峡谷历史文化丛书》等。参加《怒江州志》总纂《中共怒江地方史》编写。作品多次获奖。被评选为全国政协优秀文史工作者、云南省和怒江州文史先进工作者、怒江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事迹收录于《中国当代文艺家辞海》等多种词典。聘为美国海外文艺家协会客座教授、研究员。

古代神州何处寻（代序）

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的我国地理名著《山海经》，一向被认为难读。西汉时代的历史家司马迁曾看过此书；西汉末的刘秀（刘歆），东晋的郭璞，明代的王崇庆，清代的吴任臣、汪绂、毕沅、郝懿行和现代的鲁迅、闻一多、沈雁冰及今人袁珂先生等许多学者都对该书作过研究；我于1989年开始研究该书，认为该书是一部地理书，而不是神话书（书中确实记载有神话内容，但数量不多）。该书始作于大禹末年，它是根据《山海经图》写成的。《山海经图》是大禹末年绘制的一份以当时中国所在地的古昆仑山为中心的地理图。而《山海经》则是对该图中各图像（今称“地图符号”）的解释和说明（即“说词”）。我们从《山海经》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该书的绝大多数文字的确是《山海经图》上图像的说词。《山海经图》上所绘的图像是该图的制作者自由地设计而得，这些奇形怪状的图像不是实地上各个事物的真实形貌。《山海经图》上只有图像，这和现代地图上既绘有图像又注有文字注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一见解十分重要，因为它有力地打破了该书是记载“怪物”的书、是神话书的观点。

由于该书是根据《山海经图》写成的一部地理书，那么该书中所载的地理应实有其地，应该在今日的地面上找到相应的位置。对此，前人作了许多努力，但却没有能够找到。经过深入的研究和仔细的探索，我发现今日云南西部东经101°以西、北纬23°以北的横断山脉地区地形与《山海经》中所载的地理

相吻合。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该书所载的地理在今日实地上的相应位置。原来，《山海经图》是一份远古时代云南西部地区的地图；根据该地图写成的《山海经》的地理是远古时代云南西部地区的地理。研究表明，《山海经》记载的地理相当准确；同时还发现现今同一地点的地名和《山海经》中记载的地名相同或相近的尚有十余处之多。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经研究，该书中着重记载的昆仑山（昆仑丘或昆仑虚）在今日云南西部的纳溪河——达旦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之地。

该书是一部综合性的地理书，它在记载地理内容的同时，还记载了其他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该书集中地记载了我国历史黎明时期的炎帝、黄帝及尧、舜、禹等伟大人物的事迹，他们生活和活动在昆仑山上，死后即埋葬在那里。既然该书记载的地理是准确的、可靠的，其历史的记载也应该是准确可靠的，是信史。显然黄帝、大禹等人是实有其人，是历史人物而不是神话中的人物。这些人物活动的地方是远古时代的中国位置所在的标志。他们活动在昆仑山上，而这昆仑山是今日的云南西部地区；显然今日的云南西部地区是我们远古时代的中国的所在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化的原始发祥之地。我认为，探索远古时代的中国文明，只有到今日的云南西部地区去才能获得满意的成果。

我认为夏朝及其以前的中国是在今日的云南西部地区，成汤伐夏桀而夏亡；商朝初年的成汤之世经过大迁徙，中国的政治中心遂转移到今日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时距今约 3600 年的历史。我国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多为先秦和汉代的传说，多为随意的编造，多不可信，唯有《山海经》一书的记载才是可靠的。该书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我国远古时代的真实

信息。该书始作于大禹末年，它是我国古籍中之最古老者，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宝典。

《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一书，是我对《山海经》的研究成果。该书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一些报刊摘发了我的一些主要论点。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李道生同志对我研究《山海经》的工作很感兴趣，多年来多有文章发表，为我所著的《神州的发现》提供佐证，并有独到见解，对我的研究工作以积极支持和帮助，本人表示感谢。在李道生著《〈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编印出版之际，谨致祝贺，并以此文代为序。

扶永发于昆明

目　录

古代神州何处寻（代序）……………………………………（1）

《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1）

轩辕黄帝新探

——二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23）

大禹治水与滇西

——三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48）

西周国与福贡利沙底

——四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55）

北狄国与贡山丙中洛

——五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63）

远古神州与怒江大峡谷

——六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72）

白族与夏族的族源关系

——七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87）

白族他称“明家”探源

——八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98）

兰坪二五山“轩辕祠”巡礼

——九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107）

《山海经·大荒西经》试读

——十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112）

后记………………………………………………………………（159）

《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一、古代神州与“三江并流”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南边陲，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不过，这里曾被称为“蛮荒之地”。“蛮荒”者，不开化之谓也。新中国成立后，才为它抹去了层层雾罩，露出娟秀的倩影，令人刮目相看。而当2003年，它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时候，人们更是蜂拥而至，争相景仰它的风采。

它，就是“三江并流”地区。

“三江并流”在云南省西部东经101°以西、北纬23°以北的横断山脉地区，包括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经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简称迪庆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简称怒江州）、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简称大理州）、保山市以及楚雄彝族自治州（简称楚雄州）、临沧市的一部分。联合国列入“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区，则是特指迪庆、怒江、丽江三个州市境内“三江并流”区域，保护区面积有170万公顷。

“三江并流”地区，不仅有独特无偶的横断山脉特殊地貌构成的壮丽自然景观，还有二十几个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绚丽多姿的恢弘文化大势，使它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真可谓钟灵毓秀，令人叹为观止，不愧荣膺“世界自然遗产”的称号。

而更有甚者，“三江并流”，还有更大的历史奥秘，还待人

们探索，将她的面纱进一步揭开。这就是《山海经》与“三江并流”之间的依存关系。

“三江并流”的绝世之美，人们现在已经不会产生质疑。但人们对昨天还被称为“荒蛮之地”的“三江并流”地区也与《山海经》搭得上界，也许不好理解。

然而，历史，只唯其真，不唯其美。“三江并流”地区为什么与《山海经》搭得上界？本文根据古今的不同发现，也陈一管之见，作一探讨。

《山海经》是什么?《山海经》是一本中国古代的综合地理书。该书大约写于三千六百多年前的我国商朝之初，记载了商初以前远古中国的地理形制以及“五帝”事迹、物产资源等。据史家考证，《山海经》成书之前，先有了《山海经图》，图上用了一些图像符号作为地理标志。《山海经》则是《山海经图》的文字说明。一图一书对照读解，一幅远古中国地理图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一目了然。但是《山海经图》早已亡失，只留下《山海经》。这就使后人读《山海经》产生了许多困难，并且还因经文记载了奇形怪状的人和动植物（《山海经图》中的地理标志）而产生歧义和误解，被许多人当成神话小说、巫书，而不是地理古籍，就连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也认为它“不雅驯”而不予采用，却参照了不真实的古地理书，把中原地区当成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有的虽然把《山海经》看成地理书，但又与现在的中国地理相比照，不是对不上号，就是牵强附会，以讹传讹，都没有把《山海经》所记载的远古中国地理真实地指认出来，而有的还异想天开地把《山海经》说成是外国地理！

炎黄子孙，遍布全球。炎黄始祖，发源何地？全球所系，谁不牵挂？

“昆仑县圃，尻安何地?”远古中国的所在地昆仑山，今天它在哪里？早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天问》中，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到了西汉时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为了找到祖国远古的发祥地昆仑山，派出使者张骞去寻找，结果没有找到。后来张骞却在出使西域中，发现新疆塔里木河源头处有座喀喇昆仑山，《山海经》中又有“河出昆仑”的记载，汉武帝就把新疆这座喀喇昆仑山指定为远古中国所在地之昆仑山。“直至清乾隆皇帝的1900多年间，人们便一直以为黄河发源处的昆仑山是今日的喀喇昆仑山”，其实《山海经》所载的“河出昆仑”，指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而黄河的真正发源地在青海，并非新疆。因此，汉武帝这一指认，又成了“地理学上的一桩错案”。①

远古中国的地理方位、古昆仑山在哪里？始终是一个千古不解之谜。

即便如此，依史家所言，中原地区为中华民族发祥地，已然成了定论。

只是，探求者并未因此而却步。为了解开“千古之谜”，他们仍在苦苦跋涉，艰难求索，却也取得不少成果。

近代的章太炎先生所著《释种姓》曰：“文教之民，战胜之国，大抵起自海滨；独中夏王迹，基陇坻华山间，固已异势。”又云：“黄帝之起，宜在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间。北抵雍凉，则附羌；南抵滇黑水，则附髳。”按章氏说，中国华夏文化的鼻祖(“中夏王迹”)，发源于西北山区，而我国从西北(“北抵雍凉”)到云南(“南抵滇黑水”)这一区域即为中华文化

① 扶永发：《神州的发现》

之发源地。这就与华夏鼻祖及其文化发源于我国平原大地的中原地区的历史论定提出了挑战，而且第一次把云南列入华夏文化发源地的范围，这是一个很有创见的发现。至于章氏关于黄帝的起源地，要到“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间”去找之说，似乎荒唐，但从现在的科学发现看来，它也并非妄说，暂且留后再议。

现代的徐嘉瑞先生所著《大理古代文化史》也说：“夏民族文化，以甘肃、陕西、青海、川北、西康及云南大理一带为其发展之区域。”又云：“川滇边区，即越巂郡一带，以若水为中心（假定在会无县，即今易迷）。北抵汶川，及甘肃至成都，东至犍为，南抵滇国，西至叶榆，其中包括越巂昆明（即定筰，今盐源）、丽江、永北、元谋、武定，此一范围，为中国古代西北文明之中心。其影响所及，使此一范围内之文化，成一独立特殊之领域。”这里所谓“独立特殊之领域”，即指从西北到川滇，形成了一个夏民族的文化圈。它与章氏关于华夏文化起源于西北，发展于川滇之论如出一辙，而且在地域上作了明确界说。

师荔扉、王乐山两位先生也在此时提出了：禹的出生地石纽在丽江石鼓的观点。禹是我国的古代治水英雄、夏王朝的创始人，华人老幼皆知。关于禹的生世，据古本《竹书纪年》载：“颛顼之子鲧，生禹于石纽。”石纽在什么地方？据《蜀王本纪》、《三国志》、《华阳国志》所载，都言在四川北部的汶山。因此，师、王之说一出，就受到各方的非议和冷落，然而，它却像一声惊雷，把沉闷的学术空气多少震动了一下子。后来，扶永发的研究证明了师荔扉、王乐生两位先生关于禹出生于云南“三江并流”地区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历史进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地理制图工程师扶永发先

生，用地理学的方法研究、解析《山海经》，出版了惊世之作：《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简称《神州的发现》），（1992年1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了惊世之说。

扶永发说："远古时代的中国位于古昆仑山中，这古昆仑山是远古时代的中国的载体，把古昆仑山找到了，远古时代的中国位置也就找到了。""我从黑水人手来探索这昆仑山。""与古昆仑山相关的几条大河地理位置的确定，古昆仑山的范围与轮廓也就显现了出来。它，就是今日云南西部纳溪河（在宾川县境内）——达旦河（在永胜县境内）和毗雄河——苴力河（在弥渡、南涧二县境内）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的横断山脉地区。大致说来，今日东经101°以西、北纬23°以北的纵谷地区，是《山海经》所涉及的地理范围。"

扶永发对他的发现非常自信，并且断言："我们今天已经找到了古昆仑山是在云南西部的横断山脉地区，那么远古时代的中国也就在这一地区。今日云南西部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原始发祥地、是我们民族的摇篮和民族的根的所在。"

扶永发《神州的发现》已出版问世十四年，虽然和者尚少，而反对文章亦至今未见。和者之少，盖因扶氏之说如果成立，中国古代历史便要重新改写，这样事关重大的学术问题，令人考虑再三，而踌躇不决，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至今未见反驳之文，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扶氏神州发现的一家之说，以其确凿的地理根据、严密的科学论断，已足自圆其说。如果找不到相对的确凿的地理根据，没有相对的严密的科学论断，那么扶氏之说就难以推倒，而这种相对的根据和论断又不是任意就可以得来的。这也许就是至今未见驳文的原因吧。

正因为如此，扶永发神州发现之说问世后，被认为是《山海经》“千古之谜”的破译，和“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认为扶永发找到了真正的昆仑山——远古中国的载体，再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发源地的真正所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尊重科学，发展科学，给我国学术研究带来了空前繁荣的结果。

扶永发发现古昆仑山——远古中国的地理范围，为今日东经101°以西、北纬23°以北的横断山脉纵谷地区。这个范围，与“三江并流”地区的地理范围基本相同。这使人们对“三江并流”地区的地理历史和人文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就是说人们很需要了解，为什么一个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边远山区，原来却是中华民族及文化的“先发之地”，它有什么令人信服的根据呢？由于本人对扶氏之说的认同与向往，对此也作过十余年的学习和探索，小有收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就以联合国批准“三江并流”地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三个条件：生物多样性、特殊地理构成、丰富的民族文化为题，作如下的研究。

二、从考古学看神州发源地

从《山海经》写作时间看，《山海经》所记载的地理是距今三千六百多年前的远古中国地理。而《山海经》所记载的内容又包括了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历史，因此《山海经》记载的地理更应该是距今五千年前的远古中国地理。

作为远古中国地理载体的“三江并流”地区，它在五千年前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呢？我们只有从考古发现中进行探寻。

1965年，在云南中西部金沙江流域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境内发现了猿人化石，经古地磁法测定，绝对年代距今已

有170万年左右，为我国已知的最早人类。元谋人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序幕”。①

在此前后，滇西其他“三江并流”地区，也开展了大量考古活动，并取得了重大成就。据各种考古资料统计，“近15年来，滇西6地州发现古猿化石产地一处，旧石器遗址和人化石出土地点9处，新石器文化布点约300处（文化内涵清楚的遗址近50处），出土古猿、人类、动植物化石和石、骨、角、牙、蚌、竹、木质器物标本1万多件，陶器4万多件、片，石器制造场、房屋、灰坑、灶、墓葬、炼炉等遗迹数十项。这些发现使云南人类史前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在这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②

在这些滇西考古遗址中，怒江中下游一带发现的古迹址达100余处，著名的如保山羊邑出土的距今800～400万年前的古猿化石，施甸老虎洞出土的距今二三万年的旧石器，保山等地出土的距今7000至1万年前的“蒲缥人”、“姚关人”、“南姑坝人”化石，以及福贡发现的双肩石铲、梯形弧刃斧，碧江发现的磨光梯形石斧、石凿，泸水发现的磨制梯形石斧等。在澜沧江流域及澜沧江与金沙江中间一带地区，也有重大的考古文物遗址发现，著名的如距今3000多年前的剑川海门口的铜石并用文化遗址，3000多年前的祥云大波那铜棺墓；距今7000至4000多年前兰坪马鞍山新石器文化遗址和玉水坪新石器文化遗址等。2005年11月云南考古研究所对兰坪玉水坪新石器文化洞穴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在该洞穴新石器文化层以下，又出土发现了大批旧石器文物，有未经磨制的打制石片以及兽

① 汪宁生：《云南考古》
② 耿德铭：《哀牢文化研究》

牙、兽骨化石等。其年代较洞穴上层的新石器年代更为久远，属于新、旧石器时期文化分层并存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在金沙江流域，最著名的考古发现是，1960年在丽江漾弓江木家桥发现了三根人类股骨化石和1975年在同地发现人头骨化石一个，被考古部门命名为“丽江人”。“丽江人”是旧石器时代，继元谋人之后，在“三江并流”地区出现的古人类，考古专著指出：“丽江人应属于人类发展史上‘智人’阶段”。①

我们仅从上述概略的考古发现中也可以看出，滇西“三江并流”地区很早就有了人类生息活动。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创立了家园，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这块特殊的横断山脉家园，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原始生发之地。所谓“三江并流”地区是不开化的“蛮荒之地”，这里的民族都是从省外迁移来的，这里的文化都是从内地传进来的等等说法，在大量的考古实物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三、生物多样性的决定因素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使“三江并流”地区成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原始生发之地呢？我们认为，生存环境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它与“三江并流”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五千年前古人类的生活环境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从《山海经》等古籍记载及考古学发现中，仍然使我们能够得到远古时代人类生活的一些重要信息。

《山海经》以三分之二的篇幅记载了古中国境内400多座

---

① 汪宁生：《云南考古》

山（山岭）的方位、地形、地貌和物产资源，特别对每座山上生长的动物、植物种类及其功用，记载得十分具体。据我粗略计算，全书共记载了兽类129种，禽类79种，爬行动物类18种，水产类62种，各种植物37种。这些动植物的名称大多与现在的名称已经不同，但仍有一部分名称保存到现在，如兽类中的猩猩、猿猴、犀牛、大象、牦牛（野牛）、豪猪、猛豹、熊、罴、旄牛、麋鹿、虎、狼、野马、山驴、麂子、文马、狐、麝、羚；禽类中的布谷鸟、鹦鹉、山鸡、鹧鸪、翠鸟、斑鸠、鹊、枭；爬行动物类中的蛇、旋龟、反鼻虫；水产类中的鱼、蚌、螺、古蛙、水马；植物类中的桂树、山韭、山葱、山药、紫草、白芷、芍药、门冬、细辛等等。

据《山海经》记载，这些动植物被古人类广泛用于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医药保健，并因此产生信仰生物的拜物教，凭以征候天象，求吉避凶。《山海经》开篇“南山经”的第一段就这样写道：“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大意是，在中国西边的招摇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植物，蕴藏着丰富的金玉矿石。山中生长着一种叫祝余的草，人们吃了就能不怕饿；生长着一种叫迷谷的树，开出的花光芒照耀四方，人们把它佩戴在身上，走路就不会迷失方向；山中有一种叫狌狌的兽，像猿猴，人们吃了这种兽的肉，就可以健行；麂水河此山流出，河里生长着叫育沛的小动物，把它佩带在身边，人就不会生蛊胀病。类似这样的记载还很多，如衣食住行方面，人们吃了一种叫蚃蛙的兽肉，就能安寝，不

做恶梦；穿戴了一种叫鹿蜀兽的皮毛，就能子孙繁衍；乘坐了一种叫驺虞的兽，就能日行千里。医药方面，食用溪边兽的肉，可治黄疸病；领胡兽的肉，可治狂躁病；肥𧖣鸟的肉，可治恶疮；旋龟的肉，可治耳聋；豪鱼肉，可治白癣病。天象方面，鸾鸟出现，兆风调雨顺；鳋鱼出现，兆五谷丰登；鳍鱼出现，兆天下大旱，等等。

诚然，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古人是怎样利用动植物生活的，也无需我们来加以怎样的评说，但从这些记载里却能使我们感悟到一种强烈的信息，那就是《山海经》所记载的那个时代还处于原始社会，采集和狩猎是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人们依靠采集野菜，猎取禽兽，捕捞鱼虾生活，穿戴兽皮、树叶，以动物的出没征候天象、凶吉。人们对于自然生态所提供的生物资料，有如对阳光、空气、水一样，须臾不能离开。生物资料决定着人们的存亡。正因为如此，《山海经》才不厌其烦地对每座山川的动植物资源及其功能属性作了那样至详的记述。

既然自然生态动植物资料决定着生活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先民们的生存和命运，那么“三江并流”地区在远古时代能不能给人类提供必要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成为古人类能不能在这个地区生息繁衍、创造中华古代文明的决定性条件。

我们从考古出土文物中就可以看到，远古时代“三江并流”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概貌已经显现出来。

保山市博物馆陈列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出土文物，是目前滇西地区我见到的最完备的一处文物陈列。保山塘子沟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最为注目，这些文物中除有古人类化石和大量石器外，动物化石也占了很大部分。据著名考古学者耿德铭所著《哀牢文化研究》一书记载，塘子沟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中，有骨器 45 件，包括骨锥、骨针、

骨锹、骨饰品4类；角器71件，包括角铲、角矛头、角锥和角棒；牙器7件，均为熊犬齿制作的牙锥。动物化石标本1800余件，包括无脊椎动物、鱼类、鸟类、哺乳动物四纲的螺、蚌、蜗牛、鱼、鸟、短尾猴、叶猴、巨松鼠、霜北大鼯鼠、黑鼠、中华竹鼠、无颈鬃豪猪、豺、包氏大熊猫、西藏黑熊、棕熊、黄喉貂、猪獾、小爪水獭、花面狸、大灵猫、小灵猫、金钱豹、虎、孟加拉虎、爪哇犀、野猪、小麂、赤麂、水鹿、毛冠鹿、青羊、圣氏水牛、犏牛等。在“三江并流”的其他旧、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中，也有类似怒江塘子沟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发现，其中兰坪等地还发现剑齿象、马、獐、羊等动物化石。

这些动物化石再现了远古时代“三江并流”地区拥有的广袤的植物、丰盈的水域、茂盛的动物资源。这在今天“三江并流”的动植物分布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我们仅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的动植物资源为例：经过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和植物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多次实地考察发现，在怒江州1470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知的高等植物有200多科，680余属，3000多种。其中裸子植物有4科，占世界裸子植物科的三分之一。这些植物中，属国家级保护植物的有42种，其中一级保护植物中有二亿三千万年前的孑遗种桫椤等。食用植物有70余种，包括蕨菜、野菜、竹叶菜、山药、黄精、地衣、树衣、松茸、羊肚菌、猴头菌、香菇、金耳、银耳、牛干菌等。据1988年普查，已知野生中药材有356种，总蕴藏量达9594484担。全州共有林地面积1000多万亩，森林覆盖面积达70%。怒江州的动物资源也极其丰富，据多次考查，已知脊椎动物有488种，其中鸟类284种（32种为中国保护候鸟，8种为世界濒危种），兽类128种，爬行类动物30种，两

栖类动物30种，鱼类44种。国家保护的动物有61种，其中一类保护动物20种，二类保护动物40余种。中国最珍贵稀有的动物戴帽叶猴、羚羊、赤斑羚、大鼯鼠、黑鹇、灰腹角雉等，主产于怒江州；濒危动物王锦蛇指名亚种、熊猴、滇金丝猴、中国穿山甲、云豹、印支虎、黑麝、菲氏麂、血雉、白腹锦鸡等55种也分布于怒江州境内。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古老珍稀的生物物种遗存，使怒江素以"生物物种基因库"、"动植物王国"著称于世。

怒江州的气候、土壤、水源、地势等自然地理条件，与"三江并流"的其他地区大体相同，怒江州丰富的生物物种资源就是"三江并流"地区的缩影。而且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人为消耗，这些地区古代的生物物种资源应比现代的生物物种资源更为富集、丰盛。如此丰盛的动植物资源，正是古人类生存的最为理想的自然环境，它为古人类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生活资料。由此可见，生物多样性，是我们中华祖先们能够在"三江并流"地区首先启蒙开化，并且开掘出中华文明源头的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

四、横断山脉纵谷气候条件的适应性

"三江并流"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则取决于横断山脉纵谷的特殊地理和气候构成。这种特殊的地理气候构成，又是我们中华祖先们得以在"三江并流"地区栖息、繁衍的重要条件。

云南西北部，处于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地带，濒临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结合部，由于受更新世纪地壳构造运动和河流深切等多重影响，构成了巨大的南北走向褶皱山系和深隧大断裂，玉龙雪山、云岭、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四座巍峨高山之间，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大江直泻奔腾，造就

了闻名于世的高山纵谷“三江并流”地貌奇观。

“三江并流”奇观不仅为世人所称绝，它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还使这个地区成为南北物种的汇聚地和“避难所”。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都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其中金沙江流经西藏、云南后出境，注入太平洋，几万年前由于黄河的引力而改道东流，又从云南西北部流入中原，注入我国黄海；澜沧江、怒江流经西藏、云南后出境，分别注入太平洋和印度洋。三条大江从海拔6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发源，最后流入海拔极低的海洋，使西北高原的寒流与南部海洋的热流，沿着河道北下和南上，在“三江并流”地带汇聚，造就了这里亚热带的温暖气候，这种气候非常适合各种气候带的动植物生长。因此又吸引了南北两端热带和寒带的动物，沿着河道在这里汇聚，使这里既有寒带的西藏黑熊，又有热带的孟加拉虎，各种动植物均在这里共同生长，形成了“三江并流”地区生物物种的多样性。而且，由于横断山脉的纵向排列，阻隔了来自东西方面的洪水和寒潮，使这里在洪水和冰期中，成为许多物种的避难所而幸存下来，如二亿三千万年前孑遗种树蕨在这里存活至今等。这些在自然灾难中幸存于“三江并流”地区的多样性生物为古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这在上面已经作了探讨。

这里我们还要探讨的是，“三江并流”地区横断山脉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对古人类的栖息、繁衍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三江并流”地区，三条大江沿着横断山脉断裂带低谷南流，两岸为高山，山上发源的支流成羽状下流入江，使这一地区形成巨大的水系。虽然水量极丰，但三江处于两岸高山夹峙的低谷，不会造成如平原地区类似黄河泛滥的巨大水患，而使古人类和各种生物得到丰水滋养而免受洪水泛滥的灭顶之

灾，这是平原大地所不能给予古人类和生物提供的优越地理条件。

二是“三江并流”所处的纵谷山区，由于这一地区的大气环流和地理形势的复杂因素，形成了特有的气候特点，一方面是随着纬度的差距导致气温的差距，表现为北部较冷，中部温暖，南部较热；另一方面是随着海拔的升高而气温逐渐降低，表现为高山寒冷，半山温暖，江边炎热；两者之间，垂直温差又大于水平温差，由此形成典型的立体型气候特点，即人们所说的“一山四气候，十里不同天”。这种立体气候条件非常适合于古人类的栖息生活。从考古出土文物可以看出，五千多年前的古人类还没有定居，而是过着在森林中游荡的野居生活，他们没有御寒和避暑的条件，只能不断游走选择温暖的地方生存。四季分明的平原大地，严寒的雪山高原，炎热的海洋地带，都不是古人类久居之地。而“三江并流”南北差异的和立体型的山区气候特点，则是古人类理想的生存空间。生活在这个区域里的古人类，可以随着季节气候的变化，冬天从高山、半山下到江边生活，夏天又从江边走上半山、高山生活，或者从南向北、从北向南游动生活，使他们能够经常在温暖的地带生存，而能够避开酷暑、严寒的威胁。由此可见，横断山脉构成的“三江并流”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是我们中华祖先们得以在此长期立足和生存的重要因素。

三是“三江并流”地区喀斯特溶岩地层分布广，所发育形成的岩溶洞穴、崖厦众多，成了古人类藉以遮风避雨、生息繁衍的天然穴居住所，这从塘子沟旧石器文化洞穴遗址、玉水坪新石器文化洞穴遗址发掘中，即可得到证明。这些以岩溶洞穴、崖厦为居的“穴居”现象，直至20世纪40年代，在怒江等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屡见不鲜。

食物丰富，气候温暖，居所天然，无周期性旱涝灾害所引发赤地千里或变为泽国使人类陷于灭顶之灾之虞，因而使我们中华祖先们得以在“三江并流”地区首先发祥。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五、当代“人类寻根”考察提供的新依据

在对我们中华祖先在“三江并流”地区发祥地的物质条件作了探讨以后，接下来再对我们祖先在“三江并流”地区开创的中华文化作一探讨。

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是，“三江并流”地区的远古人类——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据我国史书记载，在20世纪20~50年代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人”以后，距今七十多万年前的“北京人”就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我国西北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及至数万年前西北产生氐羌族群，后来氐羌族群的一部分从西北逐步南迁，进人西南地区，其中的一部分便迁人云南西部的“三江并流”地区，形成了这里的藏族、纳西族、白族、彝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族、阿昌族、普米族等各种民族。这个观点，经过史学家的不断演绎论述，似乎已成不争的事实。然而，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的五千年历史，扑朔迷离，太多的“千古之谜”至今尚未为人们所破译。当1965年在云南发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后，对我国西北为中华民族最早发源地，“北京人”为中华民族最早祖先的“定论”就提出了挑战；对云南的众多少数民族都是外来迁人民族的“论断”也提出了诸多质疑。既然“元谋人”比“北京人”整整早了100万年，云南就没有“元谋人”的后代民族遗存吗？如果云南有“元谋人”的遗裔民族，他们不就是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吗？这些便成了需

要重新作出回答的问题。

1992年扶永发《神州的发现》的发表，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崭新的回答，使人们耳目一新，对史学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他说，远古中国发源于云南西部横断山脉“三江并流”纵谷地带，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源头。传说中的“五帝”确有其人，大禹治水不是在中原而在滇西的石鼓，商朝初年以前的中国历史都在滇西横断山脉“三江并流”地区产生、演绎、形成。

扶永发的观点虽然是一家之说，但应该说与人类起源的历史是吻合的。人类开始从猿到人，又从直立人到智人，再从智人到现代人，都有一个逐步进化的漫长阶段，这种进化又是随着时间的转移，人的智商不断提高而逐渐实现的。由于云南“元谋人”比我国其他地方的人类早出现上百万年，可见“元谋人”的智商发育也早于其他地方的人类。因此，作为“元谋人”后代的云南最早形成我国的国家雏形，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发源地，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十几万年前发生了毁灭性的第四纪冰期，世界上的人类除个别地区外，几乎全部灭绝了。毫无疑问，这时作为“元谋人”、“北京人”以及在“三江并流”地区发现的“丽江人”的种族后代，都已经在冰期中全部灭亡。这样，中华56个民族的原始祖先，应该是第四纪冰期过后重新出现的人类。那么，这些重新出现在地球上的人类以及开创中华远古文化的先民又来自哪里呢?

这个问题是世界各国人类学家共同关心和致力研究的重大课题。据最近报载，世界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正合力完成一项庞大的“人类寻根计划”，希望通过研究人类基因的变异来绘制出一幅“人类迁徙图”。我国的科学家也积极参与这项研究，

并已取得初步成果。

一篇题为“DNA的秘密：北京猿人不是华夏祖先？”署名闻宏的文章（载2005年5月13日《中国民族报》）说：世界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关于“人类寻根”的考察研究表明“人类发源于十五万年前来自非洲的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十几万年前的第四纪冰期中，“地球上大部分陆地被冰川覆盖”，只有东非还保存着最后的人类。这些最后的人群，又拥挤在东非抢夺有限的食物，不断发生“种族清洗事件”，于是“一部分人开始走出非洲”。这些带着可变遗传基因（DNA）的人走出非洲后，分布到世界各地，重新发展了各地的人类和种族。在这些走出非洲的人群中，有一支黄种人在五万年前进入南亚，发展为南亚语系民族，后来分布到东南亚；三万年到二万年前又有两支南亚语系的人先后从缅甸进入中国。其中的一支在三万年前进入云南，发展为氐羌族群，后来发展为藏缅语系的各民族，二万年前氐羌族群一部分人又从云南沿着云贵高原西侧，进入西北，一万年前再由西北进入黄河流域，五六千年前在中原形成汉民族；另外的一支在二万年前从缅甸进入云南后沿云贵高原西侧，越过老挝，于一万年前从越南进入中国珠江流域江浙一带，发展为百越语系的各民族。

文章说：“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华夏56个民族和东亚、东南亚各民族都是由南亚语系的先民分化出来的，因为他们身上都带有M122的突变。”

当然，这些关于现代人类起源与迁徙的科学研究正在进行之中，最后的结果如何，还有待于更深入广泛的长期研究。但是这些关于华夏民族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在前辈们的著述和考古中，也是有记载和发现的。前面所引近代人章太炎先生所论：“黄帝之起，宜在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间。”就提出作为

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民族，可能起源于印度等南亚地区。这与关于南亚语系人群自缅甸进入中国，发展为华夏民族的上述观点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再从怒江流域的出土文物中，也可以获得同样的信息。据云南省、保山市文物部门 1986～1988 年，对怒江中游保山市境内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在保山龙王塘旧石器遗址中出土了石制品 41 件，骨锥 5 件，动物化石标本 150 余件，动物骨骼碎片 10 余公斤；出露灰坑 1 个，内含密集的灰烬、炭屑和烧骨。石器有石砧兼手捶、敲砸器、琢孔石器、尖状器等；动物化石有鸟类和虎、豹、豺、狼、牛、羊、猪、鹿、麂及巨貘等。经过考证，龙王塘遗址上限距今 2、3 万年，下限为化石中巨貘灭绝的 12000 年前。在对施甸姚关万仞岗旧石器遗址清理中，出土了“姚关人”化石及石、角器、动物化石标本 300 余件，还有丰富的用火遗迹。经放射性炭素 14 测定，施甸万仞岗遗址距今 2 万年左右（上据耿德铭：《哀牢文化研究》）。保山龙王塘和施甸姚关万仞岗两个旧石器遗址，位于怒江东岸，西面紧临缅甸。3 万年前，南亚语系原始族群从缅甸开始进入中国时，云南是他们必经的第一站，而怒江就是他们首先到达的地方。从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看出，如果按上述的人口迁徙研究的路线分析，怒江流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就为进入中国的南亚语系族群提供了优厚的生活资料，使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发展成为氐羌——藏缅族系的各民族，并在这里留下了他们 2、3 万年前的生活遗址，而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再向中国的西北迁徙，同时把氐羌文化也带到西北。从龙王塘、万仞岗两个旧石器遗址的年代中，我们对“三江并流”地区古人类的发源与迁徙问题，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

由此可见，扶永发关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首先发源于云南横断山脉地带，然后人口向全国各地迁徙，同时也把他们的文

化带到各地的“发现”，是有充分根据的。同时，我们还要指出，内地的人口和文化迁回云南的现象也确实存在。首先是古代云南人口向内地的大迁徙，促进了各地人口的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泱泱大国。而在一个地区当人口发展到一定极限的时候，部落、民族之间就发生争夺生存空间的排挤、战争，或者由于自然灾害的驱迫，于是一部分人就要离开原地走向其他地方，拓展新的生存领域，其中的一些部落、族群又从内地走回到他们祖先的发祥地云南，同时也把他们的文化带进云南，形成了内地中原文化、西北文化与云南本土文化的交融，并且推动了云南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下面我们试对古人类从云南迁出迁返中的文化交融作一些探讨。

先从出土文物来看，云南出土的新石器与内地的新石器有一些相同的特点。汪宁生《云南考古》中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新石器文化和内地及邻近地区新石器文化也是有一些共同性的。”他举例说：洱海地区发现的有压印断线图案的陶器，与北方陶器纹饰相同；滇池地区发现的有肩石斧与东南沿海的有肩石斧有关；半月形双孔石刀原是龙山文化开始出现的器物，后来扩散到其他地区，这种石刀洱海地区也有发现。“此外，洱海地区的半地穴式房屋，元谋大墩子遗址房屋先开沟再挖柱洞的建造方法，元谋大墩子儿童瓮棺葬分布在房屋周围和瓮棺上钻出小孔的习俗，这些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特别是仰韶文化中也能见到。”这些现象说明，云南的远古居民与内地很早就有往来和文化交流，上述的新石器文化是古人类的迁出和迁返中互相交流而发展起来的，它里面既有内地文化对云南的影响，也有云南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它是随着人口的迁徙交流出现的文化融合现象。因此，认为云南的古代文化仅仅来自内地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观点是不全面的。我们再举一例

说明：

考古学家 1955 ~ 1960 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经过四次发掘，发现“滇王”及其家庭的墓葬群。出土文物中，有西汉元封二年（前 109 年）朝廷赐予滇王的“滇王之印”金印和铜、玉器。值得注意的是铜器中有编钟六枚。这些钟体为椭圆形，上宽下窄，通高从 42 厘米至 29.5 厘米，依次排列，造型规整，钟面饰为双龙纹，华丽对称。编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主要流行于王公贵族中。中原地区王公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也多有这种编钟发现，但每组编钟多为奇数，而云南出土的编钟每组多为偶数。在中原文化中，奇数为大，如九称为“太极”，又称“一言九鼎”。而在云南原始民族文化中，则以均衡、对称为上，偶数代表平均、对称、平衡。滇王家族的编钟组合为偶数，就反映了云南原始民族的平均观念。云南虽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但是由于山河阻隔等原因，到了后期已落后于中原。按照事物从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规律来看，这种古代的编钟乐器，应该首先发明于云南，而以原始民族的平均观念，进行偶数编组，再传入中原。编钟传入较为先进的中原地区以后，贵族统治阶级再以奇数进行编组，赋予等级观念。

再是在滇王墓中还发现滇王玉衣，但已散落，共有穿孔玉片 67 片，无孔玉片 102 片，玉片有打磨过的，也有未经打磨的。玉衣是古代帝王和贵族死后随葬的衣服。汉代有严格的随葬制度，皇帝死后穿金缕玉衣，王侯死后穿银缕玉衣。汉封滇王的随葬玉衣则未发现金缕或银缕的痕迹。从玉衣有无金银缕中可以看出，中原玉衣，用金银缕连缀，金银缕质坚而久存；云南玉衣，可能用绳线连缀，绳线易朽而无存。从使用绳线到发明金银缕是一个技术进步的过程，也是玉衣从产生到推广的传承过程。它说明了，玉衣的使用应先在云南出现，而后在中

原得到传承和发展（资料引自王永胜《滇王编钟与玉衣片》一文，载《云南老年报》2005 年 7 月 8 日）。

再从文化传承来看。“三江并流”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文化关系也并非单向继承关系，而是互相交流传承融合的关系。

龙是古代华夏民族的徽帜、图腾，炎黄子孙还称为龙的传人。《左传·郯子》云：“夏后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即指龙为夏民族的图腾。在“三江并流”各地各民族中，就广泛流传着龙图腾崇拜的“九隆神话”，并载于《风俗通》、《华阳国志》、《后汉书·西南夷传》等书。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云：“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君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按《后汉书》作九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九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后着十尾，臂胫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

云南著名历史学家徐嘉瑞先生说：“九隆神话，亦传人楚国，故屈原怪而问之于天。”（《大理古代文化史》）指屈原在《天问》中有“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之问，女歧为古代神话中的神女，神话中有女歧无夫而有九子母之说。被屈原指问于天。说明“九隆神话”传人楚国，并在中原文化中产生了影响。

《后汉书》所载“九隆神话”中说：“哀牢夷刻画其身象龙

文，衣著尾。”指古代怒江等地的哀牢民族，有以龙文身的图腾习俗。居住在怒江州境内的独龙族自古就有文面的习俗，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妇女还盛行文面，因此今天我们还能偶尔见到文面的独龙族老妇人。这种文身的习俗，《山海经》里称为“雕题”，称文身的部落为“雕题国”，可见文身之俗古已有之，在我国各地各民族中，文身的现象也很普遍。古代东南沿海地区的闺女出嫁时，还有自文其面的习俗。这些情况说明，云南的古代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西北文化、东南沿海文化都有着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传承发展的关系。

1992 年，是滇西横断山脉地带史前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元月九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庆华，在保山市羊邑煤矿清水沟煤层中发现古猿化石，轰动了国内外。新华社发布通电称：“专家认为，这次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古猿向人进化的缺环，对人类起源及深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继 1965 年元谋猿人发现之后，保山古猿化石的发现，使滇西为人类发源地之一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这一年的 11 月，扶永发《神州的发现》正式出版，揭示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发祥地在滇西横断山脉地带，震动了史学界，被称为“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

纵虽有这样重大的发现，毕竟滇西太偏僻、太遥远，这块神奇土地上的史前史被历史的尘埃积压太深，今天已经然被人揭开了一角，但是不是真的如此，也还使人疑惑不解。因此要使滇西的史前史全部揭开，还要费很大力气，我等一辈人也许难以企及。但努力总是会有结果的。我抱着这个信念，十多年来对《山海经》与“三江并流”的史前史作了一些研究尝试，以为扶永发《神州的发现》提供一点佐证。为此，我把近十来年的拙作汇成此集，以请史家指正。

轩辕黄帝新探

——二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云南省测绘局地图制图工程师扶永发同志所著《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一书，新近提出今天的云南西部横断山区是远古时代神州中国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发源地；滇西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境内的金顶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故里。这是扶永发同志运用现代地图学知识多年研究我国古代“第一奇书”《山海经》，经过大量实地考证后创造的一家之说。这一新说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远古时代神州中国的正确地理位置，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正确发源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笔者生长在滇西剑川，长期在怒江州工作，通过对《山海经》的研读和实地考察，深信扶永发关于古代神州中国发源地在滇西的学说是重大的科学发现，我深表敬佩和赞赏。本文谨就轩辕黄帝的出生故里及苗裔问题陈一管之见，以佐扶说并请教大家。

一、关于轩辕黄帝

说轩辕黄帝，不能不先说《山海经》，因为《山海经》是最早讲到轩辕黄帝的我国第一部典籍。

《山海经》成书最早，有的说在春秋战国年代，有的说在

商朝就成书了。

《山海经》共十八篇，三万余字，其中三分之二的篇幅用来写山，共写了488座山，对每座山的地理方位，山与山的联系与距离，山中的动物、植物、矿产资源、水系河流都作了简洁的记载，书中还联系山川水域记写了远古时代神州中国的一些人物活动，氏族部落，天文地理，宗教信仰，历史事件及神话故事等。所以《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地理宝典，又称为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山海经》记载了远古时代神州中国部落联合体的著名首领“五帝”和“五帝”的身世及世系，记载了远古时代神州中国发生的洪水泛滥、大禹治水、黄帝与蚩尤的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确有其人、实有其事的记实之笔。

《山海经》也确实记载了一些神话，书中写了众多超凡人圣的神灵，奇形怪状的动物，神人一体的智者，神秘离奇的现象等，写得光怪陆离，难以捉摸，因此《山海经》又被人当作“神话书”、“巫书”，有的史家也认为《山海经》“不雅驯”，不足信。

《山海经》是地理和历史典籍，又渗入了一些神话内容，这种写法看起来“不雅驯”，但并不离奇。因为现代人和古代人对世界、人生的观念和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现代人都知道劳动创造了世界和人类本身，但处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先民还没有这样的科学知识，他们对茫茫世界和芸芸众生感到神秘莫测，不可理解，于是臆造出无所不能的神灵来，认为世界、人类、万事万物都是神灵所创造，并由神灵所主宰，这样就产生了神人感应而产生杰出的部落（国家）领袖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产生了对神灵的敬畏与崇拜。原始人就生活在他们认为的神与人并生共存的世界里，使他们的行为和对事物的认识无不

带着神秘的色彩。《山海经》的作者是站在当时社会的历史角度记写远古中国的地理与历史，必然就要反映古代原始先民对世界、人生的认识和观念，这样的书拿到四五千年以后的现代人手里虽然会感到非常离奇和不可捉摸，但是只要用历史的观点认识远古社会，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神秘的面纱，看到远古时代神州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的真实面貌。

通过以上讨论，确认《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地理和历史宝典，而不是神话故事书，这是本文要探索轩辕黄帝的必要前提。

《山海经》记写了古代帝王和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对黄帝的记述特别多，大约可以找到31处，计有记述黄帝故里、纪念址、名山的6处；记述黄帝身世、家庭、部落的9处；记述黄帝饮食起居、行止处所的9处；记述神灵对黄帝的服侍的3处；记述黄帝丰功伟绩的5处。以地理为主的《山海经》对黄帝有如此详细的记载，说明黄帝在远古神州中国的特殊重要地位。

黄帝在《山海经》中，开始是以神明天子的形象出现的。为了暗示黄帝的出身不凡，是天神感应而生的天子，是神的化身，书中有意回避了黄帝的出生和生身的父母，而对黄帝的生活起居、行止处所、功名业绩多处作了神化的记写。如说：黄帝居住的是神山仙宫，由神灵亲自服侍；吃的是美食玉膏和沙棠；乘坐黄龙云游四方，登临“平圃”（空中花园）观赏九州下界；通过“百仞无枝”的建木神树上天下地，处理天庭和九州地面的事情；呼唤天神除暴消灾，驯化百兽以供驱使，等等。从而把黄帝当作神明，加以敬畏和崇拜。其实这种天人感应，把伟大人物神明化的观念形态，从原始社会就流传下来，直到封建社会也盛传不衰。我国著名的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王，传说是他在的父亲鲧的尸体中孕育了三年后出生的；唐代南诏国王蒙氏的祖先，传说是神龙与蒙氏

的祖母感应而生的，等等，例不乏举，所以《山海经》把黄帝写作神明天子也并不奇怪。

《山海经》开始写了神化了的黄帝的一面，后来就写了黄帝作为人王的一面，使我们对黄帝有了真实的了解。《山海经》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据《竹书》说，韩流就是乾荒帝）。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书中又说，黄帝生骆民，骆民生鲧，鲧生禹，禹就是治水大功臣和夏王朝的开国始君。这些对黄帝家族身世的记载，根系明确，支脉清晰，与其他世家的身世、宗谱记载没有任何区别，说明黄帝也是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真人和人王。我国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作《史记》时，进行了缜密的调查研究，终于证实黄帝是少典之子，名叫轩辕，生于轩辕丘，并将黄帝作为人王赫然写入《史记》的第一篇《五帝本纪》。功莫大焉。

黄帝作为我国古代"五帝"中的一帝，《山海经》记载了黄帝统一神州中国，平息南方诸侯蚩尤的叛乱，兴农、兴工，提倡百业的重大功绩。《五帝本纪》中，又以纪史之笔，列举了黄帝治理神州的十大丰功伟绩。一、"修德振兵"，征服诸侯，平息叛乱，统一神州；二、"治五气"，研究四时八节，气候变化；三、"艺五种"，倡导发明五种乐器，发展文化艺术；四、"抚万民"，除暴安良，安抚百姓；五、"度四方"，测量四方面积，管理各地诸侯；六、"披山通道"，深入神州各地，体察民情，致力于交通建设；七、"时播百谷"，重视农耕；八、"淳化鸟兽"，提倡饲养家禽家畜；九、"勤劳心力耳目"，以身作则，作出表率；十、倡导"节用水火材物"，以裕民生。

黄帝治理神州的显赫功业，使他在古代中国享有极高的威望，被诸侯拥戴为神明天子，成为五帝中继炎帝之后的开山

皇帝。

《史记》说，由于轩辕黄帝重视农耕，“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后来就通称他为“轩辕黄帝”。

肯定黄帝的人王名分，这是我们根据《山海经》进一步探寻黄帝故里的必要前提。

二、关于黄帝的故里

轩辕黄帝的故里在轩辕丘，似乎已成定论，至少到目前为止对此还没有异议，但轩辕丘在哪里？史学家多有探讨和见解，而说法却不一致，有的说：黄帝出生在寿丘，即今山东省曲阜县城之东；有的说，黄帝出生在轩辕丘，轩辕丘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街子乡柳泉坪之东；有的又说，黄帝出生的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之西北。

对黄帝出生地的上述种种说法，总不外乎是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所以一般也就认为黄帝的出生地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而轩辕丘自然也就在黄河流域了。黄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始祖，黄帝的出生地自然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于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也就被当作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了。

然而一个人的出生地，不可能包括一个广泛的范围，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地点，面对这个特定的地点又有种种说法和争议，由此说明黄帝的故里轩辕丘究竟在哪里？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开的千古之谜。那么，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也就成为值得商榷和重新进行探求的问题了。

今天，扶永发先生发表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提出我国远古时代的轩辕丘不在黄河流域，而在云南省西部的横断山脉地区；黄帝的出生地也不在黄河流域，而在云南省西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金顶镇镇政府所在地的文

兴街一带。

笔者把《山海经》的记载与当地的地理和历史情况进行对照比较和考察，确认扶永发关于兰坪县金顶镇文兴街一带为轩辕黄帝故里的新说是有科学根据的，谨提出以下证据进行探讨。

——南北山脉走向之证。兰坪县位于横断山脉的碧罗雪山和云岭两大山系之间，山系为东西排列，南北走向，即东西为山，南北为谷。金顶镇位于兰坪县东北部，坐落于云岭山脉，东西两面为山，南北为谷，沘江贯流其间，构成典型的峡谷山区地貌。兰坪金顶的地貌可以与《山海经》记载的古代中国的地貌相对照。远古时代的神州中国是坐落在崇山峻岭之中，是一个山国。所以《山海经》古时又称作《五藏山经》。这与黄河流域以平原为主的中原地带的地貌是不一样的。其次是南北走向的山脉特征。《山海经》记载，远古神州中国的南北两端，各有三座“日月所出之山”和“日月所入之山”，说明远古中国境内的山脉为东西坐落，南北伸延，只有这样的山形走势，才能出现南北两端各有太阳和月亮自东边的山上升起，从西边的山上落下的自然物象。这种地理特征，与现在全国范围的地理形势是不能对应的。我国虽然山地居多，但平原谷地仍占总面积的 31%，不属于典型的山区之国；我国有众多的山脉，而山脉走向则以纬向（东北）、新华夏向（东北—西南）两种走向为最普遍，与远古中国南北走向为主的山脉走向也不相同。这种山地占绝大部分，山脉为南北走向的地理特征，全国只有云南省西部的横断山脉地区能够完全对应。云南西部在亿万年前的地球造山运动中，由于受欧亚和印支两大板块的剧烈挤压，造成了群峰突起，山地面积占总面积 91% 以上；山脉断层发育，形成东西坐落，南北延伸的横断山脉地貌。这种地

理形貌，与《山海经》所载的远古中国的地理形貌完全吻合。因此，从自然地理对应的要求考证，把远古中国的地理位置——发祥地定位于滇西横断山脉地区是正确的。

——考古发现之证。1984 年，金顶镇在修建金顶至云龙的县际公路时，在距离文兴街南面约一公里的马鞍山脚，发现了新石器文化层，当时笔者恰巧到金顶征集文史资料，曾取样送交当地政府并向文物部门反映。当年 8 月，州县文物普查队深入马鞍山进行发掘考察，获得石斧 16 件，石锛 3 件，弧形石刀数件，有孔石刀 18 件，陶片若干，可辨认的牛、马、羊、鹿等动物骨骼若干。经省级文物部门鉴定为新石器文化遗址，遗址年代为 4000～7000 年前，并正式定名为“马鞍山新石器文化遗址”。又据文兴街老人反映，早年有人曾经在文兴街南侧的谷地上拾到石斧，与马鞍山出土的石斧属同一类型。而文兴街南侧的谷地，就是扶永发考定的轩辕国国邑的故址。这些考古发现，证明金顶地区早在 4000～7000 年前就有了人类生息活动，它为古代中国的重要原始部落——轩辕国的故址是金顶地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江山之证。《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曰：“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这是说轩辕国坐落在江山的南端，居山，这里是长寿的吉地，寿命短的也要活到六十岁（据考，所谓“八百岁”实指八百个月，折合 66 岁，系古时的计算方法与今天不同者）。据此，首先要考证金顶地区有没有这样一座“江山”。从现在的地名考察，文兴街所依的山叫玉坪山，坐西朝东，文兴街（轩辕国故址）坐落在玉坪山的南面山脚，面临沘江水，与东面的凤凰山隔江相望。在文兴街北面约四公里的地方，叫江头河村，就是兰坪县城的所在地。江头河村位于玉坪山下、沘江西岸，这里有一条河流，发源于

玉坪山中，河水从山上向东南流下；经过江头河村边后汇入泚江上源，因此取名为江头河。由此可知，玉坪山因下临泚江，古代当称为“江山”，而“玉坪山”则是后人所改的称谓，就如古代西王母穴居的“玉山”，现在已被改称为“玉狮山”（详见下文），这种改变远古时代地理名称称谓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兰坪县金顶境内的玉坪山，就是远古时代轩辕国所依的著名的“江山”。而金顶镇境内玉坪山的南端山下就是文兴街，与经文“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的记载完全吻合，说明扶永发把轩辕国故址考定在金顶镇文兴街南端为不错。

——二五山解谜。《山海经·西山经》载曰：“轩辕之丘，无草木。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许多史家论证认为：轩辕丘是黄帝的出生地，同时又提出各不相同的多种轩辕丘位置。扶永发则考证提出：轩辕丘是指现在兰坪县金顶镇泚江东西二源的山和通甸乡通甸河西南一带的山。这些山位于轩辕国——兰坪县金顶镇文兴街的北部，所以统称轩辕丘（即轩辕山，书中丘与山同义）。我赞成扶永发的考证，同时认为，书中的轩辕丘和实际的轩辕山都是一个大的范围，而黄帝的出生地应该确指一个具体的地点。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曰：“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这里所说的轩辕之丘，是指黄帝的纪念地轩辕台，不同于《山海经·西山经》所指的“轩辕丘（山)”，因《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载：“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可以互证。上文的意思是：穷山坐落在轩辕国邑北边，穷山上建筑了纪念黄帝的轩辕台，为了表示对黄帝神灵的敬畏，射猎的人不敢朝轩辕台的方向射击（因轩辕国、轩辕台在古代中国的西部，所以称“不敢西向

射")。由此可见，穷山是远古时期中国西部的一支名山。

通过对穷山“在轩辕国北”的地理方位的考察，古代的这支穷山应指今天金顶镇文兴街西面的二五山，因为据扶永发考证，古代轩辕国国邑故址就在文兴街之西二五山南面的谷地上。

二五山并非一支大山，而是玉坪山南部的一支山岭。这支山岭西起于玉坪山峰，东止于文兴街头，山势逶迤而下，形成独立于金顶谷地的一支奇特山岭。这支山岭古代称“穷山”，穷者，尽也，“穷山”可能就因它是金顶镇境内玉坪山（古代江山）最南的一支山岭而得名。

从文兴街头拾级而上，约十分钟就登上二五山的一个平台，据扶永发考证，这里就是轩辕台的故址，我赞成扶永发这一重要考证，同时也提出两点考察意见：

其一，穷山是古代中国专指轩辕台所在地的一支山岭，它虽然发源于江山，但却不能代表江山山脉，因为二五山是发源于玉坪山南部、向东伸延的一支山岭，它不能代表玉坪山山脉，所以穷山和江山是两种山名称谓，不能说穷山是江山的别称，或谓江山就是穷山。

其二，二五山不仅是轩辕台的故址，也是轩辕黄帝的出生之地，理由有二：一是我国古代原始先民有一种以家族长、氏族酋长的名字作为氏族部落名称的命名俗，氏族部落成员又以氏族名冠本名，作为自己的名字。《山海经》中记载了一百多个氏族部落("国")，其中的许多氏族部落都以家族长、酋长的名字作为部落名称，如少昊之国、司幽国、北狄国、寿麻国等。这种原始的命名俗，在我国现代比较后进的一些民族中还保存着它的痕迹，如怒江州贡山县的独龙族，20 世纪 40 年代末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他们以血缘氏族组成村落，以氏族首

领名字作为村落名称，氏族成员就以村名冠以本名之首。如独龙族人名有白丽·普、马库·丁、迪南当·娜这样的称谓，实际含义就是白丽（氏族）村的普、马库（氏族）村的丁、迪南当（氏族）村的娜。轩辕黄帝的取名含意也与这种情况相类似，即轩辕黄帝的名称就说明了黄帝出生于轩辕（氏族部落）国。现在轩辕国的地址已考证在兰坪县金顶镇的文兴街地区范围，当然也包括二五山，所以轩辕黄帝出生在文兴街地区无疑；二是二五山命名与黄帝出生地有关。二五山是文兴街后山的古地名，但何时取名二五山则无考，当地故老也不能说明二五山命名的由来。经过查阅典籍，才明了二五山的“二五”是古代易经卦爻的名数，据《汉语大词典》解释“二五指别卦中的第二爻与第五爻”，“二为阴，五为阳”，“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天地定位，二五为胎”。释文表明，二五卦爻，指有经天纬地的伟大人物在母体孕育。《三国·魏王弼注》曰：“利见大人，唯二五焉。”又《易·乾》载曰：“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述注释说明，二五代表吉卦，指有经天纬地的伟大人物怀胎和降生。文兴街后山，以吉卦的名数命名为“二五山”，正应了轩辕国（部落）的黄帝在这个山岭上出生。由此可见，二五山原名“穷山”，黄帝成为古代中国显赫的“四方大帝”之后，“穷山”即因黄帝的显赫名位，改称为二五山，表示这是伟大人物诞生的地方，这就是“二五山”千古之谜的底蕴。因此我认为，兰坪县金顶镇文兴街后面的二五山，就是中华民族共祖轩辕黄帝的出生地和故里。

——黄帝口之证。在文兴街和二五山的对面，有一座凤凰山。凤凰山坐落在沘江东岸，是我国特大铅锌矿——兰坪铅锌矿的主体矿山。凤凰山的南部山顶，有一个垭口，垭口上有一

条山间小道，是金顶通往云龙的交通枢纽，这个山顶垭口与文兴街及二五山隔江相对，自古就称为“黄帝口”。但为什么称它为“黄帝口”，却没有谁能作出解释，于是“黄帝口”又成了金顶地区的第二个“千古之迹”。现在考定二五山为轩辕黄帝的出生地以后，“黄帝口”的命名也才得到合理的解释，显然，二五山对面的凤凰山垭口通道正是因为这里出了黄帝这位“四方大帝”而命名为“黄帝口”。“黄帝口”的地名遗存又为二五山为黄帝的出生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玉山发现之证。玉山是古代中国著名人物西王母（民间称为王母娘娘）居住的名山。《山海经·西山经》载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又载：“西王母……穴处。”说明玉山位于古代中国的西部，西王母居住在玉山的山洞里。《山海经·大荒西经》接着记载道：“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可知，轩辕台的地理位置又在玉山的西部，人们因敬畏黄帝神灵，玉山射箭的人不敢向西射击。这样看来，玉山与轩辕国、轩辕台之间的距离不会很远。如果在金顶镇东部附近村镇找到古代玉山的故址，就可以证明文兴街二五山是轩辕黄帝故里的考证不错。扶永发根据对百万分之一地图的室内考证指出，玉山的位置应该在兰坪县东北部河西乡的玉狮村，但他没有到过实地考察，不知道玉狮村有没有西王母“穴处”的岩洞遗址，建议笔者于工作之便到玉狮村作一次考察。1991年10月间适逢笔者出差到兰坪，顺道与县政协的小和同志到河西乡玉狮村作了一次西王母故居的寻访考察，考察结果与扶永发的室内地图考证完全一致。玉狮村位于金顶二五山的东北部，两地相距仅50多公里，村子依山而居，这座山就是玉狮山。玉狮山蕴藏玉石矿，过去曾经作过开采，由于此地曾开采加工过玉石，至今玉狮山西侧还留下“玉石场”的地名。又由

于这里出产玉石，所以这座山自古称为“玉石山”，直到20世纪30年代其山名也不曾改变。后来，当地有个老学究，把玉石山附近的青岩头、箐口、金龙、白地坪、江头河等地名连成一首打油诗，诗曰：“玉狮吼青岩，声响箐口；金龙绕白地，腰现江头。”老学究作诗时，为了增强诗的韵味和气势，把玉石山的玉石改成了“玉狮”。这首打油诗在当地传开后，久吟成诵，后来玉石山和玉石村的地名也就随着被人们改作“玉狮山”和“玉狮村”称谓了。这个情况说明，玉狮山的古称确实是“玉石山”，“玉石山”与西王母所居的“玉山”只有称谓的简繁之别，山名的取意则完全一致。接着，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们在玉狮山主峰下面的热来村下口的山箐里，发现了一个石灰石溶岩构成的山洞，洞口高2.75米，宽1.7米，洞内可容十人活动，洞下临沟，有溪水流淌。带路的村干部向我们介绍，合作化时期，生产队在洞内关过牲口，后来洞顶溶岩倒塌，不再使用。我们还查访了玉狮村的其他地带，却没有发现第二个可“穴处”和供人们使用的山洞。由此证明，热来村下口箐沟里的这个山洞就是古代西王母“穴处”的山洞遗址。我们把情况向扶永发反映后，扶永发又于1992年2月亲自到河西乡玉狮村作了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与我们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远古中国名山玉山在河西乡的发现，为轩辕国、轩辕台故址在金顶镇的考证，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治水新说之证。《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古代中国发生过一次漫天的洪水大灾，大禹奉帝命领导治水，取得很大成功，平定了九州水患，功莫大焉。可是过去由于把古代神州中国的发源地指认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于是就把大禹治水的区域也极大地扩大了。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地区，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渭水、汉水等大江大河流域，大约广涉今天我国中

原地区的十几个省市，总面积约200多万平方公里，可是大禹治水的时代，中国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石木工具，交通非常闭塞，交通全靠步行。在这样的原始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大禹一人要走遍全国十几个省区领导治水，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纯属夸大的神话。这也说明，过去对古代中国发源地及其范围的考定和指认是不可靠的。

扶永发把古代神州中国的发源地考定在滇西横断山区，把大禹治水的区域也考定在滇西的范围内，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可靠的考证。可是扶永发先生又把大禹治水的地区限制在今天丽江县石鼓镇所在地的金沙江一段水域，又未免过于拘泥。

《山海经·海内经》载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说明古代中国的那次洪水很大，全国受灾，鲧奉命治水不成功，被帝处死，又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才平定了九州（指全国）的水患。由此可见，大禹除主要治理了石鼓金沙江地段的洪水外，还治理了滇西其他地区的洪水，这方面，我到与兰坪县接壤的泸水县和云龙县作过调查，采访到大禹到泸水县老窝乡，治理了自本山洪水的传说：采访到大禹曾到达云龙县澜沧江东岸，视察洪水情况，制定治水计划的传说；我在查阅古籍中，也发现有大禹在大理洱海一带治水的记载。

尤中著《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载曰："南皋子曰：'大禹之导黑水，通叶榆而入南海。'即大理榆城泽国洱水是也，其色黑，如渍榆叶，在当时所谓：'建五长以率之。'"这段记载说明了洪水时代，大理洱海（《山海经》称南海，又称忠极之渊）

的主河源黑水（即发源于洱源县西山的弥茸河）发生阻塞，洪水淹没大理（古称叶榆）地带。大禹亲临大理，安营扎寨，委派五个首领，带领民众治水，终于排除阻塞，疏通河道，使洪水沿着弥茸河（黑水）道，泻入洱海（南海），解除了大理地区的水患。

据《山海经》记载，大禹是轩辕黄帝的玄孙，生活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夏朝过渡的交替时期，大禹治水是在远古神州中国（九州）的区域内进行的。根据以上典籍记载和古老传闻，说明大禹治水的区域是滇西横断山区，包括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三江并流”地区，而没有超出这个地理范围。因此，大禹治水及其治水区域的历史考证，又为滇西横断山区是远古神州中国的发祥地，兰坪县金顶镇文兴街二五山是轩辕黄帝的故里，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原始居民生活习俗之证。远古神州中国和黄帝的发源地和故里不在其他地区，而在滇西横断山脉地带，这是由滇西山区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条件所决定的。第一，滇西横断山脉地带处于亚热带气候带，立体气候明显，从高山到河谷，一天内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四季气候，这种气候条件，有利于原始居民随气候节令的变化，在高山、半山、河谷地带随时迁徙“穴处”，既能避开冬寒和夏暑，又能避免遭受平原地区那种洪水泛滥的灭顶之灾和赤地千里、颗粒无收之虞，使原始居民在温暖而安全的地带穴居生活，而原始居民要求的这些地理条件，在平原地区是不能满足的；第二《山海经》记载了众多山脉河流，凡是记载的山脉，都无不记载着山上的树木花草和飞禽走兽，说明当时原始居民的生活还离不开大自然的赐予。他们除了简单的原始农业外，采集四季山林果实，猎取林中的飞禽走兽，仍是原始居民的重要生活来源。滇西山区十分

优良的生态环境和极其丰富的动物植物资源，为原始居民提供了应有尽有的采集和狩猎的自然资源，而这些原始居民生活必须具备的条件，在平原地区也是不能完全满足的；第三，云南中西部地区是170万年前我国“元谋人”的发祥地，我国原始人最早发现于云南中西部，又决定了云南中西部原始人类的进化必然要早于其他地区，因此，历史发展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我国远古时期，在云南西部横断山区最先组成了原始居民的部落联合体——神州中国，首先出现了部落联合体——神州中国的杰出领袖人物——“三皇”、“五帝”，这是符合人类自身的自然进化规律的，所以滇西横断山区最先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滇西兰坪的金顶二五山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故里，这正反映了人类进化文明历史的必然规律。

——白氏国之证。1991年10月，我和兰坪县政协的小和同志在结束了玉狮山的考察以后，顺道在通甸乡的所在地通甸坝子里作了一些地理考察。

《山海经》载：在神州的西北部，有一个原始部落叫“白氏国，在龙鱼北”。又载：“有大泽之长山，有白氏之国”；并说，在白氏国的北部还有一个稷泽。据扶永发室内研究考定，白氏国的国邑故址在兰坪县通甸乡的所在地通甸街，通甸街的南端，即通甸街至福登村之间为古代的大泽，出产龙鱼；通甸街的北端，即通甸街至玉水坪村之间为古代的稷泽，为神州著名人物后稷耕作和沐浴之地。我们通过考察，确认扶永发关于白氏国的研究和地理考定是符合实际的。

通甸乡所在地通甸坝子，位于兰坪县东北部，坝子南北长10多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是一块槽形高原盆地，其四面环山，有一条发源于老君山的河水，叫通甸河，从南向北纵贯盆地，流向河西乡。通甸街子就坐落在通甸盆地的中部，主要

居住着白族，还有少量普米族和傈僳族人口。人口稠密，居住集中。1984年州县文物普查队在通甸坝子北端玉水坪的半坡，发现了两个新石器文化遗址山洞，发掘了大量新石器，经过鉴定确定为距今4000～7000年前的“玉水坪新石器洞穴文化遗址”，已列为兰坪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在这次考察中，又发现通甸坝子四周的山脚一带，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岩洞有二十几处，有些岩洞还有人类使用过的痕迹。这些考古文物和洞穴遗址说明，通甸地区为古人类群居之地，它为四千多年前通甸坝区曾建立过原始部落——白氏国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接着我们考察了通甸坝两岸的地情。现在通甸坝子已经没有湖泽，通甸街子的南北两端都是庄稼地和村庄，但是我们发现在街子南北两端的庄稼地的下层，大部分为河石、河沙沉积层结构。访问当地老农，他们也说，据古人传说，通甸坝子在古代是有海子（指湖泽）的。由此可知，四千多年前通甸街的南北两端确实存在大泽和稷泽，几千年后，由于地形发生变化，这些湖泽才逐渐消失，终于变成了陆地。今天我们只能看到通甸坝子的陆地而不见湖泽，但是考之地理，却不难发现《山海经》所载的白氏国和大泽、稷泽的地理特征，与通甸坝子的历史和现状是互相吻合的。通过实地考察，使我们确信兰坪县通甸乡所在地的通甸街就是古代神州部落——白氏国的国邑故址，通甸街南北两端就是古代神州的大泽、稷泽的故址。

根据《山海经·海外西经》的记载，白氏国、大泽、稷泽这些古地名，均排列在轩辕国、轩辕丘（台）附近的北方（应为东北方），而白氏国、大泽、稷泽的故地通甸坝子，就坐落在轩辕国、轩辕丘（台）的故地金顶镇文兴街附近的东北方，说明扶永发定轩辕国和轩辕丘（台）故地在金顶镇文兴街一带

是正确的。

三、关于黄帝的苗裔民族

在作了上述考证以后，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黄帝的故里在滇西，滇西也应该有黄帝族遗下的苗裔，他们又是谁呢？

很早我就有了滇西的白族与汉族有同源关系，汉族（主要）发源于夏族、夏族又是由黄帝族发展起来的看法，因此，我认为白族是黄帝族在滇西的苗裔民族之一。扶永发先生的专著《神州的发现》发表以后，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这一看法。

我认为探明白族与夏族——汉族的渊源关系，进而探寻黄帝族苗裔的下落，还可以从民族学的角度，为滇西为古代中国的发源地和轩辕黄帝的故里，提供进一步的佐证。

1. 从夏族源于黄帝族说起

夏族又称华夏族，过去认为它发源于中原地区，后来发展为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从扶永发的理论看来，夏族发源于滇西而不是发源于中原。这是因为夏朝建立于滇西，夏朝的五百年历史都在滇西度过，夏族作为夏朝的主体民族也形成于夏朝。历史学家翁独健说："夏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即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它形成的标志。"（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第5页）由此可知，夏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早在"五帝"时期已经形成，夏朝只是给予它正式的民族称谓。那么夏族是怎样形成的呢？这还要追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传说中的"五帝"，按扶永发的理论，其先后秩序是尧（炎）帝、黄帝、丹朱帝、舜帝、颛顼帝。他们是原始社会末期远古中国各部落的总首领。他们都生活在滇西的横断山脉地

区。“五帝”中起承先启后的决定作用的是黄帝。炎帝虽为五帝之首，但炎帝时代还没有把古代中国的各部落征服下来，炎帝常被反抗的部落击败。黄帝是继起的第二帝，他首先帮助炎帝把反抗的部落击败，然后征服了所有部落，最后，把炎帝也击败了，最终成为当时中国各部落的总首领。黄帝有四个妻子和二十七子、十三女，黄帝把他的子女分散到当时中国——滇西的各个地方，使他们与当地的部落结合，黄帝的子孙支脉便遍布神州大地，形成了黄帝大族。黄帝还实行帝位世袭制，黄帝身后其子丹朱为第三帝，丹朱身后其子舜为第四帝，舜身后颛顼为第五帝，“五帝”之中，四帝都是黄帝及子孙执政，几代之间，黄帝族中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滇西的主体民族，为后来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帝”时代中国只是初具了国家的雏形，但尚未形成阶级社会，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是在夏朝才正式形成的。大家知道夏朝是大禹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大禹是颛顼帝之子鲧的儿子，是黄帝的裔孙，所以大禹建立夏朝后黄帝族就自然地成为夏朝的主体民族而称为夏族，夏族就是这样形成的，说明夏族源于黄族帝，是黄帝族的发展。到了公元前16世纪，夏朝的诸侯国首领契起来推翻了夏朝，建立了以契为始祖的商王朝。商朝建国伊始，由于战乱等原因，神州中国发生了人口大迁徙，夏族人口从滇西大量迁入中原和今天的中国各地，刚建立的商朝国都也从滇西迁到了中原地区的亳。当时中原大地已经有许多氏族部落，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商朝在中原建都后，把中原大地的许多氏族部落纳人它的统治范围，初步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泱泱大国的雏形。这时国家的范围极大地扩大了，而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民族仍然是夏族，这种国家体制到了周朝建立以后都没有改变，因此夏族人口从滇西

大量迁入中原和其他地区以后，夏族仍然成为商朝的主体民族。然而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夏族的民族成分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夏族人口迁入中原各地后，与当地的各氏族部落人口广泛接触、交往，互相通婚、同化，千百年后夏族中便融入了其他许多民族成分，到了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期，终于重新形成了以夏族为主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汉族。

2. 白族是黄帝族的苗裔民族

夏族既源于黄帝族，黄帝族又发源于滇西，现在在滇西是否还能找到黄帝族的苗裔呢？从滇西的历史和出土文物情况看，黄帝族的苗裔民族还留存在滇西的各民族中，其中之一就是滇西的土著民族白族。

白族学者认为："白族是一个有四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也是自古以来就居住在洱源为中心的滇西高原湖泊群边的土著民族之一"（张旭著《大理白族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页）。在洱海周围200公里范围的白族聚居区内还发现了大量旧新石器，金石并用器，青铜器遗址。宾川白羊村遗址，出土文物516件，有陶器、石器、骨器、牙器和蚌器，遗址居民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发现木结构平地房基11座，种植稻谷，驯养狗、猪、牛、羊等家畜。测定为约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相当于夏朝初期；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文物近千件，有大量的陶器和石器、骨器，还发现铜器14件，其中10件是青铜器，并有麻石制作的铜范，有铜钩，说明当时的居民已能冶炼制造铜器了。遗址是湖滨农业居民村落，发现干栅式房屋木桩224根，有稻、麦、稗、谷穗等遗物，测定为约距今3200年的青铜器文化遗址。（参见《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些历史和文化遗址都说明白族是滇西具有四千年悠久历史的土著民族。同时，它又为

白族是四千年前黄帝族的苗裔民族之一提供了历史证据。

其次，夏末、商初古代中国发生了人口大迁徙，人口大量从滇西迁人内地，国都也从滇西迁到中原，但是这些原始先民并没有从滇西全部迁走，有一部分人仍然留居在滇西故乡，其中的白族先民留居的人较多，并成为秦汉以来滇西的主体民族，它的代表人物在汉代建立过大白国，在唐朝曾与巍山蒙氏族首领建立过南诏国，在宋朝建立了大理国。这种情况与黄帝族在古代中国——滇西作为主体民族实行世袭统治的历史如出一辙，说明白族为黄帝族留在滇西的夏族的苗裔，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再次，白族是黄帝族的苗裔，从黄帝家族谱系中也能找到依据。《山海经》载曰："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据扶永发考证，帝俊、帝喾、黄帝是一个人的不同称谓，实指黄帝，帝鸿指丹朱帝，因此白民是丹朱帝之子，黄帝之孙。白民为今天的白族之先民。

再其次，当人们来到轩辕黄帝的故里兰坪县金顶镇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是白族的聚居区，他们操着一口白族语言，如果留心考证一下，还会发现这种语言与汉语不仅语法相同，许多语言的语音、语义也完全相似，并且白语中还有相当成分的古汉语。众所周知，夏族是汉族前身，夏语当然也是汉语的前身，而夏族又发源于黄帝族，那么从黄帝的故里是白族聚居区，白语与汉语有许多相同和相似的语汇这方面考察（详见下文)，也可以证明白族是黄帝族留在滇西的苗裔民族。

3. 白族语言与汉语同源

白族是黄帝族的苗裔民族之一，在语言对应关系方面也可以找到重要的依据。

白族语言自古与汉语存在着广泛的对应关系。《新唐书·南

蛮传》载曰："白蛮……言语小舛讹，大略与中夏同。"白蛮是白族古称，中夏指华夏族，即汉族的前身。说明早在唐代的古籍中就有了白族语言与汉语基本相同的记载。近代学者作过调查后指出，白族语言中汉语词汇达40%至60%（徐杰舜著《中国民族史新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版）。如果白族语言中没有汉语成分，白族语言将不能进行语言交流。

白语与汉语在声调、单音节词、量词、语序、虚词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同一性和相似性，但这种相似可能是语言接触引起的，因此这些相似还不能成为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依据。据语言学的理论认为："如果两种语言间有亲属关系，出于同一母语，那么它的意义相同或相似的词在语言上必然保持一种严格的对应关系"（徐保亚著《语言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这里所指的语言上严格的对应关系，我认为应该是指两种语言的原始基本语言上保持的对应关系。因为这种原始基本语言是初民生活中最常用、变化最慢、不可缺少的语词，只有这些语词相同，才能成为两种民族语言属于一种母语的亲属关系的证据。白族语言中就保存有与汉语在原始基本语词方面的广泛对应语词，下面仅举出六组这样的基本语词——白语与汉语在语音、语义方面全相同的语词为例：

一组：人体名称——心、肝、胆、额、脑、背、眉、鼻、腹、手、指、骨、筋、脉、齿。

二组：亲属称谓——爹、母、爷、奶、哥、姐、嫂、弟、姑、姨、表。

三组：原始物名称——刀、矛、剑、豺、狼、豹、鹿、谷、麦、豆、稗、瓜、马、羊、骡、兔、龙、凤、桃、梨、兰、花、葫芦。

四组：自然生成物名称——金、银、铜、铁、锡、水、

火、土、星、岩、洞。

五组：味觉称谓——酸、甘、苦、辣、香、腥、淡、酽、麻、涩。

六组：量词称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尺、寸、斤、斗、担。

有人说，白族语言与汉语没有亲属关系，白族语中的汉语词是汉代以后（距今2200年）中原汉族进入云南以后，才从汉语中借入的。但是据白族学者张福延（字海秋）先生考证，早在殷商时代“白族语中就保持着殷商时代的词语”即汉语。而且至今白语中还保存着许多古汉语成分。（详见张福延《剑属语音在吾国语音学上之地位》，载《南强》月刊第1卷4—5期，1937年2月本）下面我再举白语中的一些古代汉语为例：

汉语“吃饭”，白语称“饮餐”，即饮食用餐之意。汉语“穿衣（着）服”，白语称“仪衣着帛”，“仪衣”指穿衣以正仪表；“着帛”指穿着丝或麻织的衣服（古称丝、麻织品为帛）。汉语“一双筷”，白语称“著阿双”，古汉语称筷子为“著”，“著阿双”即“筷一双”。汉语“肚子饿”，白语称“腹饥渴”，古汉语称肚子为“腹”，“腹饥渴”，即“肚子饿”。汉语“砍柴”，白语称“斫薪”，“斫”音卓，砍、削之意；“薪”是古汉语，指柴，“斫薪”即“砍柴”。汉语“割谷”，白语称“芟谷”，“芟”音山，割（草）之意，“谷”是古今对谷物的通称，“芟谷”即“割谷”。汉语“屙屎”，白语称“遗矢”，“遗”古汉语指排泄，“矢”古汉语指屎，“遗矢”即“屙屎”。汉语“撒尿”，白语称“泄溲”，古汉语称排泄为“泄”，尿为“溲”，“泄溲”即“撒尿”。汉语“空闲”，白语称“暇”，古汉语称空闲为“暇”，故“暇”即空闲。汉语“肩”，白语称“膊”，古汉语也称肩为“膊”。汉语“大腿”，白语称“髋髀”，古汉语

称大腿为"髋髀"。汉语"眼闭"，白语称"瞑"，古汉语称眼睛闭起为"瞑"。汉语"大脖子"，白语称"瘿"，古汉语也称"大脖子"为"瘿"。汉语"儿媳"，白语称"子妇"，古汉语也称"儿媳"为"子妇"。白语中类似这样的古汉语是很多的，不能一一列举。《新纂云南通志》第68卷方言考·赵式铭《白文考》详加论述，可参阅。

白族语中还有与汉语的构词完全相同的一音多词、一词多义、对比词、方言、口头语等对应语词。再举数例对证：

一音多词：安（安稳）、鞍（马鞍）、庵（寺庵）；稗（稗子）、败（败仗）、拜（拜经）；薄（薄纸）、帛（衣帛）、剥（剥开）；真（真假）、针（衣针）、蒸（蒸）；心（心肝）、新（新官）、薪（薪水）。

一词多义：巴不得、巴结、巴望；功德、功名、功夫。

对比词：松紧、东西、南北、祸福、真假、善恶。

方言：俺（我——北方方言）、侬（你——汉语方言）、冇（没有——广东方言）、阿拉（我们——上海方言）。

口头语：刁蹬、骄矜、玩耍、然何、何不如、莫非。

这些语言对应情况说明，白语与汉语不是借词关系、融入关系，而是亲属关系、同源关系。白语与汉语同属一种母语，它发源于黄帝族语言——夏族语言。

4. 白族文字与汉文同根

《新唐书·南蛮传》说："白蛮（白族）……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方国瑜先生说："僰文（白文）之父，今不得见，然从前人记述，知为汉字写僰（白）音，……即用汉字记音，称之为僰文，非别一文字，即僰语中汉语成分较多，故所谓僰文，其用汉语者，写汉字，解汉义；其不同汉语者，写汉字、解僰义"（《云南民族史》）。由此可知白文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文

字，古代有白文写的书籍如《僰古通》等，但是已经亡失，不过现还能看到白文的一些遗迹，主要有“南诏有字瓦”和“山花碑”等。

“南诏有字瓦”是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建筑古城和寺庙遗址上发掘的残瓦，瓦片上印有一行行文字和符号，称作“南诏有字瓦”。如在大理、巍山发掘的唐代古城、寺庙遗址有字瓦上，有字瓦文字共51字，其中汉字有19字，占37.2%，缺笔少画的汉字有32字，占62.8%。一般称后者为“白文”，称前者为白文借入的汉字，统称为白族使用的文字——“白文”。我则认为，这些有字瓦文字，是白族保存下来的“夏文字”，也可以称为初创时期的汉文字，《中国通史简编》有：“夏朝已有原始的文字”的说法称夏朝文字为原始文字，说明夏文字还处于初创阶段，文字还不完整。夏朝建于古代中国——滇西，夏文字也当在滇西初创。后来夏灭商兴，迁都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滇西转移到内地，滇西才成为闭塞的边疆，限制了社会的进步，也限制了文字的发展，所以当商朝把夏文字发展成为殷商甲骨文，汉代又将甲骨文发展成为汉文的时候，滇西的白族还使用着汉文的原始文字——夏文字。这就是唐代建筑物有字瓦——白文的由来。

“山花碑”是明代白语词人杨黼所作《词记山花·咏苍洱景》刻碑的通称，此碑现存于大理喜洲庄洞庄圣元寺，碑文为十首七七七五的白族律诗，全诗共520字，其中写汉字、解汉义的123字，占全诗的23.6%；写白文、解白义的有13字，占全诗的2.6%，由此可见，白文已基本习用汉文。这是由于南诏建立以后，十分重视学习汉文，不断派出学生到成都学习汉文，中原学士也不断进入滇西教习汉文，几百年后，不完整的白文——原始的夏朝文字，经过汉文的长期陶冶，逐步趋于

完善，于是形成了如“山花碑”一类的白文。然而当白文正式形成完整的文字时，以汉文为母体的白文也就逐渐消失了。因为汉文的根是夏文，而白文就是夏文的原始文字，因此当白文进一步向完整的汉文字发展后，用汉字写成的白文，就只有语音上的区分，而无内容上的差别了，以汉文为母体的白文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逐步丧失了作为一种独立民族文字存在的实际意义。

白文发生、发展和逐渐消失的历史，又一次雄辩地证明，白族与汉族同源同根，它们都是发源于古代中国——滇西的黄帝民族的苗裔。

这样说，并不意味其他少数民族就不是黄帝的苗裔，事实上几千年的历史中，黄帝民族中已经融入了中华大地各种氏族、部落的民族成分，因此黄帝和黄帝族是中华民族的共祖，我只是说白族——夏族——汉族同源，同是黄帝族的苗裔民族罢了。

1998 年 1 月于云南六库

（原载《春城晚报——西北周刊》1999 年第 9 期）

大禹治水与滇西

——三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禹是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共祖轩辕黄帝的玄孙，他在历史上做了两件大事：治理洪水和建立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因此功盖九州，成为千古英雄，被后世称为大禹、夏禹或禹王。

远古时代，中国发生了一次特大洪灾。洪水滔天，淹没土地，浸漫山冈，人们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当时中国的首领是黄帝的曾孙颛顼帝，颛顼帝派他的子臣鲧领导人民治水，治了多年，没有成功，颛顼帝下令祝融杀了鲧，又派鲧的儿子禹领导人民治水，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以疏导的方法治水，终于取得成功，平定了九州水患。这就是《山海经·海内经》所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的故事。

扶永发新著《神州的发现》，提出了远古中国的发祥地在今天云南西部横断山区的新论，并认为大禹治水只是在滇西一个地方，我认为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一、对《禹贡》等史籍的存疑

关于大禹治水的事迹，战国所作《禹贡》就有记载，指认大禹治水是在中原地区，涉足长江、黄河及淮河、渭水、汉水等水流的广大流域。其中仅长江、黄河、淮水三水总流长即达

12700余公里，流域面积广达274万平方公里，包括了今天我国十几个省区的范围。后来的不少专家学者也未加思索地跟着演绎，使人们以为大禹治水走遍大江南北，足迹遍及今天的大半个中国，成了不可动摇的定论。但是认真研究一下大禹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便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力夸大的误传，只能当作神话。

大禹生活的年代约在四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即新石器晚期。当时人们以血缘氏族组成社会单位，进行共耕、采集、狩猎活动，使用石刀、石斧、石锛、竹木器等原始工具进行劳动生产，生产力极其低下；道路不开，山阻水隔，缺乏车楫之利，交往全靠步行，交通极其闭塞；地区之间，很少来往，社会极其封闭。在这样原始落后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依靠大禹一人的力量，领导几百万平方公里范围的人民，进行长达十几年的长期治水活动，并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平定九州，解除水患，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可能是历史事实。所以《禹贡》等史籍并没有把大禹治水的真实历史面貌留给后人，使后人不能不对它产生很大的疑义。

扶永发《神州的发现》，揭示出了古代中国地理位置的真正所在以及大禹治水的真正地理范围，使我们注意到古代中国及大禹治水的地理位置应该到今天云南西部地区去找寻。近几年，我结合文史资料征集工作，访求得到一些乡俚传闻和地方典籍，进一步加深了对扶永发发现大禹治水在滇西之说的认识，以下谨录几则访求所得，以证扶说。

二、大禹治理泸水老窝“天山”洪水之传

泸水县老窝乡坐落在怒江州南部的一个峡谷里，一条老窝河自东向西纵贯全境，在六库汇入怒江；境内有一座雄奇的大

山，称“自本山”，盛产锡矿，现在已进行开发生产。1990年仲夏，我到老窝乡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当问起“自本山”的山名由来时，乡里故老却讲出一段大禹到老窝治水的传说故事，大意是说远古时代洪水泛滥成灾，老窝山谷也被洪水淹没，只有高高的老窝山还露出半截山头。这时有个治水的大禹王摇着船，同他的助手来到老窝治水。大禹王带领治水民众历尽了千辛万苦，疏通了河道，终于使洪水沿着河道泻人怒江，解除了老窝水患。可是洪水退落以后，老窝有一座大山的低洼处却积起九十九塘水，居住在这里的古浪峨人就给这座山取了一个山名，叫“自本山”。“自本”是浪峨人的语言，就是“水山”的意思，一千多年前浪峨人就从老窝搬走了，但是浪峨人所取的山名还一直沿用到今天。

洪荒时代，大禹来到老窝山区治理洪水，是民间传说。民间传说，往往被后人加以夸张、渲染或移植而变异，一般不作信史看待。但又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民间传说，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却又较多地保存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情况。这类民间传说就具有史鉴和存史的价值。大禹治理老窝洪水的传说，由于出自古代浪峨人之口，它就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可鉴性。这是因为浪峨人是唐代以前滇西的土著种族，他们生活在边远封闭的澜沧江和怒江沿岸山区，极少与外界交往，更无缘与中原文化接触，本民族又没有文字，他们的民间传闻，一般仅限于自然物的崇拜、祖宗逸事、家族变迁、当地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等，未曾超越三江（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历史空间的民间传闻。这个古老的种族——浪峨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在民族兼并斗争中解体了，并从老窝迁出到怒江下游地区，分别融人到后来的彝族、怒族、景颇族、佤族之中，一部分形成了今天的阿昌族。然而在一千多年后，

老窝还流传着古浪峨人留下的乡俚传闻，这就说明，这个故事并非其他地区（如中原）传闻的移植，而是老窝历史的当事人对老窝地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留下的真实传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可鉴性。不须讳言，由于受大禹治水传统历史和书籍的影响，当听到这个传闻时，我也感到困惑，虽然相信古浪峨人的传说不是中原传说的移植，但又找不到大禹在滇西治水的历史根据，只好带着疑团离开老窝，继续到兰坪县调查采访。当我经过金顶街时，顺道登临二五山三圣宫古刹里浏览了一下，无意间却在古刹里看到扶永发 1989 年 8 月 10 日题留的一块木牌，上书红漆大字“轩辕黄帝故里”。后来又读到扶永发先生关于滇西是古代中国发祥地和大禹治水在滇西的新论，使我疑窦顿消，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感到老窝古浪峨人留下的关于大禹到他们故乡治水的传说，有了历史根据，这不是神话，而是史实。据扶永发先生考证，泸水县老窝乡境内的自本山，就是《山海经》所载的“天山”，它是当时古代中国中心地区西部的一座名山。既然云南西部是古代中国的发源地，大禹治水时来到当时中国西部的老窝山区治水，也就有其历史的可能性，而大禹到老窝治水这个历史故事又为扶氏的神州新发现提供了一个实证。

三、大禹到云龙“积石山”考察洪水之传

据扶永发考证，《山海经》载有地名相近的两座山，一座是“禹导积石之山”，指滇西北中甸哈巴雪山与丽江玉龙雪山之间金沙江虎跳峡河流的沿岸山岭；一座是“积石之山”，指云龙县境内澜沧江支流沘江与黑穗江汇流处河段的沿岸山岭。两座山岭山名相近，却各处一方。扶永发考证，大禹治水的区域在“禹导积石之山”一带，滇西民间的古代传说中，又有一

则大禹到“积石之山”考察洪水时路过女儿国的趣闻传说，两者可以相互印证。扶氏的考证已见报刊，大意是：四千多年前，中甸与丽江之间的金沙江河段，由于两岸山岭的岩体疏松，不断向江中落石，年深日久，落石阻塞了河道，造成洪水泛滥，淹没江岸土地和山庄，金沙江江岸一带变成汪洋大海。开始鲧王受命治水，用筑堤拦水的办法治水，没有奏效，鲧王被杀后，大禹继承父业，采取疏导的办法治水，领导人民将江中的积石搬走，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疏通了流道，解除了洪水危害。扶氏认为古代所传大禹治水事迹，实指大禹领导人民对今天丽江、中甸之间虎跳峡上口以上约 100 公里的金沙江河段的治理。

大禹考察云龙古代“积石之山”途经女儿国的传说，大意是大禹受命治水后，首先同他的助手到各地考察灾情，制订治理计划，然后才开展治水工程。一次，大禹同他的助手前往古代的云龙县积石山考察洪水情况，路过女儿国时，受到国王和国民殷情款待，挽留他们多住些时日，进而恳求他们留下来做上门女婿。原来这个女儿国里唯有女子，没有男子，女子进池水沐浴而受孕，但只有生下女子才成活，生下男婴到三岁就死，所以国王和国民都为没有男子而忧愁，恳切要求大禹一行留在女儿国入赘，替她们传宗接代。大禹一行因重任在身，不能耽延，几经婉谢后，才得以脱身，继续前往积石山考察。据扶永发考证，女儿国是《山海经》所载的一个古代部落，国邑在今天云龙县白石乡松水行政村沘江与稗子田河汇流处南侧水域之间的水城村，扶永发曾亲往该地作了考证。水城与积石山都在云龙县的澜沧江东岸。大禹从澜沧江上口到积石山，必须经过女儿国——水城。当然途中那些趣闻可能是附会，不足信，但沘江—黑穗江是云龙境内澜沧江的主要支流，两岸人口

分布较多，而河流常受洪水冲刷，河道阻塞，洪水泛滥的情况时有发生，洪荒年代，到处受灾，大禹来到云龙沘江流域考察洪水情况，采取治理措施，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可信的。说明大禹治水不仅在石鼓金沙江地段，也包括澜沧江支流的沘江流域。

四、大禹到大理“导黑水而人南海”之典

大禹在滇西治水的历史，不仅在滇西民间流传，在云南地方典籍中也有记载。《僰古通》是成书于大理国时代的一部云南地方典籍，记载了古代唐南诏、宋大理国时期的历史和故事，并在大理一带白族中广为流传。此书用白（僰）文写成，元代以后失传，后人根据原书加以演绎加工，用汉文出版，今尤中先生又出版《僰古通纪浅述校注》，是书首篇“云南国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南皋子曰：大禹之导黑水，通叶榆而入南海。即今大理榆城泽国洱水是也。其色黑，如渍榆叶，在当时所谓建五长以率之。”何谓黑水？何谓叶榆？何谓南海和泽国洱水？我们把扶永发对《山海经》地理的考证与之结合起来研究，就可以明了，这段文字就是对远古时代大禹治理大理洱海一带洪水的历史记载。

上文所述的黑水和南海都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古代中国地名。据扶永发考证，《山海经》记载的黑水有四条，均不同源，也不同位，一条黑水指流经滇西的澜沧江河段；一条黑水指发源于保山河图乡红庙行政村的东河；一条黑水指云龙县龙门乡李子树行政村羊人塘沟至六米河的河段；一条黑水指弥苴河，发源于洱源县西山，流经大理（古称叶榆、榆城），注人洱海，为洱海的主源河。对于海，《山海经》的记载有两种含意，一是指国家的四周，如经中所载的东海、南海、西海、北

海，大多指古代中国的东边、南边、西边、北边，而不是海洋；一是指古代中国国内较大的内湖，如滇西大理的洱海，《山海经》中称为终极之渊、从渊、昆仑之渊，因洱海位于古代中国中部偏南地带，所以又称南海。上文关于南海“即今大理榆城泽国洱水是也”的注解，也证明了洱海（即泽国洱水。泽国形容水域宽广，洱水为洱海别称），古代称为南海。通过这些研究，即可明了，古人南皋子所曰：禹导黑水于南海，说的就是洪荒时代，洱海（南海）的主源河发生阻塞，引起洪水泛滥，危及大理（叶榆）。大禹亲往其地，安营扎寨，并委派五个首领，率领民众治水，终于排除阻塞，将弥苴河水导入洱海，解除了大理的水患。它为大禹在滇西治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生动的实证。

上述几则，有古老传闻，有古籍实录，有今人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比较翔实具体地反映了大禹治水的历史功绩，说明中国古代确实出现过一个洪荒时期，大禹是一位人民英雄，他领导人民在河水（金沙江）、黑水（澜沧江）、赤水（怒江）流域和南海（大理洱海）周围，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治水工程，并取得了重大成功，治平了九州洪水。并且说明了大禹治水的区域就在今天的滇西地区，而不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这样，这些传闻和记载又从另一侧面证明，滇西是远古时代神州中国的发祥地，大禹生长在古代中国——滇西，并在滇西这块神州大地上，完成了治水的千秋大业。

（原载《怒江报》1995 年 1 月 11 日三版）

西周国与福贡利沙底

——四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风景奇异的山乡叫石月亮乡。境内有一个自古就有的喀斯特通透圆形溶洞，高悬在海拔3千多米的高黎贡山顶峰，溶洞背衬蓝天白云，人们从江岸仰望，酷似一轮不落的月亮永挂天边，故名之曰“石月亮”，其坐落的地方也就称之为石月亮乡了。石月亮乡的乡政府所在地利沙底村，还是远古中国“西周国”部落的“国邑”故址，却是鲜为人知的。

关于西周国的情况，在《山海经·大荒西经》里，有如下记载：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经文大意为：西周国人姓姬，务农，食五谷。一人驾牛做着开始耕地状，是西周国在《山海经图》上的地理标志。耕地人叫叔均。帝俊生了后稷，传说后稷从天上把谷种带到地上，是我国农业的创始人。后稷有一个弟弟叫台玺，台玺生了叔均。叔均代他的父亲和伯父在西周国土上耕种百谷，农业耕种从此开始。有赤国妻氏；有山，叫双山。

这段经文，记载西周国的地理及一些历史人物、事象，与利沙底和中国历史都有关系，我们分别作一些探讨。

经文说：“西周之国，姬姓”。姬姓，据《说文解字》注：“姬，黄帝居姬水，以姬姓。”是知黄帝族姓姬，西周国属黄帝族的部落。西周国的来历如何？《史记·周本纪》记载：“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邰是远古中国西部的地名，弃被封为邰的酋长，建立西周国，弃取号后稷，成为西周国的始祖。西周国部落由此产生。关于后稷的出生，古代传说中称：古代有一个王妃，名叫姜原，一天她到池沼附近，发现地上有一个巨人脚印，便好奇地把脚踏上去比试，结果感而受孕，九月后产下一子。姜原认为不吉利，派人将婴儿丢出宫外，但是丢了三次孩子在冰天雪地里仍毫发未伤，姜原以为是上天所赐，又才派人把婴儿抱回宫中抚养，取名弃，意为孩子曾被抛弃过。弃长大以后，取号后稷，封到西部邰的地方，在这里建立西周国（部落），成为西周国姬氏的始祖。这大概就是后稷和西周国的来历。

扶永发用以水定山的方法，考证出西周国国邑故址在福贡县石月亮乡乡政府所在地利沙底。福贡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也经常到利沙底。与《山海经》记载的地理相对照，谨提出以下佐证。

“赤国”之证。经文说：“有赤国妻氏”。古代传说中，王妃姜原出生地在西部邰的地方，姜原是有邰氏之女，“赤国妻氏”中的“妻氏”指的是姜原。“赤国”又在何处呢？“西周国”这段经文的上文载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扶永发考出，“赤水”是古代对怒江的称谓，即指怒江。并考出赤水之东的长胫国故址即在福贡县怒江东岸的鹿马登村。从鹿马登村沿怒江北上30公里，就是位于怒江东岸的利沙底村，即西周国国邑故址。是知“赤国”的“赤”指怒江，“赤国”指西部赤水邰的部落，“赤国妻氏”即指王妃姜原

生于西部邰的地方，这个地方包括了西周国所在地的利沙底。

“双山”之证。经文说：“有双山”，指西周国所在地有两座山。利沙底坐落在怒江东岸，东面有碧罗雪山，西面有高黎贡山，利沙底位于两座大山之间，“双山”就指这两座山，而非指山名。

“方山”之证。《山海经·大荒西经》在“西周之国”这段经文的下段经文载曰：“西（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从上下文连读看来，“方山”当指西周国境内之山；再从“日月所出入”的山形特征来看，则这座“方山”非“月亮山”莫属。月亮山是福贡县石月亮乡（原名利沙底乡）境内怒江西岸高黎贡山的一支山峰，此峰海拔3000多米，山体呈长方形，故古称为“方山”。峰顶有一个巨大的通透溶洞，洞高40余米，宽36米余，洞内长着一棵大青松。溶洞呈椭圆形，背衬蓝天，从江岸向上仰望，犹如一轮永不下落的十五满月永悬山顶，被当地傈僳族居民形象地称为“亚哈巴”，即汉语“石月亮”。月亮山峰顶的“石月亮”，从东面的江岸向上眺望，就像太阳或月亮将要从西面山顶落下去；如果从西面的山下向上眺望，又像太阳或月亮刚从东面山顶升起来。所以《山海经》把方山记为“日月所出入也”之山岳，意思指方山为太阳或月亮升起和落下的山岳，这样的写法似乎荒唐，但对月亮山而言则是记实之笔。《山海经》一共记载了东方的“日月所出之山”六座，西方的“日月所出之山”六座，这些记载符合自然地理现象，无人非议，但是对方山为“日月所出入也”的记载，令人大惑不解，并且曾引起种种猜疑和争议。袁珂先生按曰：“此方山为日月所出入唯一之山也，然而地在西荒，何可云‘出’，此神话之山，诚不可以常理推矣。”认为“方山”是神话传说的山，不

能按一般山看待；有的学者又认为，西荒山岳，不会有太阳升起之山，怀疑后人在《山海经》此处经文中羼入了一个“出”字，才成了“方山……日月所出人也”之怪文，于理不合，因此主张把文中的“出”字剔除，恢复为“方山……日月所入也”，才合情理。“方山”是“神山”，还是“真山”但文中羼入一个“出”字，史家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但是如果史家能亲临怒江一看高黎贡山的“石月亮山”，就会相信“方山”确有其山，而并非虚渺的“神山”，“日月所出人”的现象也确实存在，它是大自然造化的特殊景观，《山海经》作者只是把它作了形象化的记载而已。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石月亮位于利沙底对面怒江西岸高黎贡山上，属于古代西周国境内的山岳。“石月亮山”的特殊地理构成，与《山海经》记载中“方山”的特殊地理特征的吻合，进一步证明福贡县石月亮乡利沙底为古西周国国邑故址的考证是正确的。

考古之证。提起“石月亮山”，就要联系到石月亮山下的考古发现。1984 年，怒江州、县文物普查队，在“月亮山”下傈僳族居住的米俄鲁村附近发现了许多石斧、铜石并用铜斧等石器物，据考证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出土遗存，距今已有四千多年。这些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说明怒江两岸很早就有了人类生息活动，也为西周国等原始部落在怒江的出现提供了重要证据。此外，在怒江傈僳族中，广泛流传着的“石月亮”传说故事，也说明这个地方是远古先民的发祥之地。传说洪荒时代，千里怒江只留下启沙、勒沙两兄妹。后来，怒江里龙王之女靓妹上岸游玩，爱上了启沙。龙王大怒，发起大水，要把启沙兄妹淹死。这时，天神为他们送下一只船和一张弓。启沙兄妹和龙女乘上木船，向山顶射了三箭，山顶被射穿一个大洞泄了洪。启沙兄妹和龙女终于幸免于难，回到江边。后来，启沙

和龙女结为夫妻，生下九男七女，勒莎则化作怒江上的一道虹桥，让兄嫂的儿女们通过虹桥，走向四面八方，重新繁衍了人类。那留在山上的大洞，就称为“石月亮”。从此，傈僳族就把“石月亮”当作他们祖先的发祥地。可见，怒江大峡谷并非“荒蛮不化之地”，它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并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发源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食谷”之证。经文说：“西周之国……食谷。”《山海经》在记载各地的部落情况，也多有“食谷”、“食黍”、“食鱼”、“食兽”、“甘木是食”等等记载，这些并非赘笔，而是不同地区的民族种群社会生产力的客观写照。“食谷”、“食黍”，代表这些族群已进入农业经济，人们生活以粮食为主；“食鱼”、“食兽”、“甘木是食”，代表这些地方的部落族群，还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人们生活以捕捞鱼类、猎取野兽和采集野生植物为主。可见，《山海经》记载的四千多年前的远古中国，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晚期，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西周之国这时已从事农业生产，说明它的生产力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为什么处于怒江高山峡谷里的西周国原始部落，这时已经有了生产力比较先进的农业经济呢？从经文看出，它与后稷不无关系。经文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经文提到后稷的身世，我们留后再议，先说“稷降百谷”，其实这是一段古代神话，传说后稷上通天神，下解民困，因见天下无禾，人们靠狩猎采集为生，十分艰辛，于是就从天上把农作物种子带到人间，教会人们播种百谷，以裕民生。后稷因此成为古代神州中国农业的发明者，被尊称为“神农”。这里，如果我们撇开神话不论，来看看怒江的生物情况，或许还能找到“稷降百谷”的原因。怒江大峡谷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它成为各种动植物资源的“基因库”，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这在拙作“《山

海经》与‘三江并流’”一文中，已经作了详细论述，不再赘言。据植物学专家考察发现，怒江是我国不多的几个野生稻产区之一。世居怒江的独龙族和一部分傈僳族、怒族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还没有水稻种植，但是很早就会撒播旱谷，这种旱谷就是从野生稻驯化而来的谷物。其实，许多农作物，都是从野生植物中驯化、培植出来的。可见，后稷生长于西周国所在地怒江峡谷，他对当地的植物进行研究，发现和驯化了农作物种子，这是可能的。后稷驯化了谷物种子以后，首先在西周国进行试验，让他的侄子叔均开始驾牛耕地播种，经文故曰：“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后稷发明了农业种植，亲自把作物种子和播种技术传授到神州各地，自己也行踪不定，死后就葬于氐国。所以《山海经·西山经》载曰：“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指黄帝登临槐江山，眺望神州山水，看见后稷在大泽旁边的水田中耕作。扶永发考出，大泽故址为兰坪县通甸乡福登村下面的谷地。我曾到此地作过考察，发现大泽已经干涸，大泽故址已垦殖成为庄稼地，只有一条通甸河源头在此通过。但庄稼地下面仍可发掘出河石和沙泥，当地老人也说，传说这里古代曾有一个小海子（当地的人称大泽为“海”）。可见远古时代，福登村下为大泽，后稷在此耕作当是可信的。再如《山海经·海内西经》载曰：“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指后稷死后，葬于山水环绕的氐国西面。扶永发考出，后稷所葬的坟墓，在距保山市城约10华里的皇家坟山。皇家坟山东临澜沧江，西连怒江，与“山水环之”的地理环境相吻合。《山海经》的上述记载，说明了后稷生长于怒江中游的西周国，活动于神州各地，死后葬于怒江下游的氐国西，这正是后稷作为我国农业发明者，为了传播农业种植而奔走各地，劳碌一生的最后归宿，不仅可信，而且可敬。

“后稷”之考。前面提到经文有载：“帝俊生后稷。”是知后稷之父为帝俊，帝俊当是古代神州中国“五帝”中之一帝。但从《史记》排列的五帝（即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来看，其中又没有“帝俊”。帝俊是谁呢？从《山海经》的考证来看，注释家郭璞云：“俊宜为喾，喾第二妃生后稷也。”注释家郝懿行又云：“帝喾俊名，俊疑古今字，不须依郭改俊为喾也。”说明“俊”与“喾”实为一人，“俊”是“喾”的名号，帝俊就是喾。那么帝喾又是谁呢？我们从《山海经》的记载和考注中也可得到答案。《山海经·海内北经》载：“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注释家袁珂注云：“‘众帝之台’，乃禹杀相柳所筑台以厌妖邪者也，尧、喾、丹朱、舜即所谓‘众帝’”。这是说，大禹在治平洪水后，为了镇水安民，在洪水发源地筑了四位已故帝王的纪念台，当时第五帝颛顼还在位，所以没有筑帝颛顼台。据扶永发考证，禹筑“众帝之台”的顺序，代表了我国古代“五帝”承前启后的关系，“五帝”的前后排名，应该依“众帝之台”排列，即尧、喾、丹朱、舜、颛顼。又，我国古代都把炎帝和黄帝列在“五帝”之前，称炎、黄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因此，依“众帝之台”的排列，“五帝”中的第一帝为炎帝，帝号尧，又称帝尧；第二帝为黄帝，帝号喾，又称帝喾；第三帝为鸿帝，帝号丹朱，又称帝丹朱；第四帝为舜帝；第五帝为颛顼帝。从以上考证中可知帝喾就是黄帝，帝俊、帝喾、黄帝实为一人三名。后稷实际是黄帝之子，为黄帝第二妃所生（据郭璞考）。据《山海经》各经记载得知，黄帝有雷祖、常羲（可能又名姜原）、羲和、娥皇等四个妻妾，共生育子女 44 人，其中男 32 人，女 12 人。黄帝把众多的子女分别安置到神州中国的四方，建立氏族部落，成为各地的酋长

（诸侯）。经过几十代的繁衍生息，黄帝根系就遍布于神州中国各地，成为中国各民族的原始先民，后来，黄帝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从遗传学来说，这是正确的。

我们从上述考证中可以看出，石月亮乡的石月亮不仅以它的神奇造就了怒江的千古名胜，还以身边演绎的壮丽历史，使它成为解谜西周国的考古圣地，怒江因它而芳名远播，傈僳族还骄傲地以“我们的石月亮”自称。

北狄国与贡山丙中洛

——五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天民之国，食谷……”接着又说：“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远古时代，把中国称为“海”，“海外”实指边疆，“赤水”是指今天的怒江。上述这段经文，可以这样理解：在古代中国的西北极边，有一条南北纵流的怒江，怒江西岸，有一个原始部落，叫天民国，沿西岸往北，又有一个原始部落，叫北狄国。北狄国是北狄这个氏族的部落群体，北狄又是一个人的名字，即北狄是始均的儿子，始均又是黄帝的孙子。据扶永发先生考证，古代“天民国”的故址位于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简称贡山县），怒江西岸茨开乡丹打（村）为县城所在地，“北狄国”的故址又在贡山县城丹打沿江以北的丙中洛乡所在地丙中洛村。这两个地方我出差常去，对它的地理和历史情况略知一二，拙文斗胆谈谈北狄国与丙中洛的关系，对北狄人的下落也作初步探索。

一、北狄国故址在丙中洛的根据

丙中洛位于怒江州贡山县最北部，北与西藏接壤，西与缅甸、印度相邻，是中缅、中印、滇藏的结合部。远古时代神州中国的原始部落北狄国为什么曾经在这里出现，需要我们作多方面的探索。

——民族渊源追溯。丙中洛乡所在地丙中洛村现在的居民多数是藏族，但藏族还不是当地的原始民族。大约在二百多年前，西藏喇嘛来到丙中洛村传教建寺，并从西藏、德钦、维西迁来 75 户藏民为寺庙佃耕，从此藏族才在丙中洛地方生息繁衍起来。丙中洛乡的原始土著居民则是怒族，怒族分布在全乡各地，现有人口 3080 人（1995 年统计数），占该乡总人口的 50.1%。当地怒族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创世纪》即“洪水滔天”传说故事，大意是：远古时代，洪水滔天，人类毁灭了，只有两兄妹爬到最高的卡瓦卡博山（位于丙中洛西面，海拔约 5128 米，终年积雪）上，才幸免于难。后来兄妹成婚，生下九男九女，他们长大后，又配对成双，从卡瓦卡博山走向九条江的流域定居生活，只有最小的一对兄妹夫妇留下来在怒江定居，被人称为怒族。怒族的《创世纪》传说说明，丙中洛不是一个荒野的角落，而是古人类的起源之地，是怒族先民的摇篮，它为古代中国的原始部落北狄国在这里形成提供了依据。

——古地名人名遗存考证。根据怒族《创世纪》传说，丙中洛是古人类的发源之地，这只能为北狄国在丙中洛的形成提供可能性，却还不能完全证明北狄国的故里就是丙中洛。要找到北狄国故里的确切证据，还要进行多方面的考证，其中对丙中洛古地名和人名遗存的考证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就从这里作一番考究。首先要说明，“丙中洛”这个地名不是这个地方的古地名，“丙中洛”是藏语，即“藏族村子”的意思，显然它是两百年前才迁居到这里佃耕的 75 户藏族农民给自己的新居地取的藏语村名；还要说明，“怒族”这个族称也不是古来就有，它最初出现在元朝，《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条”载：“丽江路，蛮有八种，曰么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番、曰卢，参错而在。”其中“卢”指怒

族，"撬毛"指独龙族。而元朝元年到现在也只有七百多年，在此之前的史籍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怒族"这个称谓。因此丙中洛地区的原始地名和原始居民怎么称谓？怒族是不是北狄国氏族部落的苗裔民族？这些问题还需通过对当地民间传说和古地名和人名遗存的考证，才能作出回答。

丙中洛的怒族把他们的祖先发祥地指认为卡瓦卡博山。卡瓦卡博山坐落在贡山县丙中洛乡与独龙江乡之间，独龙江乡在山之西麓，丙中洛乡在山之东麓。独龙江乡的居民独龙族中也流传着与怒族完全相同的《创世纪》传说故事，独龙族同样把卡瓦卡博山指认为他们祖先的发祥地。我们将丙中洛怒族与独龙江独龙族的语言作比较，又发现他们除了个别方言之别外，操的是同一种语言，两地的两个民族互相通话没有困难，两地两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也基本相同。由此可见，丙中洛的怒族和独龙江的独龙族，实际是分居两地，各以地望命名而形成两种族称的同一个民族，是同一个祖先的苗裔。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各地各民族的自愿，分别命名为怒族和独龙族。所以在探索丙中洛怒族的族源时，我们有必要将丙中洛怒族和独龙江独龙族地望和民族联系起来研究。这里，贡山怒族、独龙族民间传说的《创世纪》就是追寻古代"北狄国"之所在和怒族、独龙族之族源的重要依据。《创世纪》说："九兄妹长大了，他们的父母就按排行秩序，把他们配成九对夫妇"，即阿捧（大哥）配阿南（大妹）、阿顶（二哥）配阿领（二妹）、阿肯（三哥）配阿开（三妹）、阿省（四哥）配阿都（四妹）、阿狄（五哥）配阿请（五妹）……然后把九对夫妇从卡瓦卡博山分别安置到九条江的流域，去生息繁衍，重新发展人类。"其中"阿狄"（五哥）这个名字与北狄国的始均之孙北狄是同名（即"阿"狄的阿为助词，"狄"是名；北狄的"北"地望，"狄"为名，

故谓同名），现在当地怒族和独龙族中还有许多人以狄字冠名，如狄（迪）新华、狄（迪）秀英、狄路、狄南顶等，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古代北狄国人名的重要遗存，说明丙中洛、独龙江两地的怒族和独龙族就是古代北狄国北狄先民的苗裔。我们再从地望来看，丙中洛乡现在还保存着怒族古老的村名狄麻鲁（该地区的一个行政村），独龙江乡由于有大雪山之阻，较在怒江的丙中洛更加闭塞，受外界的影响更少，所以保存的古地名就比较多，这里以狄为村名的地名就有狄（迪）政当、狄朗当、狄南、狄门当、狄京当、狄布里、求狄等，而且以狄为村名的独龙族居民大多又以狄字冠名，因此独龙江乡狄是大姓，称狄某某的人特别多。这些情况证明，古代中国的原始部落北狄国的故址在丙中洛这一考证是确切的、站得住脚的。从民族人口的发展、分布规律来看，从广义上说，今天怒江州贡山县境内的怒族和独龙族都是北狄国原始部落的苗裔民族。

——文化遗存探源。贡山境内的怒族、独龙族既然是古代中国北狄国原始部落的苗裔民族，那么在这些民族中现在是否还能找到北狄国原始部落的文化遗存以资佐证呢？回答是肯定的。就以与北狄国故址丙中洛仅有一山之隔的独龙江而论，过去由于这里僻处雪山深谷，山河梗阻，道路不开，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时也就保存了北狄国时代原始社会的许多文化遗存。在社会组织和生产生活方面，独龙族以血缘大家庭组成村落社会，每个大家庭由祖孙三四代人组成，几十口共同居住一座长竹楼，进行共耕、狩猎、采集活动，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庭的长竹楼中虽然有若干房间，每间房里设了一个火塘，代表一个小家庭，但这些小家庭基本没有财

产，土地属于大家庭公有，劳动生产由家族长组织进行，收获归家族所有，只是生活上由每个小家庭的主妇轮流煮饭，而做好的食物仍由家族中年长的主妇负责平均分配给家族的每个成员，谁也不能多得。使用的劳动工具是石斧、石刀、竹木农具，铁器到近百年才传入独龙江，由此开始用巴掌大的铁勾锄挖地，砍火烧山，粗放耕作，所以生产力极其低下，每年收人的粮食仅供食用三四个月。每到粮食吃完，家族主妇便宣布断炊，全家族的人便自动上山狩猎、下河打渔、采集草根野果，收获同样归家族统一平均分配。住的除长竹楼外，有的还住树穴、岩洞。穿的是自种自纺的麻布，有的穿不上衣，用一块木板系在腰间遮羞。在婚姻和习俗文化方面，独龙族已由对偶婚转向不稳固的一夫一妻制。同时又流行妻姊妹婚、非等辈婚、家长多妻和氏族环状外婚制等。民间普遍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以剽牛祭天祈年，以杀牲祭鬼禳灾。独龙族妇女还保存着文面的习俗。从上述概略的介绍中可以说明，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延缓了独龙族的社会历史进程，从而较多地保存了原始社会的遗风和特征，这一切又为这里曾经是古代中国北狄国原始部落的活动范围，并为了解北狄国原始初民的社会和生产情况提供了生动具体的活证。

二、对北狄人迁徙及其下落的探讨

扶永发先生在《神州的发现》中提出，古代中国曾发生过多次人口大迁徙，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距今 3600 多年前的夏末商初年代，这次大迁徙连商朝的首都也从滇西迁到了中原。从古代中国发源地滇西迁出的人口遍布于今天中国的四面八方，并且分布到了周边国家，使炎黄子孙遍布于国内外。这里扶永发虽然没有专门指出北狄国人口的迁徙情况，但是从国

内外的一些地名遗存、民族人口分布和族源考古资料中，仍然可以找到北狄部落人口迁徙的踪迹，说明在距今四千年前后，发源于贡山丙中洛的北狄国部落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

我们先来看看国内外学者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论述。

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曾经指出："自契至汤八迁。"契是夏朝君主，汤是商朝开山鼻祖，从契到汤经历了十四世，共三百余年，就是说在商朝初年以前的三百多年中，古代中国（夏朝）的人口曾经发生过八次迁徙。

前苏联学者斯·伊·布鲁克在对中印半岛进行考古发掘后著书《印度支那各国的民族民分和人口分布》，书中说，考古发掘证明，在纪元前二千年代末，有大批原来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孟—高棉的部落，南迁人中印半岛。据尤中先生也考证指出，孟—高棉人南迁以前，是云南的土著民族。这些国内外学者的论述说明，中国在古代出现过人口大迁徙，大迁徙的发源地在云南（滇西），迁出的人口不仅遍布于今天的中国大地，而且分布到了周边国家。根据我在怒江各地的调查发现，在这些大迁徙中，古代北狄国部落也汇人了这些大迁徙的人流。

关于古代北狄国部落迁徙的历史，在贡山丙中洛、独龙江等地的怒族、独龙族中也有传说，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洪水滔天"的故事。故事说，九兄妹配成九对夫妇以后，分别走向九条江的流域，各自安生，繁衍后代，重新发展了人类。故事还说九对兄妹夫妇，一对走到了缅甸成了阿普族，一对走到了内地成了汉族，一对走到了怒江成了怒族，一对走到独龙江成了独龙族……

诚然我们不会把传说故事当成历史，但是也不能否认传说

故事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只要我们对北狄人苗裔现在的分布情况进行认真的考察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创世纪》传说实际是古代北狄国部落人口向四面八方迁徙历史的真实记述。

先谈故事中所说的一对夫妇走到了缅甸，成了阿普族的问题。阿普族是独龙族对今天景颇族的称谓，据学者洪俊教授考证，景颇族与独龙族同源，古代共同在一个地方生产生活，后来一支人迁到缅甸，成了景颇族。现在独龙语言划属景颇语支；两个民族都实行氏族环状外婚制，这种婚制在国内各民族中只有独龙族和景颇族实行；独龙族中有“江木雷”和“木江”两个氏族，景颇族中也有相同称谓的两个氏族；独龙族与景颇族的许多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也都相同（参见洪俊《独龙族源初探》，载于《怒江文史资料选辑摘编》上卷）。景颇族分布在缅甸北部恩梅开江流域的广大区域和我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简称德宏州）各地，在恩梅开江流域景颇族聚居的“浪速地”，现在还保存着北狄国的一个古地名——“狄麻鲁”。“狄麻鲁”是北狄国故址丙中洛地区的一个行政村村名，坐落在怒江东岸的碧罗雪山上，是怒族聚居的村子。这些情况说明，分布于缅甸和我国境内的景颇族与贡山境内的独龙族和怒族同源，他们同是北狄国部落的子孙，他们的先民同在贡山卡瓦卡博山下共同生产生活，后来才分支迁徙，到缅甸和我国滇西各地定居，而在他们到了新的定居点后，就把北狄国故乡的地名也带到那里，为新的居住地命名，恩梅开江流域的地名“狄麻鲁”就是这样从怒江搬过去的，现在这个地名又成了北狄国部落向南迁徙的历史证据。

北狄人向南迁徙的路线是从丙中洛境内的怒江沿岸越过高黎贡山，进入独龙江，再沿江南下，进入缅甸北部，先在恩梅

开江上游定居，再逐步向中下游地区南迁。现在与独龙江乡紧邻的恩梅开江上游地带还留下许多北狄人迁徙时搬到那里的北狄国地名，如河流名中就有狄子江、狄不勒江、狄满江；村落名中就有狄子图村、狄洛朗村、狄不图村等。狄子江沿岸的居民还被称为“狄人”，其他地方的居民被称为“曲人”、“日旺人”，而这些民族所操的语言都是独龙语言，他们也公认其先民自怒江和独龙江南迁而来，由此可见，这些民族都是北狄民族南迁发展起来的苗裔民族。

再谈故事中所说一对夫妇走到了内地，成了汉族的问题。从我国人口的分布历史分析，北狄国部落人口向内地迁徙的路线主要是从丙中洛沿怒江北上，进入西藏，再越过青藏高原，逐步向前迁徙，最后才来到北方定居，并与当地的民族融合，成为古代北方的北狄民族。我国历史上曾经把各民族的分布区域称为东夷、南蛮、西羌、北狄，北狄就是指我国北方分布着“狄”的民族。这个“狄”民族实际是从南方的滇西极边丙中洛迁徙过去以后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创世纪》说：“一对夫妇走到了内地，成了汉族。”指的就是北方的北狄民族。传说中把他们称为汉族，这是因为僻居怒江极边的少数民族，与内地极少交往，不甚了解内地的民族情况，因此把内地的民族统称为汉族。所以他们把本是同宗支系而走向内地的北狄兄弟，称为汉族，也就在情理之中，不能因为称谓的差别而否认北方狄人民族是南方北狄部落的苗裔民族这个族源历史。

北狄人在向北方迁徙的过程中，还沿途留下了他们的部落族民。如与丙中洛交界的西藏察隅地区、滇西的维西、德钦地区，都有怒族、独龙族人口分布，这些人口也是北狄人迁徙中留在这些地方的苗裔。

北狄人在大规模地向南北两个方向迁徙的同时，还有一部

分部落人口向东部方向迁徙。他们迁徙的路线是先从丙中洛沿怒江南下，再转向东方，翻越碧罗雪山，进入兰坪、剑川、丽江一带定居。北狄人迁入这一带地区，还有寻宗的目的。北狄国的创始人北狄是黄帝的重孙，黄帝的故乡在兰坪，活动在剑川、丽江和洱海周围，北狄的后裔向祖先的发祥之地迁入，自然是合理的选择。迁入这些地区的北狄人，后来基本上与当地的民族融合了，但丽江的巨甸乡还留下一个怒族村子，剑川金华镇的一个村子还保存了北狄国的古地名——“狄麻鲁”，使我们还能找到北狄国向这些地方迁徙的踪迹。

至于北狄人留在怒江和迁居独龙江的问题，我想已经在上文的论述中讲清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关于北狄国与丙中洛的关系，我的探索还相当肤浅，但就这些初步的探索，也说明了滇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我国著名的北方北狄民族和南方景颇民族，就发源于滇西极边的贡山县丙中洛这块神圣的土地上。

（原载《怒江报》1995 年 3 月 8 日三版）

远古神州与怒江大峡谷

——六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怒江大峡谷，随着“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申报成功和自然生态、民族文化旅游的兴起，开始被人们所识知，并且在人们的关注下，一天天被抹去厚重的历史尘埃，逐渐显露出它的厚重的文化底蕴。当人们将“天下第一难书”《山海经》同东方大峡谷的地理历史一起解读的时候，神话不再是扑朔迷离、虚无飘渺，“千古之谜”也变得伸手可触，一朝破解，她似在向世人昭示：这里，怒江大峡谷，它是古神州中国昆仑山的所在地，它是远古华夏歌舞文化的摇篮。

一、“昆仑山”，在怒江大峡谷

《山海经》所记载的是远古中国的地理和历史。《山海经》记载的远古中国位于昆仑山。也就是说，古代中国坐落在山区。因此，找到昆仑山山区，才算真正找到了远古中国所在的位置。

几千年来，无数炎黄子孙、名人学士，包括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等等，都曾历尽艰辛，苦苦寻找这座古昆仑山，以期对祖先发祥地进行永久的仰谒，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结果，这座祖先发源的远古之山始终没有找到。出于无奈，后人便将今天我国西北的昆仑山当成了远古的昆仑山。然而，古昆仑山却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体，在它的周围有着明显的地理标志。《山海经》

明确指出，昆仑山的北方，有“冬夏有雪”、千年不化的雪山五座；南方，有一个位于北回归线附近，“正立无景（影）”的寿麻国；西南方，有投物辄燃的“炎火之山”；昆仑山境内从南到北，有“日月所出之山”六座，从北到南，有“日月所入之山”六座，说明昆仑山的山脉为南北走向。这些地理标志为千万年不变的物体，只有这些周围的物体与昆仑山完全对应，才能宣示：真正找到了古昆仑山。但是今天我国西北的昆仑山是华向坐落，为东西走向，与古昆仑山的南北走向大相径庭，四周也找不到上述地理标志物体。因此，将今天的昆仑山当作古昆仑山，不足为据，说明古昆仑山一直没有找到，古代的神州中国在哪里，始终是一个千古不解之谜。

20世纪90年代，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地理地图工程师——扶永发先生，按照《山海经》的记载，以地理学者式的眼光，熟练地操作手中的地理地图比例尺，潜心研究，实地考证，终于将古昆仑山找到了。他以事实为根据，写出《神州的发现》一书，向世人宣示：滇西横断山区（山势为南北走向），就是古昆仑山的原址，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发祥地不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而在云南西部横断山脉之中。真理不唯其大，只求其实。扶永发的一家之说，必将经受历史的检验而为历史所接受。

披阅古籍和地名志，东方大峡谷的山脉确有古代称为昆仑山的记载。在这里，我们仅以东方大峡谷的山水地名遗存，与《山海经》有关地理记载进行比照，以证扶说。

东方大峡谷，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别称，由于州内有怒江、澜沧江、独龙江和云岭、碧罗雪山、高黎贡山、担当力卡山横向排立，形成四山夹三江的大峡谷奇观，与西方科罗拉多世界大峡谷齐名，而被誉为东方大峡谷。怒江大峡谷是“三江

并流”的核心地带。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燃。”据扶永发考证，“西海”指现在滇西的最大内湖洱海；“流沙”有多处，此处指保山境内的怒江沙岸；“赤水”有多处，此处指怒江；“黑水”有多处，此处指澜沧江；“炎火之山”，指腾冲火山。后续经文又载：“有寿麻之国……寿麻正立无景（影），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扶永发考出，滇西横断山脉南部的耿马县孟定镇境内的孟定坝，为古寿麻国故址，此处距北回归线极近，海拔在500米以下，气候炎热，中午立于太阳地上，没有投影。

根据上述考证，可以看出“西海之南”（此处脱了“西”字，应为“西海之西南”），指洱海西南部的东方大峡谷。东方大峡谷从东向西看，境内的高黎贡山在怒江后面，澜沧江则在碧罗雪山前面，所以，经文所载“赤水（怒江）之后，黑水（澜沧江）之前”的“昆仑丘”，就是指夹峙怒江、澜沧江两条水系的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两条山脉。“炎火之山”的腾冲火山，坐落在高黎贡山西边，“正立无影”的耿马孟定坝则在东方大峡谷的南部，这些地理地物既是确定远古中国地理位置亘古不变的地理标志，也是确定东方大峡谷境内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为古昆仑山（“山”与“丘”同义，昆仑丘，即昆仑山）的有力证据。

《正德云南志》载：“高黎贡山，本名昆仑冈，夷语讹也，在永昌西，腾越东。”《读史方舆纪要》也载：“高黎贡山在永昌府腾越东北一百二十里，一名昆仑冈，夷语讹为高良弓山。”1984年出版的《保山市地名志》对古“昆仑冈”改称“高黎贡山”的历史原因作了考证，载曰：“高黎贡山，在腾冲东

120里，旧名昆仑冈，界潞江龙川江之间，蒙氏曾封为西岳。……公元八世纪定居在云南西部的景颇族称‘高日硔’（或译为‘高黎贡’）、‘高良工’、‘高丽’，今译作‘高日’（是姓氏，汉姓排），古译作‘共’，今译作‘硔’（是‘地方’的意思）。意为‘高日’这一氏族的‘坡’或‘地方’。”这个考证说明，昆仑山是因景颇族的高日氏族迁入居住后，以其氏族名冠山名而改称高黎贡山，它的古代名称实为昆仑冈（“冈”与“山”同义，昆仑冈即昆仑山）。

从这里使我们联想到，远古中国的古地名，随着夏末商初人口的大迁徙，被搬到了中原、西北、中南各地，但是总还有一些古地名在当地保存下来。《山海经》与云南史志关于古昆仑山记载的对应吻合，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历史的重合，而不是人为的附会或巧合。说明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为昆仑山的考证是准确的。《山海经》对昆仑山有多处记载，其包括的地理范围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昆仑山是指远古中国的整个地理范围，与古代中国称“九州”、“神州”同义，扶永发考出滇西横断山区为远古中国发源地，因此滇西横断山区总称古昆仑山（或昆仑丘），这是广义的昆仑山；狭义的昆仑山则指古代中国境内的某一山或某几座山。如《山海经·西次三经》所载“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中的昆仑丘，即指大理洱海西面的点苍山和洱海东面与鹤庆县之间的界山。上文所引“赤水之后，黑水之前”的昆仑丘，则指东方大峡谷的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这些就属于狭义的昆仑山。

古昆仑山是远古神州中国的地理载体，怒江大峡谷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为古昆仑山脉之一的考出，是对扶永发神州中国发现的又一重要支持，同时也向世人宣示，几千年来华夏子孙苦苦寻找的古昆仑山在怒江大峡谷，怒江大峡谷是中华民族发

源地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傈僳族，怒江大峡谷的古老民族

在对东方大峡谷的远古地理作了探讨之后，引申出来的问题必然是东方大峡谷的历史文化是谁创造的？他们的后裔现在在哪里？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说明：扶永发先生已经考出怒江大峡谷东部的兰坪县金顶镇所在地文兴街是远古中国轩辕国部落国邑故址和中华民族伟大始祖轩辕黄帝的故里，对此我在《轩辕黄帝新探》一文中也作过探讨，提出了黄帝族创造了怒江大峡谷东部古代文明，白族是黄帝族苗裔民族之一的意见。因此，本文只就怒江大峡谷西部的民族及文化渊源作一探讨。

循着《山海经·大荒西经》指示的地理方位，来到东方大峡谷西部怒江大峡谷，这里耸立着古代称为昆仑山的两座大山，东面叫碧罗雪山，西面叫高黎贡山，两山之间夹峙着一条古代称为赤水的大怒江，形成著名的怒江大峡谷。据扶永发考证，怒江大峡谷从北端贡山，到南端保山400多公里长的流域中，远古时代依次分布着北狄国（贡山丙中洛）、先民国（贡山茨开）、西周国（福贡利沙底）、长胫国（福贡鹿马登）等一些原始部落及“天穆之野”（保山坝湾，详见下文）等著名古遗址。说明怒江大峡谷很早就是古人类生息活动的地方，而且是远古神州中国的一个发祥之地，这里的古代先民们创造了怒江大峡谷的古代文明，而且我认为这些先民的苗裔今天还活跃在怒江大峡谷里。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就是这些苗裔民族的一部分。我在《北狄国与贡山丙中洛》一文中，对怒族、独龙族是“北狄国”氏族部落的苗裔民族作了探讨，这里再对傈僳

族是西周国氏族部落的苗裔民族进行初步的探讨。

《山海经·大荒西经》在记载了“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之后，接着载曰：“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

两段经文大意是，中国西北边境，有一个西周国，它是黄帝（姓姬）世孙叔均的氏族部落，已开始进入农耕社会，播种农作物，食谷。这个部落坐落在两山之间（双山），境内有一座“日月所出入”的方山。据扶永发考证，西周国国邑故址在福贡县利沙底乡所在地利沙底村。我认为扶永发的考证是正确的，依据是：第一利沙底坐落在怒江东岸，与西周国坐落于“赤水之东”的方位吻合；第二利沙底东靠碧罗雪山，西向高黎贡山，处于两山之间，与西周国位于“双山”的环境相对应；第三利沙底乡境内高黎贡山山顶上有一个大溶洞的山峰，溶洞有如一轮不落的月亮高悬在山顶，被当地傈僳族称为“亚哈巴”，即“石月亮”。这个神奇的“石月亮”从东面山下往上看，有如太阳和月亮从山顶溶洞落下，从西面山下往上看，又如太阳和月亮从溶洞升起。这种特殊的地理现象，正好与“日月出入之山”的特殊山体现象相契合。我们知道，《山海经》记载了东方有“日月所出之山”六座，西方有“日月所入之山”六座，这是南北走向，横断山区太阳、月亮从东方山头升起，从西方山头落下的自然写照，无可非议，但经中的“方山”却是“日月出入之山”，即太阳和月亮既从方山升起，又在方山落下，这就不合常理，因此有的人认为这是神话，有的

人又认为方山位于中国西北边境，应为“日月所入之山”。经文窜入了一个“出”字，应予删去。但是利沙底西面的石月亮山，从山的东西两面看就是一座太阳和月亮从西边山洞落下，又从东边山洞升起的神奇山峰，因此“日月所出人”之山，符合利沙底石月亮山的特殊自然现象，西周国境内的方山也非利沙底石月亮山莫属；第四怒江河谷是全国少数几个分布着再生稻的地区之一。传说后稷是我国农耕技术的发明者，从经文记载分析，后稷在怒江河谷山区发现了野生谷物种籽，并将种籽带到西周国部落，由他的侄子叔均进行耕作播种，西周国部落开始进入半猎半耕社会，这是可能的。怒江州和福贡县文物部门1990年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利沙底乡石月亮山下的米俄鲁村发现了石锛、石凿、石斧、石刀等和红铜斧、红铜凿、青铜斧、青铜矛等新石器和青铜器，这些出土文物也为三千多年前西周国部落已进入猎耕社会，进行农作物耕作提供了有力证据。

在作了古西周国地理遗址及其社会形态的考证以后，再来谈谈西周国氏族部落的苗裔问题。

据民间历史传说和有关史籍记载的考证，我认为傈僳族是黄帝族古西周国氏族部落的一个苗裔民族，傈僳族并非外地迁入怒江的民族，而是先迁出后迁回的怒江古老民族。谨作如下探讨。

石月亮传说探源 在怒江傈僳族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故事大意是：远古时候，怒江还没有人类，后来天神努娃用神泥照自己的模样造了一男一女，把他们放到地上，男的取名启沙，女的取名勒莎，要让他们繁衍人类。但是启沙和勒莎认为他们是同物所造，同时所生，气血相同，恐怕不能生育后代，不愿成婚。那时怒江里的龙女变成美貌少女，

上岸游玩，并与启沙相遇投缘，欲订终身，却遭到龙王反对，发大水要把启沙、勒莎淹死。龙女不顾父王反对，偷出大船和弓箭，三人泊着大船飘上山顶，射出三箭，山顶被射出一个大窟窿，洪水便从大窟窿泻出，使三人躲过了大水。大水回落后，三人从山顶大窟窿下山，后来启沙和龙女结为夫妻，生下九男七女，勒莎用自己的身体化作怒江上的彩虹桥，让启沙和龙女的子女跨上彩虹桥，走向四面八方，从此人类就在大地上繁衍起来，那个大窟窿也永远留在怒江西岸的高山顶上，称为“亚哈巴”（傈僳语“石月亮”）。与这个传说相对应的是，分布在中国云南保山、德宏以及缅甸、泰国等地的傈僳族，当他们谈叙家谱的时候，往往提到他们的祖先是从怒江的石月亮迁移过去的。把石月亮视为傈僳族先民的发祥地，有的还专程来到怒江寻根拜祖。我们虽然不能把传说和神话当作历史，但是某些传说折射历史也是客观存在，如果傈僳族的先民不是发源于怒江，那么石月亮的传说也不会为国内外傈僳族所共同传诵，流传得这么久远。

在石月亮传说里，傈僳族把启沙和龙女当作他们的民族祖先，认为傈僳族是启沙和龙女的后代，这里就有一个图腾崇拜问题。古籍中有关于黄帝乘黄龙升天的故事，《山海经》记载中，把“四龙（蛇）相绕”作为纪念黄帝的“轩辕台”的标志，说明黄帝民族以龙为图腾，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始祖，黄帝子孙称为龙的传人，就是力证。西周国是黄帝子孙叔均所建的黄帝族的氏族部落，当然也以龙为图腾，说明傈僳族的祖先的龙图腾崇拜与西周国龙图腾崇拜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傈僳族的祖先与西周国存在血缘氏族关系，发源于西周国；傈僳族是黄帝族叔均氏族的苗裔民族，是怒江大峡谷自古以来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

栗粟名考 傈僳族最早见于史籍是在唐代，唐樊绰《蛮书》载曰："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此后，宋元明清历代史籍均有傈僳族的记载，都记为"栗粟"。栗粟加人旁称"傈僳"族的记载是在近代史籍中才出现的，是知傈僳族古代称为"栗粟"。

傈僳族在古代记称"栗粟"，是与傈僳族发源于古西周国民族有着历史和社会根源的。

从上述考证说明，三千多年前古西周国部落已经进入采集狩猎和农业耕作并行的半猎半耕社会，部落成员在以打猎采集野果为生活来源的同时，开始耕种土地，食用谷物。据我国考古发现，在仰韶新石器文化的半坡遗址中，就有石斧、骨锄等生产工具和粟（谷物）（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 84 页）。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西周国为代表的怒江峡谷古人类与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古人类，他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同的。傈僳族作为黄帝族西周国氏族的苗裔民族，则由于世居极其封闭的雪山峡谷，限制了社会发展，当中原地区进入阶级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以后，怒江傈僳族还长期过着采集狩猎与农耕并存的经济生活，继续处于半猎半耕的原始社会，傈僳族在形成单一民族以后，也就以"猎耕"为自己的民族命名，自称"栗粟"。"栗"指栗树、栗树的果实栗子。栗从木，代表林中采集果实和狩猎；"粟"，指谷物、小米。粟从农，代表农作物耕作。我认为"栗粟"的族称便由此产生，它包含了傈僳族自命为猎耕民族的寓意，同时也为傈僳族发源于已经进入猎耕社会的古西周国部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通过"栗粟"名考，不仅证明傈僳族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怒江古老民族，它还说明傈僳族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在怒江

创造了先进的农耕文化。

傈僳族并非怒江的"迁入"民族考辨 怒江州文物部门在1984年至1990年的州内文物考查中，发现了大量历史文物和古迹，其中新石器和青铜器时期遗址遗物的发现，曾引起省内外考古学界的注意，也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这些考古文物并非怒江所固有，而是传入之物，如说福贡发现的有孔半月形石刀，是三千多年前一支从甘肃南迁经过怒江的羌人留下来的，等等。翻开中国古代史，就会被告知：云南是古代三大人群的迁入地区，"云南是古代民族走廊"。这三大人群，一个是氐羌人群，自我国西北迁来，后来发展为汉藏语系的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哈尼族、景颇族、阿昌族等各民族；一个是越（粤）人群，自我国南方迁来，后来发展为壮侗语族的傣族、壮族、苗族、瑶族等各民族；一个是濮人群，自南亚迁来，后来发展为南亚语系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各民族。云南虽然发现了300多处新石器文化，但这些文化也被认为是迁入民族"带入"或创造的，理由是这些新石器的形制，都受到我国西北和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照这样说来，云南在这些人群迁入以前，还有没有土生土长的人群存在？似乎没有了；还有没有云南人自己创造的远古文化？似乎也不会有了。

好在20世纪60年代在云南发现了元谋猿人，把我国人类的历史上溯了120万年，确定了云南是人类发源地的历史地位。20世纪90年代扶永发破译《山海经》，发现了五千年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发源于云南西部横断山地区。这些惊天动地的发现，对中国历史学提出了挑战，也使我们对怒江新石器出土文物为"带入"说产生了质疑。

1990年，怒江州文化部门在福贡县利沙底乡石月亮山下

的米俄罗村，发现了石锛、石刀、石凿等新石器和红铜斧、红铜凿、青铜斧、青铜矛等古文物。据专家考查，石锛、石刀、石凿为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遗物，红铜器为夏前后遗物，青铜器为商周至战国遗物，这些文物与兰坪发现的玉水坪、马鞍山新石器遗址相对应，代表了古人类早、中、晚期的文化，说明四千多年前怒江已有人类活动。这些古文物在利沙底乡内发现也不是偶然的，利沙底在三千多年前就是西周国部落进行猎耕的活动区域，这些古文物当然就是西周国部民及其后裔的遗存，也就是说这些古文物是包括傈僳族的古代先民在内的原始先民们所创造和留下的，而不是三千年前，由南迁的一支甘肃羌人带人和留下来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利沙底出土的四千多年前的石锛、石斧和三千多年后的青铜斧、青铜矛又是谁“带人”怒江来的呢？

原来以为，傈僳族发源于我国古代西北的氐羌人群，怒江峡谷里的傈僳族先民是在公元 16 世纪以后才从内地陆续迁进来的。现在看来，这个传统的观念也值得继续探究了。我们把利沙底的考古发现与扶永发的神州发现联系起来看，就会得到与此不一样的理念。情况是距今三四千年前，怒江峡谷已经有了人类居住，建立了氏族部落，创造了新石器和青铜文化，夏朝前后进人了半猎半耕的原始经济社会。但是到了夏末商初，建立在滇西横断山区的古代神州中国发生了社会大变革，引起了人口大迁徙。利沙底的西周国部落人群也跟随大迁徙的人群，向神州中国周围的四面八方迁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来到了今天的我国西北（青海、甘肃一带），并将他们创造和使用的生产工具有孔石刀和青铜器也带到了西北。后来这些从云南西部迁去的人群与西北的当地人群产生融合，组合成为逐草而居的高原游牧民族——氐羌族群。过了千年以后，西北高原

的氐羌族群再随畜迁徙，逐渐南下，进入川滇边境，然后与当地的族群融合，发展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其中就有一个傈僳族。到了公元16世纪以后，一部分傈僳族便从金沙江流域逐渐进入怒江峡谷，重新回到了他们祖先西周国氐族部落的发源地——石月亮地方。现在傈僳族已发展成为拥有百万多人口、跨境而居的民族，其中约50万人分布在国外，约70万人分布在云南各地和四川的盐源、西昌等地。怒江州的傈僳族有25万人，是傈僳族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占全州总人口的51%，1954年成立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今天傈僳族已成为新时期建设怒江、发展怒江的主体民族。透过怒江峡谷四千年来人类曲折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傈僳族的先民创造了三四千年前怒江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三千多年前这些先民迁入西北，并将其新石器和青铜文化也带到西北，到了公元16世纪后，他们的苗裔傈僳族再迁回怒江，成了今天怒江州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这些历史证明，傈僳族不是怒江的“迁人”民族，而是创造怒江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怒江世居民族之一。

三、华夏歌舞发祥地——怒江大峡谷

东方大峡谷有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白族、普米族等12种主要民族，各民族乐歌喜舞，有很高的音乐、舞蹈天赋，并擅长表演，来到东方大峡谷，到处可以听见歌声舞影，有如进入歌舞的海洋，特别是傈僳族农民的多声部无伴奏合唱音乐和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的摹拟大自然生物的舞蹈，无人不为之倾倒。人们观摩了随处可见的怒江民族歌舞以后，也许会问：这么美妙的“天籁之音”和摹拟舞蹈源自何方？师承者谁？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要从《山海经》记载的古代华夏歌舞

的源头说起。

从扶永发的考证说明，我国远古时期夏朝和夏朝以前的发源地在云南西部横断山区。据传，夏朝盛行歌舞，夏朝开国始君夏后启就是一位音乐舞蹈创作家和表演家。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曰：“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又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经文说，在（神州中国）西南边境，赤水（怒江）南部，流沙（怒江沙岸）西边，有一个人，耳朵上挂着两条青蛇，驾着两条龙（此为《山海经图》上天穆山的地理图像标志），名叫夏后开（即夏朝开国皇帝夏后启）。夏后开三次到天上作客，得到天乐《九辩》和《九歌》，带下人间，在高达二千丈的天穆之野（即天穆山）上，根据天乐创作了《九招》乐曲，开始在那里演唱起来。经文还说，夏后启在大乐山跳《九代》舞蹈。史书也说：“启喜欢饮酒、打猎、歌舞。”

据扶永发考证，夏启王创作《九招》的“天穆山”指保山市怒江西岸坝湾乡所在地的高黎贡山山岭。夏启王作儛的“天乐之野”，指澜沧江东岸的永平山岭。夏启王作曲歌舞的高黎贡山和云岭山岳，山上林海如涛，山下碧水腾波，林间百花怒放，万紫千红，百鸟歌唱，彩蝶飞舞。夏后启在此登山打猎，如临九天仙境，创作的灵感自然如泉涌动，于是开怀畅饮，作起《九招》乐曲，歌之舞之，当在情理之中。《夏书·五子之歌》还说：“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这是说，启死了以后，其子太康继位，但太康沉缅于酒色，不理国事，外出打猎数月不归，因此被羿夺了王位。太康的兄弟五人在逃难途中创作了五首诗歌，缅怀祖先大禹的功绩，反思

太康的过失，称为《五子之歌》（后来启的后裔少康重新夺回了王位）。说明夏启王的家庭，不仅是世袭皇族，还是一个以歌舞传承的音乐世家。由此看来，夏启王在高黎贡山（天穆山）上创作《九招》乐曲，在澜沧江东岸山岳作儛的记载是信史之笔，是不容置疑的。同时说明了，三千多年前东方大峡谷就是夏朝的歌舞之乡，今天怒江大峡谷各世居民族能歌善舞的民风，当是古代华夏歌舞文化传承的象征。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三千多年前夏朝歌舞的内容和形式，但从夏启王喜好在澜沧江和怒江两岸群山中打猎、作曲、歌舞的记载看，大自然鸟兽流水林涛的合声，百兽嬉戏、追逐和原始耕作的形态，应当是夏启王生活的第一源泉，其创作的歌舞离不开对大自然合声和百兽呈祥的摹拟。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第一首《雎鸠》的第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州。”就是模写一种水鸟的合声，古代歌舞《凤凰涅槃》则多以摹拟鸟兽的动作为舞。可见摹拟大自然的合声，摹拟鸟兽动作和原始耕作方式，应当是夏朝歌舞文化的主要特征，而这些古老的歌舞文化形式自然要传承和影响到后代子孙。东方大峡谷既是夏朝歌舞文化的发祥之地，又因地理环境十分封闭，而使这些古老文化在峡谷世居民族中得以长期的保存。被当代音乐界推崇为高难度音乐极品的怒江傈僳族农民多声部无伴奏合唱音乐，是东方大峡谷世居民族傈僳族汲取大自然合音的精华而创作的乐曲；大峡谷世居民族傈僳族的《金狗寻食舞》、《鸡扒食舞》、《砸核桃舞》、《猎人舞》、《开火山地舞》；怒族的《猴子舞》、《乌鸦喝水舞》、《山鸟炭渣舞》、《猎神舞》、《打猎舞》、《割小米舞》；独龙族的《剽牛祭天舞》等，则是这些民族摹拟鸟兽动作和半猎半耕原始生产活动方式创作的舞蹈，这些传统的民族歌舞源自大自然的合声和原始猎耕生活，它与夏朝歌舞

文化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说明怒江大峡谷的民族歌舞源于远古华夏歌舞文化，并为怒江大峡谷世居民族奠定了深厚的歌舞根基，培育了各民族能歌善舞的民俗民风。

社会在进步，文化在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怒江大峡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怒江大峡谷的世居民族由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与全国55个民族同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怒江飞跃发展变化的各项事业中，各民族歌舞文化的发展也十分显著。怒江大峡谷各族人民由于受到古代夏朝歌舞之乡的文化传承和影响，对歌舞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悟性，他们不拘泥于传统歌舞文化的传承，也最乐于和善于接受其他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他们不仅是多声部无伴奏合唱的演唱家和生产舞、打猎舞、祭神舞的传承者，还能娴熟地表演藏族的弦子舞、新疆的皮鼓舞、彝族的打歌舞，流利地演唱世界名曲“友谊地久天长”和卡拉OK。现在走进怒江大峡谷，就如走进了歌舞的世界，古代的、现代的、民族的、海外的，什么样的歌舞都能听到看到。这不仅体现了怒江大峡谷各民族对其他各民族、各地区歌舞文化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也说明了怒江大峡谷今天的歌舞盛世，是在华夏远古歌舞文化的根基上发展起来的，而怒江大峡谷就是远古神州中国华夏歌舞文化的摇篮。

2004年4月14日于怒江

（原载《怒江报》2004年5月19日、20日四版）

白族与夏族的族源关系

——七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我国的民族学认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必须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经济和共同心理素质等五个基本条件。我在《轩辕黄帝新探》一文中，就白族与夏族的渊源关系作了探讨，本文再就白族与夏族的共同语言方面进行讨论。

一、民族语言的稳固性

据《史记》记载，汉族在秦汉时期，从庄蹻开始就进入云南。两千多年以来，汉族与云南的20多个少数民族杂居共处，进行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通过通婚、混血、同化，发生了互相融入的情况，有少数民族成分融入汉族的，也有汉族成分融入少数民族的，但是这种民族融合的成分并不大，它是一个民族的个别分子或局部的融入，并非整个民族的融入。这是因为一个民族一旦形成以后，就成为稳固的民族共同体，特别是共同的民族语言具有巨大的稳固性，所以两千多年来云南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各自保持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历史证明，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抵抗性。”（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中的问题》）

但是这里却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这就是作为云南少数民族之一的白族，在它的民族语言中，大约有一半以上是

汉语的语词，这些汉语语词已经同白语融为一体，成为白族语言的重要构成部分，如果白族语言与汉族语言之间不存在同源关系，那么这种现象就既与民族语言具有巨大的稳固性的理论相悖，也与云南其他众多少数民族的语言中，汉语借词都很少，并未成为本民族语言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实际不相一致。白族语言的这种特殊现象，使我们不能不正视以下的历史演变情况：

——夏末商初，距今三千多年前，夏族人口从滇西发源地大量迁人中原和中国各地，然后与中原大地的各民族融合，到秦汉时期，重新形成了民族共同体——汉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是以夏族为主体构成的，因此汉族的语言文字也是以夏族的语言文字为主体构成的。当然汉族语言文字中，也吸收了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部分语言文字。

——在夏末商初的大迁徙中，夏族人口并没有从滇西北全部迁出，夏族的一部分人口仍继续留在滇西的故土上生息发展，保存着夏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这些留在滇西故土上的夏族人口之一，就是白族的古代先民。

——秦汉以后，从距今二千多年前开始，汉族人口从中原各地不断迁人云南，与云南的各少数民族杂居共处，进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由于汉族源于夏族，白族的先民是夏族，两族的语言、风俗基本相同，因此汉族进人云南后，就与白族产生了自然的结合关系，许多汉族人口通过联姻、混血，与白族人口重新融为一体，称为白族，这部分人口在白族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部分，著名白族方志学家周钟岳先生，在《剑川方言考正序》中说："今剑川居民，考其籍贯类，皆自腹省移徙而来，土著之人，百无一二，而居常言语，悉操土音，旧俗相仍习焉。"所以如果对滇西剑川等地的白族籍贯进行调查，我们

就会发现，白族中称其祖籍是南京应天府、江西某某地方等地的汉族者，肯定不在少数。

这些历史演变的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认识：白族与汉族的语言属于同一种民族语言，白族与汉族的语言都来源于它们的共同母体语言——华夏族的语言。所以《新唐书·南蛮传》指出："白蛮（指白族先民）……言语小舛讹，大略与中夏（指华夏族语言）同。"意思是说，白族的语言与汉族的语言，只有小的差异，而与华夏语言大体相同。这是一千多年前唐代史学家就已经对白族语言与汉族语言关系所作出的结论，基本上表述了白族与汉族的语言是同源于夏族母体语言的亲属关系。

二、白族与汉族的语言对应关系

语言学家指出："如果两种语言是有亲属关系，出于同母语，那么它的意义相同或相似的词在语言上必然保持一定严格的对应关系。"（徐保亚：《语言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版）

白族语言与汉族语言之间，在声调、单音节性、量词、词序、虚词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还不能成为确定两种语言亲属关系的依据。它们还必须在相似语言上，保持严格的对应关系。我认为这里所说的语言上的严格对应关系，应该指两种语言在原始基本语言上保持严格的对应关系。因为民族语言中的原始基本语是初民生活中最常用、变化最慢、不可缺少的语词，只有这些原始基本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对应关系，才能成为两种语言或两种以上语言同属于一种母语的亲属关系的证据。

白族与汉族的语言中，除语法、语音、语义相同和相似

外，在原始基本语词方面也存在广泛的对应关系，就是说这些原始基本语词，在两种语言的语音、语义上都完全相同或相似。下面谨列举六组这样的原始基本语词进行对照说明（其中有个别词义相同而语音稍异的词，在括号内用白语语音注明，语义、语音相同的词，皆用汉字，不注）：

——人体名称：心、肝、胆、额、脑（奴）、背、眉、鼻、腹、手（省）、指、骨（卦）筋、脉、齿（子）；

——亲属称谓：爹、母、爷、奶、哥、弟（体）、姐、嫂、姑、姨、表；

——动植物名称：马（买）、骡、兔、豺、狼、豹、麂、谷、麦、稗、瓜、桃、李、梨、兰、葫芦（各芦）；

——自然物名称：金、银、铁（胎）、锡、水（许）、火（燬）、土、星、岩、洞；

——味觉称谓：酸（双）、甘、辣、腥、香（兄）、淡、酽、麻、涩；

——量词称谓：一、二（工）、三、四（谢）、五、六（付）、七、八、九、十（再）、百、千、万、尺、寸（犬）、斤、斗、担。

白族和汉族的语言中，在语法构词方面也有广泛的对应关系，谨举数例为证：

——一音多词：安，有安（稳）、鞍（马）、安（排）、庵（寺）；稗，有稗（子）、败（坏）、拜（经）；薄，有薄（纸）、帛（衣）、剥（削）；真，有真（假）、针（水）、蒸（煮）；心，有心（肝）、新（官）、薪（水）等。

——一词多义：巴，有巴不得、巴结、巴望；功，有功德、功夫、功名等。

——对比词：如松—紧，东—西，南—北，祸—福，真—

假，善—恶等。

——方言词：俺（指我）、侬（指你）、阿拉（指我们）、冇（指没有）。

——口头语：如刁蹬、玩耍、然何、何不如、莫非等。

三、白族语言中的原始语识认

白族语言中，虽然有一半以上的汉语语词，但是一般都认为，这是秦汉（二千年前）以来汉族迁入云南后，从汉语中借用的语词，不认为是同源词。对于这个问题，著名白族学者张福延（字海秋）先生，早已考证指出："白族语中保存着殷商时代的词语。"殷商时代的词语，指的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夏族语言（甲骨文），说明早在秦汉以前，白族语中就保存了殷商时代的夏族（汉族的前身）词语。白族语中至今保存着的大量古汉语，也说明这些词语不是借词关系，而是同源词的关系。

为了说明白族语中的汉语词语不是秦汉以来的借词，而是自古以来的同源词，现在就从白、汉语的音、义相同的古代原始初民所操语言中，提出"火、虎、弓、嗾、社、歆、杯、书卷"几个词语，进行初步探讨：

——"火"，白语曰"燬"。《说文解字》注："燬，火也。"说明燬是汉语中火的古称，白语至今曰火为燬，乃是保存了汉语的原始物称。大理苍山马龙峰和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已经有了使用人工火的遗迹，说明白族先民至迟在4000年前就已认识到火的功能，并开始用它为自己服务了，白族关于燬的物称，当产生于白族原始先民使用人工火的远古时代。恩格斯说："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反杜林论》）火的制造和使用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煨”的产生既代表原始先民对人工火的使用，又体现了白族先民的进化历史，说明了白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

——“虎”，白语曰“罗”。《山海经·海外北经》中称虎为“罗罗”，可见“罗罗”是虎的汉语原始古称，白族简称虎为“罗”，当是保持了虎的原始兽称。

——“弓”，白语亦曰“弓”或曰“弹腊弓”。弓是原始初民的狩猎工具，弓的创造始于远古时代，《太白阴经》曰：“庖牺氏弦木弓。”《世本》曰：“黄帝臣牟夷作矢。”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有一种磨制得相当光滑的石镞，说明当地白族先民早在三四千年前就制造和使用弓矢了。恩格斯说，人类社会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就是“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的，“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白族把弓称为“弹腊弓”，“腊”与“罗”谐音，即是虎的古称，“弹腊弓”就是以弓猎虎的喻意，可见弓的称谓，当产生于白族原始先民的狩猎经济时期。

——“嗾”，白语亦曰“嗾”。《简明古汉语词典》注：“嗾(son 搜上声)；用嘴皮发声驱狗。”白族驱狗作嗾的发声也作“嗾”，说明“嗾”的词语当产生于古代先民狩猎中驱犬追逐猎物的发声，后来沿用于家庭驱狗。

——“社”，白族亦曰“社”或“社神”。《说文解字》注：“社，地主也。”《孝经》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为社。注曰：社，古代专指土地神。”《礼记·祭法》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故称后土为社神。简言之，社是汉族对土地神的称谓，后来把道观和祠庙也称为社。白族也称土地神为社神，

称道观和祠庙为社，只是白族方言去声较重，社的发音近乎“山”。白族的原始宗教观念浓厚，十分崇敬社神（土地神），凡是出门远行和归来，人的出生和死亡，都要到山神庙向社神祭祷平安，坟地上方要立社神、牌位，上坟扫祭时，同时祭奠社神。说明白、汉语中社和社神的词语，产生于原始先民的社神崇拜。

——“歆”，白语亦曰“歆”（音薪）。《说文解字》注：“歆，神食气也。”《诗·大雅》说：“上帝居歆。”《简明古汉语词典》注：“歆，祭祀时神灵享受祭品的香气。”统而言之，上苍神灵在天上，地上的人们向上苍神祭祀，神灵享受到祭品香气，称为“歆”。汉族有这样的宗教礼仪，即每食必供。白族也行每食必供的宗教礼仪，不同的是汉族供而不语，白语是既供又语，一面用手奠着食物，一面口称“歆、歆”。可见白、汉语中的“歆”这一词语，也当与社神崇拜一样，产生于其原始先民的原始宗教产生的时期。

——“杯”，白语曰“钟”。“杯”和“钟”，是汉、白语分别对饮器的称谓词语，而“钟”产生的时代又早于“杯”。“钟”约产生于上古时代，是古人贮酒和饮酒的器皿。白语的“钟”当产生于上古时代。后来古人制造了觯的饮酒器，钟就成为专门的贮酒器。再后来古人将觯改制成小巧的饮酒器，这种饮酒器才称作“杯”。但饮酒器皿虽经多次改进，几易名称，而白语仍沿用古语，称它为“钟”，至今不改，可见白语历史之悠久。

——“书卷”，白语曰“书箣”（由于白语去声重，“书箣”发音成“书揣”）。我国古代在发明纸以前是用竹简书写的，由书写的竹简串起来的书就称“书箣”（书箣即书册，册是箣的简体字，箣指竹简、编竹）。白语“书箣”，当产生于我国古代

用竹简作书的时代。后来发明纸张，用纸张书写，由书写的纸张装订成的书，才称“书卷”或“书本”。白族虽然早已使用纸张书写，但至今仍将用纸张装订成的书卷称作“书箣”（书揣），说明白语发源于古代夏族先民的原始语言是没有疑问的。

四、白语中的古汉语识认

古代汉语是秦汉时期汉族形成时的早期语言，其中蕴涵着汉族前身夏族的大量语言。这种语言现象在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中是罕见的，它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白语和汉语都是发源于我国古代的华夏语言的同源语言。

现在我们就将白语中现在仍在使用的古汉语，稍作列举和说明。

（1）白语日常用语中的古汉语

——吃饭，白语曰“饮餐”，为饮食用餐之意。

——穿衣（着）服，白语曰“仪衣着帛”。为穿着用帛（古代称丝、麻织品为帛）制作的衣服，以正仪表之意。

——一双筷，白语曰“箸阿双”。箸是筷子的古称，阿是白语虚词，有时也作“一”用。箸阿双即为一双筷的古汉语。

——肚子饿，白语曰“腹饥渴”，古称肚子为腹，饿为饥或饥渴，腹饥渴即为肚子饿的古汉语。

——砍柴，白语曰“斫薪”，“斫”音卓，为砍、削的古称；“薪”是柴的古称，斫薪即为砍柴的古汉语。

——割谷，白语曰“芟谷”，“芟”音山，为割草的古称，谷是古今对谷物的通称，芟谷即为割谷的古汉语。

——屙屎，白语曰“遗矢”。“遗”是排泄的古称；“矢”是屎的古称，遗矢即为屙尿的古汉语。

——撒尿，白语曰“泄溲”。“泄”是排泄的古称；“溲”

是尿的古称，泄溲即为撒尿的古汉语。

——空闲，白语曰“暇”。“暇”是空闲的古称，暇即为空闲的古汉语。

(2) 白语人体、亲属称谓中的古汉语

——脸，白语曰“容”。“容”为脸的古汉语。(宣子)曰：“其容有蹙”。即指脸上有愁容。

——肩，白语曰“髆”，《说文解字》注，“髆，肩甲也。”髆为肩的古汉语。

——大腿，白语曰“髋髀”。《说文解字》注：“髋髀，上两股即其骨最宽处也。”髋髀为大腿的古汉语。

——肚子，白语曰“腹”。《左传》曰：“鞭长不及腹。”指骑马挥动鞭子，而鞭子没有落到马的肚子。腹为肚子的古汉语。

——眼闭，白语曰“瞑”。《说文解字》注：“瞑，翕目也。”瞑为眼睛闭起的古汉语。

——大脖子，白语曰“瘿”。《说文解字》注：“瘿，颈瘤也。”瘿为大脖子的古汉语。

——夫，白语曰“伯”。伯为夫的古汉语。《杜诗》有曰：“郎伯殊方镇。”指妇人称丈夫为伯。

——儿媳，白语曰“子妇”。(白语因去声重，妇发音为武)。《尔雅》注：“亲子之妻为妇。”子妇为儿媳的古汉语。

——妹，白语曰“女弟”。(白语去声重，发言为妜体)《说文解字》注：“妹，女弟也”。女弟为妹的古汉语。

——孙女，白语曰“女孙。”《汉书》有曰：“其女孙为霍氏。”指他的孙女是霍氏。女孙为孙女的古汉语。

——婴儿，白语曰“赤子”。《四书》有曰：“如保赤子。”指如对婴儿似的加以保护。赤子为婴儿的古汉语。

——小孩，白语曰“孺子妜”。《四书》有曰：“今人乍见

孺子将人於井”指有人突然看见小孩子将要掉进水井。白语孺子妸，指小孩子、女（妸为女），孺子妸为小孩的古汉语。

(3) 白语风俗习惯用语中的古汉语

共同的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和节日等）是民族共同体心理素质方面的组成部分。白族与汉族在风俗习惯方面保持着许多共同的东西，如重大节日中汉族、白族都有正月春节、二月立春、三月清明、五月端阳、七月寒食、八月中秋、九月重阳、十二月冬至等主要节日。在衣着方面，白族还保存了汉族前身的夏族的某些古风，下面谨举白族妇女的衣着用语“蔽前”一词为例。

蔽前为古汉语，白语亦曰蔽前（去声重，发音为“蔽吉”)。“蔽前”是远古原始先民的一种服饰。原始初民开始是不穿衣服的，后来才知道用半截兽皮或一块木板系在腰前作为遮羞之用，这些遮羞物就是原始先民的服饰，称为“蔽前”。蔽前的服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独龙族中还有人使用。《礼祀》载曰：“古者佃鱼而食，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白族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学会种桑养蚕，织帛穿衣，摒弃了“蔽前”、“蔽后”的遮羞服饰，但是由于白族先民曾经历了穿着这些原始服饰的历史阶段，形成了相应的服饰名称，为了表示对古老习俗的尊重和继承，白族在摒弃遮羞的原始服饰的同时保存了“蔽前”、“蔽后”的服饰形式。如剑川一带白族妇女服饰的特点是上衣的前摆短，只及腹部，腰前再系一半截裙，称为“蔽前”（蔽吉）；上衣的后摆长，遮住臀部，长及膝弯，以示“蔽后”。这种服饰既保存了古老的服饰名称，又体现了白族对民族传统服饰的改革、继承和发展。

通过以上讨论说明，白族是四千多年前发源于洱海周围地区的古老民族。白族先民与发源于滇西的黄帝民族，具有共同

语言、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经济和共同心理素质等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条件。因此我认为白族是黄帝民族留在滇西的苗裔民族之一，白族语言与夏族语言——汉族语言同源于黄帝族语言。而白族源于黄帝民族渊源关系的考证，又为扶永发关于滇西为古代中国发源地的考证，提供了证据。

（原载《怒江民族史料研究》1995年版）

白族他称“明家”探源

——八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白族的自称有白、白子、白尼；他称有民家、名家、明家，还有其他。白族有140万人口，其中被称为“民家”的约占80%，“民家”就成了对白族通用的他称；“名家”和“明家”之称，则仅见于某些学者的论著，很少闻见于口称。

白族的上述三个他称，音同而义异，如果由近及远地认真进行探索，便知它们产生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并由此可以推求白族的起源，可窥视远古神州中国的所在，还可佐证扶永发同志神州新发现学说之不谬。为此，笔者不顾浅薄，斗胆设文，试作探讨，以求教大家。

一、“民家”之疑

据载，白族的他称“民家”源自明代初期。

洪武十四年（公元381年），明王朝派兵三十万进征云南，明军在平定云南期间，为解决军需粮秣，在昆明、寻甸等地建立屯堡，派军队垦种生产粮食。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云南平定后，留镇云南的平西侯沐英上奏朱元璋：“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开耕，以备仙侔。”沐英准奏后，就在云南大力推行军屯制度，即以十分之三的士卒执行军事任务，十分之七的士卒从事耕作，“给耕牛、农具，教树植”，交纳谷物作军粮。“到1510年前后，军屯之田达1276639

亩9分4厘。今天我省名为‘卫、所、营、屯、堡’的村落星罗棋布，都是明代军屯的遗迹”。（见《云南可爱的地方》611页）因此，《白族简史》载曰：“明初在白族地区广泛地实行军屯，汉军屯户和白族人民交错杂居，在生产和生活上联系日益密切，彼此互相融合，互相尊重，白族人民称汉军屯户为‘军家’，而汉军屯户称白族人民为‘民家’。于是‘民家’一词就成为白族的通称而一直沿用着。”

这就是说白族他称“民家”一词，产生于明代初期的军屯制度。但是我对《白族简史》的这个定义，仍有依据不足之感，而且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军队屯垦是明朝政府对云南的一项重大政策，据万历《云南通志·兵食志》载：明军在云南参加屯垦的士卒多达33万人；垦种面积广达1320642亩，其屯垦单位卫、所、营、屯、堡遍及云南全省。可见军屯是一个大规模、全方位的政策措施，不仅在云南的白族分布地区实行，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同样实行；汉军屯户不仅与白族人民交错杂居，在生产生活上联系密切，彼此融合，互相尊重，他们与云南其他地方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也同样如此。因此，军屯户不仅将“白族”称为“民家”，也当将屯垦地区的其他汉族和少数民族也称为“民家”，但“民家”是对“军家”而言，属于行政概念词语，所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没有因为被军屯户称为“民家”而改变他们原来的族称，而惟有白族则将“民家”作为自己民族的称谓，令人费解，说明“民家”这一白族他称产生于明代军屯制一说，难以为据，不能自圆其说。

其二，明朝不仅在云南实行军屯，还实行民屯和商屯。明初，朝廷“移中土大姓实云南”；“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从各地迁移贫苦农民和罪犯到

云南，“给予种子、资金、区划地亩”，进行屯垦生产，称为“民屯”；又“召商输粮而与之盐”，从中原各地迁移商人到云南，叫他们募民屯种，把生产的粮食交到当地“卫”“所”，换取“盐行”凭证，到盐厂领取食盐，进行贩卖，称为“商屯”。据《云南通志·食货志》载，明初，迁入云南的“民屯户”和“商屯户”又达几十万人，他们与“军屯户”一样，分布到云南全省，不仅与当地的白族人民共同生产生活，也与其他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相处也融洽和睦，但是这些迁入的“民屯户”和“商屯户”都被当地人称为“汉人”，他们并没有由于从事屯垦而被称为“民家”或“商家”而改变其原来的民族成分。由此可见，“民家”和“军家”，“民屯”和“商屯”，只能代表职业身份，不能代表民族成分，因此在明初实行军屯、民屯、商屯时期，把“民家”作为白族的专门称谓，并成为白族的通用他称，情理难通，难以成立。

其三，白族的“民家”他称早在元代初期就已经出现。公元125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亲率10万大军征服云南后，又班师北返，进攻南宋。在此期间，原大理国的亡国贵族段氏也组织了两万多白族子弟的“爨僰军”，进入广西、湖南，配合元军进攻南宋。1259年，元军灭了南宋，“爨僰军”在遣返中，一部分军人就流落在长江流域，没有返回云南，其中有一支“爨僰军”队伍来到了湖南省的桑植县定居，他们就自称是“民家人”，至今已传29代，李、谷、王、钟、熊五姓，人口发展到9万余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据他们的自愿正式确认为白族，并成立了桑植县白族乡。由此可见，白族的他称“民家”早在元代就出现了，因此白族的“民家”这一他称并非产生于一百多年后的明代军屯时期，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元代落籍于湖南桑植的“爨僰军”士卒，他们本身

就是“军家”出身，又怎么以“民家人”自称？这本身又是一个疑案，因此“民家”这一他称，即使出现于元代，也是于理难明而大可商榷的。

二、“名家”之疑

现代有的学者对白族他称进行的研究结果，又提出“名家”一说，认为白族他称应是“名家”，它出现于唐，流行于宋，元、明所称“民家”，实为“名家”的讹记、讹传。

“名家”一说，是学者根据唐书及对墓志的调查提出来的。《唐会要》卷九十八《昆弥国》条中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四月二十日，右武侯梁建方讨蛮……，遣使往西洱河，有数十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李、赵、杨、董为名家，名擅一州，不相统属。”《蛮书》卷五又说：“渠敛赵（今凤仪）……，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新唐书》也说，西洱河地区的这些大姓、名家，就是白蛮中的贵族。白蛮乃白族先民，学者以此为据，认为隋唐时期，西洱河白族先民白蛮被称为“名家”。当代学者对大理洱海之滨的喜洲白族大姓杨、赵、李、段、董、尹、高、何、杜、张等10个名家的唐代墓志铭、家谱谍系进行考证后也提出：“南诏时期西洱河的名家（贵族、大姓）即今天白族的先民之一部分。也就是说，今天白族大姓是河蛮大姓的后裔。大理白族被称为‘名家’即此而来，而不是‘军家’‘民家’之分”（张锡禄著：《南诏大理城河蛮名家大姓世系考》）。

我认为唐书关于西洱河蛮名家的记载，只是说，隋唐之际，在西洱河蛮的数十百部落和数十姓氏中，有四姓是名家，即贵族，并没有把西洱河蛮都称为“名家”。西洱河蛮就称为

西洱河蛮或河蛮，名家是西洱河蛮中的一部分，两者不能互称或取代，这个界限是明确的。后来，南诏国的建立，使西洱河蛮——白蛮进入极盛时期，其代表人物在南诏政权中据有显要地位，其大姓名家，也由隋唐之际的四姓发展到了十姓，但据史载，当时大理白蛮共有三十多个姓氏，就白蛮的整体来说，名家贵族也只占三分之一。其大多数还是平民百姓，因此，即使是白蛮发展的高峰期——南诏时期，白蛮也不会被统称为“名家”。所以，对白族的他称“名家”一说，我也不敢苟同，并存疑如上述。

三、“明家”之见

探索白族的族源历史，我认为两汉时期云南西部的哀牢夷昆明人，是后来所称的白蛮和今天的白族的原始先民。两汉时期，他们被称为“明家”，含有“昆明人家”之意，至于唐宋时期对白蛮所称的“名家”，元明以来，对白族所称的“民家”，则是“明家”的转称或附会，白族的确切他称应为“明家”，下面谈谈我的愚见。

白族的祖先始称哀牢夷，两汉时期称昆明族。昆明人很早就组成了自己的部落联盟，始称“白崖国”，后称“昆明国”或“昆弥国”。前者“白崖国”是以地名命名，因为白崖国的国邑叫白崖，即今大理州弥渡县红岩村（红岩村原名白崖，新中国建立后改今名。近来考古学家在红岩村发掘出了白崖国的故城遗址，使‘白崖国’是否存在的长期争论，终于得到肯定的结论）；后者“昆明国”是以族称命名，前后两种称谓并不矛盾，并更能说明它是由昆明族在白崖建立的部落联盟。

大理地区还有以昆明族命名的许多地名遗存。如大理凤仪以南十四里的定西岭，原名昆弥山，明初，平西侯沐英经过此

山，才更为今名；弥渡，是白语，意指昆弥山的东边，今仍沿用于县名，称弥渡县，等等。

白族的先民是古代昆明人，白崖国是古代昆明人的部落联盟，白崖国部落联盟的盟主当然也就是昆明族人。据《南诏野史》载："汉末祖张仁果，居蒙舍川，昆明大族，众立为王。"说明西汉末期，白崖国的盟主张仁果，就是出生于蒙舍川（今巍山县境内）的昆明族人。而张仁果则是蒙苴颂的苗裔，蒙氏为昆明族的先祖，对此下文还作专述。

在昆明人的族属问题上，一般论者都认为昆明人是彝族的先民，而不是白族的先民，白族的先民是白蛮而不是昆明，昆明和白蛮是古代的两种不同的民族。其实我认为白蛮和昆明都属于滇西地区古代的哀牢夷，其中居住在洱海近湖泊地区的被称为洱河蛮、河蛮，唐代称为白蛮，居住在溪谷地区的被称为昆明人。昆明人和白蛮由于同属一种民族，他们之间经常进行住地的迁徙，因此迁到哪里，就以那里的族称自认。以白崖国盟主张仁果在不同时期的民族称谓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据《白古通记》载："战国时楚庄据滇，号为庄氏。汉元狩间，庄氏后有常羌者，与白崖主争衡，武帝乃立白人仁果为滇王，而氏绝，仁果传十五代，为龙佑那。"文中称张仁果为白人，而不称昆明人，这是因为仁果是出生在蒙舍川（巍山）的昆明族人，所以当他被部落民主选举为部落盟主时，还称他为昆明人，仁果主持白崖国国政后，由于已经进入白蛮的居住区（弥渡），因此在汉武帝立他为滇王时，就称之为白人。由此可证，白蛮和昆明，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地缘，对于同一民族的不同称谓，他们都是白族的共同先民。这一点，我们可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关于原始部落联盟的论述中找到理论根据。恩格斯指出，古代部落联盟是按种

族、氏族、部落繁衍分支自然形成的，它有严格的界限。正因为昆明人和白蛮属于同一种族、氏族，他们才能共同结成统一的部落联盟——白崖国（又称昆明国或称昆弥国）；正因为昆明大族出生的仁果，与白蛮同属一种氏族，他才有资格被昆明和白蛮的全体部族成员共同推选为白崖国部落联盟的盟主。

根据上述理由，我认为古代昆明人（也包括白蛮）是白族的原始先民，白族被称为“明家”，系指白族为“昆明人”的苗裔民族。白族称为“明家”，有着承先启后的意义。至于白族其他的他称“民家”和“名家”，则是被后人改换了原意的称谓，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原貌，因此是不准确的。

四、白族探源

我们在上面讨论了白族几个他称的正误问题，其目的自然不是要争一个你是我非，或你高我低，而在于通过辨明白族的原始他称，使我们循着“明家”称谓的这条线索，顺藤摸瓜，探索白族的起源，探索古代神州中国之所在，从而让我们得到一些关于古代中国和民族形成的信息。

我们已经探索了汉末的白崖国盟主仁果的身世，现在我们再往上探索仁果之祖先蒙氏蒙苴颂的世系及起源。

《南诏野史》说：“白古记：西天天竺摩揭国阿育王骠苴低娶欠蒙亏为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长子蒙苴罗十六国之祖；次子蒙苴廉，吐蕃之祖；三子蒙苴诺，汉人之祖；四子蒙苴酬，东蛮之祖；五子蒙苴笃，生十二子，七圣五贤，蒙氏之祖；六子蒙托，狮子国之祖；七子蒙苴林，交趾国之子；八子蒙苴颂，白子国仁果之祖；九子蒙苴阕白夷之祖。”白古记指《白古通记》，据说是一本用古代白文写的唐代地方野史，记载白族先民的古代世系及历史。从上述行文可知，仁果是蒙氏第

八子蒙苴颂的后代，其称为白人，这是因为仁果乃是白子国的盟主。

关于白子国的来由，《南诏野史》载曰："白子国之先，有阿育国，王能乘云，上天娶天女，生三子，长、季二子封于金马、碧鸡，独封仲子于苍洱之间，崇奉佛教，不茹荤，日食白饭，人因称为白饭王，迨后有仁果者，汉封为滇王，号白子国。"是知阿育国是白崖国之前的部落联盟，部落盟主骠苴低，是白崖国盟主仁果的直系祖先。由此推知，古代的阿育国乃是白族先民建立的一个部落联盟。白子国，则是继阿育国、白崖国之后、在仁果被封为滇王以后，由白族先民建立起来、以仁果为盟主的部落联盟，它是白崖国部落联盟的继续。

在探明古代阿育国是白族先民的部落联盟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求阿育国及其先民的起源问题了。

《南诏野史》载曰："云南古荒极，《白古记》云：三白王之后，西天摩揭国阿育王第三子（一为"骠"）苴低娶次（一为"欠"）蒙亏为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名九龙氏：……八子蒙苴颂，白崖张乐进求之祖……"据此，阿育国的前面还有"三白王"，阿育国王则是"三白王之后"，即三白王的后裔。这里暂不论"三白王"产生的时代，先来探求阿育国产生的时期。据白族学者赵式铭著《剑川白文考正》载："滇西周时，白饭王国也，其人为白子。"由上述行文可知，白饭王是阿育王的第三子，因此阿育国与白饭国就当先后建立于我国的周朝。"三白王"也就理当出现在周朝以前。

《南诏野史》所载的"三白王"一词是根据清人胡蔚的抄本记的，《南诏野史》还有多人，多种抄本，这些抄本大同而小异，所以要互相对照辨别，才能互相补充，改讹正错。在淡生堂的《南诏野史》抄本及王崧的《云南备征志》中，"三白

王”一词，均记为“三皇”。由此可知“三皇”或“三白王”，不是指一个人或一个部落联盟之王，而指三个时代的君王。这三个君王又指谁？当然不会指传说中“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伏羲氏、神农氏、女娲），因为他们距周朝的年代太远，《南诏野史》所称的三个君王，只能是指周朝以前的商朝的商君、夏朝的夏君、“五帝”中的末位皇帝颛顼帝。

关于古代中国传说中的“五帝”和夏商周三朝君王的族属问题，我在拙作《神州新发现》的前几续中，已作了探讨和论述，表明古代神州中国的“五帝”和夏朝均发源于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五帝”中从第二帝开始的黄帝、丹朱帝、舜帝、颛顼帝以及后来夏朝的禹王、商朝的殷王、周朝的周王，他们都是黄帝族创始人黄帝的苗裔子孙。从汉末滇西白崖国部落盟主仁果的族源历史来看，仁果是周朝阿育王的后代，阿育王又是“三皇”（三白王）的后代，“三皇”指商朝的殷王、夏朝的禹王、“五帝”的末帝颛顼帝，他们都是黄帝的后代。这样，白人仁果的始祖就要上溯到远古时代神州中国的黄帝族，说明仁果和他所代表的氏族部落民——白蛮和昆明人，就是黄帝族的苗裔。古代的白蛮和昆明人是今天白族的原始先民，由此可证，白族是发源于远古时代的神州中国的古老民族，他们是远古神州中国黄帝族的苗裔民族之一。

白族发源于滇西，发达于滇西，今天仍是滇西的主体民族之一，由此可证，扶永发先生关于远古神州中国发源地在云南西部横断山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生长和发达于滇西的新学说是十分正确的。

1999年6月15日

（原载《怒江民族史料研究》（二）1997年版）

兰坪二五山“轩辕祠”巡礼

——九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在云南西北部横断山区腹地，云岭山脉巍峨深沉，默然无语，沉寂了太多的年代。

蕴蓄深藏于沉默。20 世纪 80 年代，云岭初露胸怀，以世界特大型铅锌矿——兰坪金顶铅锌矿的盛名打破沉默，恰似荒山野岭飞出了一只金凤凰，令世人刮目相看。

一晃 20 年过去了，历史老人跨入 21 世纪的门槛。云岭山脉的同一地点又爆出一条神奇的新闻：“（2002 年）1 月 24 日，兰坪县金顶镇数千干部群众聚集在二五山庆祝轩辕祠竣工。”（据《怒江报》）

二五山是云岭山脉的一条小山岭，坐落在兰坪县金顶镇驻地文兴街的西面，沘江从它的山麓潺潺流过，给葱郁的山岭增添了无限妩媚；沘江的东面，就是闻名遐迩的兰坪金顶特大铅锌矿的主矿床——凤凰山。两座山，隔水相望，近在咫尺，形同被母亲河牵引着、呵护着的姊妹山。

据考证，《山海经》记载的“轩辕台（丘）”就是轩辕黄帝故里所在位置，确切地点在兰坪县金顶镇所在地文兴街西面的二五山台坡上。这个观点的提出，等于重新探讨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从而对中华民族发源地在中原地区的历史提出质疑。是谁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样惊世骇俗的地理认定？肇始者，是扶永发先生，一位专业的地理地图测绘科学工作者。扶

先生并于1992年以其专著《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将观点公诸于世。

阳春白雪，和者甚寡，却博得了二五山下金顶人民的广泛认同。文兴街的群众把扶永发1989年8月10日发现二五山“轩辕台”时亲笔写下的木牌“轩辕黄帝故里”奉若祖先，供于高位，四时祭拜，香火不绝。大家又纷纷解囊，集资百万请剑川匠人作业，殚精竭虑，精雕细刻，延一年之工，终于在二五山中建起一座金碧辉煌的“轩辕祠”，作为中华子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始祖轩辕黄帝的永久纪念。

金顶人民对二五山“轩辕台”的认可，并不是因为二五山坐落于金顶镇而盲从附合，他们也有从困惑、怀疑到认同的过程。

当人们在二五山的三圣宫寺庙里发现“轩辕黄帝故里”的木牌时，大家只是把它当作一件奇闻来传谈，并不当真。但是传谈的时间长了，人们就开始产生联想：为什么二五山东面通往云龙凤凰山的山口通道，从古至今都称它为“黄帝口”？为什么二五山下的金坪河上的一座木桥，一直被称为“轩辕桥”？“雁过留声，人过留迹。”这路名桥称，难道就是古人因为金顶是轩辕黄帝的故里而以“黄帝”和“轩辕”命名的吗？有趣的是，扶永发依据《山海经》记载的地理位置，考证出兰坪到云龙地区，远古时代曾产生过12个称为“国”的部落（兰坪境内有轩辕国、沃民国——通甸上水俸村、白氏国、肃慎国、沃民国——通甸河上源；云龙境内有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寒荒国、丈夫国、巫咸国、女子国），而在金顶镇世居白族的习惯用语中，至今还保存着把地方称为“国”和“十二国”的特指词语。他们之间互相问答：“你到哪里去？”一般表述为“你到哪国去？”如果对方回答：“我到十二国去。”就知道对方

是去云龙。因为当地白族习惯称云龙为十二国。这是因为兰坪和云龙在地理上属于一个相连的地区，十二国的称谓是古人对这一地区的统一称谓，它既是兰坪人对云龙的方言古称，也是云龙人对兰坪的方言古称。那么，金顶白族语中的“国”和“十二国”，难道也是远古时代神州中国部落社会的地名和部落称谓的原始语言遗存吗？如果是这样，扶永发关于神州的发现一说就并非奇谈怪论，而是被尘封几千年的神州中国的发源地的真迹了。于是人们开始对扶永发的神州新发现认真关注起来。

金顶地方过去的许多“千古之谜”，随着二五山“轩辕台”的地理认定，也一一破译。金顶人现在明白了，困惑他们几千年的地名“二五山”，原来也与轩辕黄帝有关。“二五”本是“周易”里的一个吉卦，卜辞说明，“二五”指经天纬地人物的孕育和诞生。正应了轩辕黄帝的诞生，黄帝后来终于成为神州中国的“四方大帝”，他所诞生的地方——“穷山”，也就以周易爻卜的名数，改名为“二五山”，使它与经天纬地的人物黄帝的名号相适应。接着，与黄帝故里相关联的“江山”，也被金顶人识别出来。据《山海经》记载，古代的“轩辕国”坐落在江山的南端。现在已考证出“轩辕国”的国邑就在二五山下文兴街的谷地上。“江山”就是指“二五山”山岭的发源山——玉坪山。这样说是因为玉坪山是从北向南横贯金顶全境的一座名山，它的南端山麓连着金顶镇所在地文兴街，它的北端山麓又连着兰坪县城所在地江头河村，两地之间相距仅四公里，这与《山海经》记载的山脉位置、走向是一致的。再者，江头河村的村旁，有一条从玉坪山流下的河流，这条河流在玉坪山东面山下与北来的沘江上源河汇合，因此被称为江头河，而江头河村也因此河而得名。由此可知，江头河的发源山（今

玉坪山），也当为此山临沘江而立，被古人称为“江山”，就是说，今天兰坪金顶的玉坪山，就是远古时代神州中国的名山——“江山”，而玉坪山，则是后人对它的冠称。据兰坪县《地名志》载：“玉坪山为兰坪县境内四大山脉之一。山名取该山脉北起碧玉河的‘玉’，和南止白地坪的‘坪’为‘玉坪山脉’（玉坪山脉的命名经州人民政府 1986 年 11 月 25 日怒政发（1980）92 号文件批准启用）。”这说明轩辕黄帝故里的“江山”也找到了，它仍然在原来的位置，巍然不动，只是名称被改变了。

金顶人有了自己的体验以后，就请扶永发先生来兰坪作学术报告和实地考察。他们这才知道扶永发是一位十分严谨、负责的科学工作者，他研究《山海经》，既不靠前人的书本立论，也不听凭民间传说，而是用“以水定山，以山定位”的地理科学方法，严格对照地图，一点一点地测定《山海经》所载的地理物体位置。当他在昆明的研究室内，用 1∶100000 的大比例尺测算出“轩辕台”位于兰坪县金顶二五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金顶二五山地区竟有那么多与“轩辕台”和轩辕黄帝有关的地名遗存和古语流传，谈到他对《山海经》的研究，他总是充满自信地说：“我相信地图，因为地图是不会欺骗我的。”听其言，观其行，金顶人明白了，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并不唯其美，而只唯其真，真正的科学发现，必然与实际相一致。金顶人相信了，他们相信扶永发的发现，更相信扶永发求真务实和勇于坚持真理的人格品质。

金顶地方人杰地灵，金顶的人民无比勤劳。他们不仅努力创造物质文明，建设美好的生活，同时也致力于精神文明建设，追求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建设二五山“轩辕祠”和黄帝雕像，就是金顶人民崇敬伟大始祖黄帝、方便海内外炎黄子孙

寻根谒祖，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重大创举。所以，有人在庆祝会上说，二五山“轩辕祠”和黄帝塑像的建成，远比十个、百个金顶凤凰山特大铅锌矿影响还要大得多，它是不可替代的无价国宝。有人说，它像从云岭山脉飞出的又一只金凤凰，并将飞得更高、更远。

（原载《玉龙山》2003年第3期）

《山海经·大荒西经》试读

——十续《山海经》与“三江并流”考

《山海经》，约成书于夏末商初，距今已有3500多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宝典。《山海经》记载了五千多年前我国远古时代的地理，其中第十六卷《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的地理，与今天云南省西北部极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及其周围地区的地理极其吻合，笔者长期在怒江州生活，对这一带的地理情况略有所知，自1989年披读《山海经》以来，特别在读到《山海经·大荒西经》的时候，常常使我拍案叫绝，感受尤深。谨此，乃不避浅陋，以扶永发先生研究《山海经》地理的专著《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为依据，结合自己的调查实际，对《山海经·大荒西经》试作解读，经陈一管之见，贻笑大方，就教贤达。

《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古代地理著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书中又记载了许多奇形怪状的事物，而且书中的一些地理观念和称谓、计量方法和单位等诸多表述方法，已与现代的表述方法不尽相同，因而《山海经》又称作“天下第一奇书”，是一部难以读懂的古籍。因此，为了便于解读，先对该书的读法作一些说明。

一、远古中国的地理范围

《山海经》记载的是五千多年前我国远古时代的地理，当

时的中国位于今天云南省西部，面积并不大，据扶永发运用现代地理、地图的科学方法测定，我国远古时代的地理范围应为：云南西部东经101°以西、北纬23°以北的纵谷地区，也就是今天云南西部的宾川县纳溪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的横断山脉地区。到了商朝建立以后，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向四周拓展，此后才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泱泱大国。许多人士研究《山海经》，往往以近代的大国地理比照古代地理，结果没有取得成果。

二、“昆仑山”和“海”的含义

《山海经》中有“昆仑山”和“海”的地理记载，“海”的记载尤多。但云南西部现在没有被称为昆仑山的山脉，而且从来没有海洋，怎么又说云南西部是古代中国的所在地呢？这个问题，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昆仑山的地名今天在滇西已经消失了，它早已被搬到了我国北方，但是古代的昆仑山确实在滇西，洱海是滇西最大的内湖湖泊，古代称“昆仑渊”；大理苍山是古代中国中心地带的名山，古代称“昆仑丘”；金沙江是古代中国著名的大河流之一，古代称“河（指金沙江）出昆仑”。可见古代的昆仑山不确指某一座山，而是对当时古代中国所在地的总称。古代中国位于滇西的横断山脉地区，昆仑山也就是横断山脉地区的总称。说到“海”，古代是把“海”作为中国的代称使用的，《山海经》中把中国称为“海”；四方称为“四海”，即东海、南海、西海、北海；中心地区称为“海内”；四边称为“海外”。说明《山海经》所称的“海”，指的是地域，而不是指水域。《山海经》中，也把较大的湖泊称为“海”，这是确指水域，但是这样的称谓并不多。把中国称为“海”，还是我国的传统习惯，并一直流传到今天，现在我

们仍然沿用着“五湖四海”、“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成语，用来比喻来自祖国四面八方，都是同胞兄弟。这里的“五湖四海”就泛指中国，而不是指水域。解读《山海经》，就要把握这些基本概念。

三、《山海经》“图”与“文”的关系

《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奇形怪状的事物，如有的人只有半边身子，有的长着人的脑袋、兽的身体，有的野兽有九个脑袋、九条尾巴，有的鱼长着一个头、九条身子，有的树长有几千尺高，可以从上面登上天庭等等，不一而足。使人大惑不解，以为是神话或巫书。这也是使《山海经》成为千古之谜，不得其解的重要原因。从许多古籍记载中考证，《山海经》最早的作者（《山海经》先后经过几百年才于商朝初年成书，参与写作者不是一个而是多人）首先绘制了一册《山海经图》，然后才写作《山海经》。《山海经图》没有文字，纯粹用象形图画作为地理符号，标记古代中国的山川、河流、地名以及重要历史遗迹等。《山海经》则是《山海经图》的文字说明，图册的地理符号画了什么图形，《山海经》就用文字进行说明。《山海经图》中，大多用人和动物图形作为地理符号，然而人和动物的种类毕竟有限，用来作为古代中国庞大地理体系的符号，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作者就在人和动物图形上任意进行创改，以异化的各种人和动物图形弥补地理符号的不足，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指出的许多奇异事物，但是当时《山海经图》和《山海经》一书一画，可以互读，并不难读懂，后来，大约在商朝末年《山海经图》就亡失了，只留下《山海经》传世。《山海经图》亡失后，《山海经》读起来就十分离奇，不知所云，难读难懂，而且产生了各种歧义。所以，我们解读《山海经》，

必须了解山海经的“图”与“文”的历史关系。正确看待经文中的异化物像，把许多的有关物像作为地理符号进行研究，才能拨开雾翳，找到经文的地理意义。

四、古代的计数单位与现代不同

《山海经》中的里程计数单位与现代的差别很大，据扶永发对《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载地里里程与滇西部的地理里程进行测算对照的结果表明，古代的里程单位只相当于现代里程单位的 3.4%，即古代的 100 华里，只等于现代的 3.4 华里。用这样的比例对滇西横断山区的地理里程进行测算，就可以得出与《山海经》所载地理里程大体相似的结果。古代的寿岁计算单位，与现代计算单位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古代的一周岁，只相当于现代的一个月。《山海经》中有人活到八百岁、一千岁的记载，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它只相当于现代的 66 岁和 83 岁。我们解读《山海经》时，运用这样的比例关系，就能畅读无阻，不为庞大的数字所难。

五、经文中错讹较多，必须认真考证

《山海经》大约经历数百年，由多人所作才最后成书，又是用竹简书写，因此，书中文字错讹、字句脱落、段落错简错杂或被后人羼入文字的现象较多，使阅读带来一定困难，好在许多训诂家、注释家对《山海经》作了大量考证和注释工作，为后人的阅读提供了许多方便，但是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有的注释家对《山海经》也存在歧义，因此，有些注释就未必确当，我们在解读《山海经》中，既要借鉴前人的译注，又要善于独立思考，进行认真的考证，这样就能顺利批阅各卷，获得《山海经》的真谛。

下面我们按经文先后，分段试作解读。

经文（1）：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

经文说，在中国西北部、大荒的一角，有一座山体断裂、不规则的山，名叫不周负子山，在《山海经图》中，画着两头守护状的黄毛兽图形，作为这座山的地理符号。这个地方有一条半温半凉的河水，名叫寒暑河，河水的西部有一座湿山，东部有一座幕山。这一带还有一座山，名叫禹攻共工国山。

这段经文，记载了今天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县以及丽江县等三县结合部之间的一段地理。部分古代山地名还有遗存，现在将经文所记的四山一水与当地地理作如下对照解读。

（一）不周负子山，指剑川县上兰乡境内的亥走山和美水山。

上兰乡位于剑川县西部，为一狭长谷地，东连老君山脉，与县城金华镇隔山相连，西倚盐路山脉，和兰坪县城金顶镇隔岭为邻，南与该县马登乡毗连，北接兰坪县通甸乡谷地。亥走山和美水山，是上兰乡美水行政村西南的山岭，两山之间有一个峪口，因山体被山洪冲刷切割而凌乱不周匝，所以古代称它为不周负子山，形容它的山体不规则，好似背负孩子之山岭。现在亥走山下有一白族村子，村名还叫“夫再木”，夫再木（即“负子母”的谐音）是一句白族语，译意为“背负孩子的母亲”，可见夫再木这个村寨名，就是不周负子山的古地名遗存。

（二）寒暑河，指发源于兰坪县通甸乡黄木山，流经剑川

县上兰乡谷地，注入白石江的一条无名河。

剑川县上兰乡谷地，与兰坪县通甸乡黄木村南北相连。黄木村属于通甸乡丰华行政村。在黄木村南面，有一条箐河，叫黄木沟，箐水清澈冰凉，发源于黄木山，从黄木沟出口，流向上兰谷地，在美水行政村夫再木（自然村）东南，与老君山西麓山下的白石江汇流。上兰谷地在古代可能属于火山活动区，火山熄灭后，由于地下死火山的作用，又成为地震多发区，1948年曾发生过6.5级强烈地震，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这里的谷地上还有多处温泉涌出，黄木沟冰凉的山箐水流经上兰谷地，与地下涌出的温泉汇合以后，它就变成了半温半凉的河水，然后汇入白石江，所以古人就把它称为寒暑之水，取意十分确切。

（三）湿山，指兰坪县金顶镇东南，与剑川接界的盐路山。

经文说“水西有湿山”，指寒暑之水的西面有一座湿山。上文已考出寒暑之水发源于通甸乡的黄木山，因此湿山必须在黄木山的西面寻找。黄木山西面紧连兰坪县的金顶镇，金顶镇是一个两山夹一水的峡谷山区，东面有一座盐路山，西面有一座玉坪山，两山之间纵贯着一条河，称为沘江。湿山，是指盐路山。盐路山东与剑川县上兰、马登两乡接界，南接云龙县，西止沘江河，北连玉坪山，南北走向，主峰雪帮山，海拔4295.3米，常年积雪。由于山势高峻，面向金顶峡谷的一面背阴，受阳少，冰雪融化后，溪水横溢，沟壑溪流甚多，山体多水，潮湿，沘江之水大多源于盐路山流下的溪水，古人针对盐路山的山形特征，取名湿山。盐路山则是后来的取名，因兰坪在清代开发盐矿以后，成为滇西产盐重镇，食盐大量外销，当时没有公路，运盐全靠人背马驮，而湿山是盐运的必经要道，于是湿山就被后人改称为盐路山。

（四）幕山，指剑川县上兰乡老君山西麓主峰下的山神岭。

经文说："水东有幕山"，指不周负子山东面有一座幕山。上文已考出不周负子山指今上兰乡美水行政村西南的亥走山和美水山，这两座山的东面是老君山山脉，因此幕山应指老君山的一支山岭。老君山为南北走向，南起剑川沙溪，北止丽江九河，是耸立于丽江、剑川、兰坪三县之间的一条山脉，《山海经》称它为钟山，并有多处记载，说山上有天帝的空中花园，古代帝王常常登临玩赏，遥观九州山河，是为古代中国的一座名山。老君山有两个高峰，第一高峰靠南，位于剑川、兰坪、丽江之间，第二高峰偏北，海拔 4213 米，位于剑川、丽江之间。在第二高峰附近山梁上，有一小山峰，形状酷似一口倒扣的大钟，因此《山海经》称第二高峰为"钟山"，这是特指"钟山"，老君山山脉也因之称为"钟山"，这是指大范围的"钟山"。在第二高峰即特指的"钟山"下面，有一支突现的山岭，当地民间称它为山神岭，这就是古代的幕山。

（五）禹攻共工国山，指兰坪、剑川、丽江三县间之界山老君山西面的山神庙山。

禹攻共工国山，是因为禹攻共工国而得名。禹攻共工国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古代有许多传说，《山海经》中也有多处记载，为了考明禹攻共工国山的原由，谨结合经文与传说试作如下解读。

《山海经·海内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又，《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共工臣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地，三沮三沮，乃以为池，群

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山北。”据传说和经文记载，中国古代曾出现过“洪水滔天”的特大水灾，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威胁，当时的水工大臣鲧受命领导治水，但因方法不对，治水没有成功，鲧也被处死。后来由颛顼帝派禹领导治水，禹是鲧的遗子，又称大禹，他吸取父亲一味筑堤拦洪而失败的教训，在领导治水中，身先士卒，率领民众凿石开道，疏通壅塞，把洪水引入大江大河，然后归入大海，终于治平了九州水患。大禹治水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平息了共工国的战乱，才取得成功的。原来，在丽江县石鼓镇的金沙江沿岸，远古时代建立了一个共工国的原始部落，部落首领共工是炎帝的玄孙，他聪明、干练，把共工国治理得很强大，却不服颛顼帝的统治，并组织民众武装，经常与颛顼帝进行对抗。当时，金沙江是洪水灾害的主要发洪源头，必须重点治理，但是通往共工国的九河山口大道即古代“不周山”的山口，被共工国的部民严格把守，使大禹不能带领治水队伍进入石鼓施工治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大禹只好率领队伍，绕道从老君山西面经剑川马登、上兰，进入兰坪通甸，从通甸与剑川、丽江接界的老君山巴拉山口，攻入石鼓，首先杀了为首的共工国头目相繇，灭了共工国，然后才疏通流道，治平金沙江源头洪水，在金沙江江岸台地上为已故的先帝修筑了“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见《山海经·海内北经》），作为纪念和镇江之宝。由于这个缘故，古人才把大禹绕道进攻共工国（石鼓）的老君山巴拉山口，取名“禹攻共工国山”，这座山现在称为山神庙山，海拔 3681 米，是兰坪县通甸乡与丽江县之间的中界山，属老君山脉的北沿山体。

经文（2）：

<u>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u>

经文说，有一个部落，叫淑士国，（部落的首领叫）淑士，他是颛顼的儿子。

这段经文与第一段连文，说明淑士国就在不周负子山的附近。经文还指出淑士国的部落首领淑士是颛顼之子，说明颛顼是当时中国的一位重要人物。这里，我们根据经文先对颛顼的身份作一解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这段经文说明了颛顼的帝王身份，并且说明他是黄帝的曾孙。中国远古时代曾产生了“五帝”，据扶永发考证，其先后排列秩序是：炎帝（帝尧）、黄帝（帝喾）、丹朱帝（帝鸿）、舜帝、颛顼帝。即颛顼帝是五帝中的末代帝王，颛顼帝以后就进入夏朝，从此中国漫长的原始社会宣告结束，奴隶制国家开始确立。这段经文说明，淑士国为颛顼帝的太子建立的部落，淑士国就位于古代的不周负子山的东麓山下，其国邑故址在今剑川县上兰乡新生邑行政村驻地的新生邑。

经文（3）：

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这段经文是对《山海经图》中女娲墓地理图形标志的文字说明，经文应作这样解读：女娲死了以后，尸体葬在栗广之野山的路上，灵魂化作山神，仍在栗广之野的山上。《山海经图》中画着十个神像——好似女娲的肠子，那就是女娲墓的地理标志。

女娲“摶土造人”、“炼石补天”的神话在我国流传很广，大意是说：盘古氏开天劈地以后，世上除了女娲，再没有第二个人，于是女娲用黄泥捏了无数的男女人泥塑，吹了口气，使

之变成了活人，人类繁衍起来以后，天又漏了，地也陷了，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女娲又炼了五色石，把天补起来，砍下大龟的四腿，把地支起来，人类又安稳地过着日子。虽然这只是神话，但也反映出人类经历了一个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由有威望的老年妇女担任部落酋长，指挥部落的事务，妇女担负着采集食物，炼制陶器，养老育幼的重要工作，男人主要是外出打猎，走游不定。那时还没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子女只认得母亲，不知道父亲。女娲的神话故事实际是反映了母系社会时期，妇女的重要社会地位和作用。从《山海经》记载看出，女娲是实有其人的，而且是中国远古社会很有作为、威望很高的一位女性，所以女娲之尸才被奉为神灵。然而女娲毕竟是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社会里的人物，传说女娲还是黄帝的妹妹。因此关于女娲造人、补天、拯救人类的传说，则是人们因崇敬女娲而编织的神话。这些神话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类和万物起源的原始观念与意识，所以对这些神话传说也是无可厚非的。

从女娲之肠与淑士国连文的情况考之，女娲墓葬的栗广之野，就指上兰乡新生邑村的西北、通甸乡丰华行政村西南的黄木村所依的黄木山。女娲墓的故址即在黄木山上。

经文（4）：

有人名曰石夷，（据考，石夷之后脱落“西方曰夷”四字——笔者注）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

经文说，有一个人名叫石夷，（住在西方）又叫西方夷，从（西方）那里吹来的风叫韦（风）。石夷处在中国西北角，在那里掌管太阳和月亮运行时间的长短。

经文记载了中国西方的气象观察活动，当时中国的四方都有专门管理气象观察工作的人员，东方的叫折丹，又叫东方折

（见《山海经·大荒东经》），南方的叫因因乎，又叫南方因乎（见《山海经·大荒南经》），北方的叫鹓，又叫北方鹓（见《山海经·大荒东经》），他们在当时中国的四方，观察和掌握日月运行、风向、气候变化情况，通告所在地部落。他们是我国远古时代的天文学、气象学专家。

从上下连文考之，西方石夷观察气象的地方，即指今兰坪县通甸乡西面弩弓行政村所依的弩弓山（属玉坪山脉），该山主峰海拔为3500多米，位于栗广之野故址黄木山的西北角，这里是从西北部观察气象的理想位置。

经文（5）：

有五采之鸟，有冠，名曰狂鸟。

经文说，有一种鸟，长着五采羽毛和肉冠，名叫狂鸟。

《尔雅·释写》作注说："狂，梦鸟。"袁柯先生跟注说："狂，《玉篇》作鵟，疑即凤凰之属，所谓狂者凰也，梦（寐）者凤也。"我国民间传说中有一些象征性的动物，如龙、凤凰、麒麟等，它们只是一种观念形象，并不确指具体的物体，如凤凰一般代表吉祥、美好，而不指具体的鸟。狂鸟，五彩缤纷，美丽动人，属于凤凰之类，狂鸟所在之处，喻意为吉祥的地方。从上下文考之，此处经文所指的狂鸟所在地，就在西方夷所在的西北角，即指今兰坪县通甸乡弩弓行政村驻地的山野。

经文（6）：

有大泽之长山，有白氏之国。

经文说，有一座山，叫大泽之长山，有一个部落，叫白氏之国。

这段经文只记述了地理物象，却没有说明地理位置，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山海经》各卷中都有，所以单独解读比较困难。但《山海经》有十八卷，有的卷记略，有的卷又记详，而

各卷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只要对相近的各卷经文进行互读对照，互相印证和补充，就可以了解各种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全貌。因此，为了解读上述经文，我们就需联系《山海经》的有关各卷进行互读。

关于大泽长山，在《山海经·西次三经》中说："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北望诸，槐鬼离仑居之……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经文是指中国西部有一座槐江山，山势非常雄伟，山上有天帝的空中花园（"平圃"），帝王们常常登临此山，遥望中国四方的名山、大川、水泽和那里的鬼神。文中"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是指长山山下的大泽。现已考出，淮江山指今老君山北段的第一高峰，此峰位于剑川、兰坪、丽江三县交界处，海拔3742米，登上此峰，四面的群山皆尽收眼底，向西面看，可以看见山下的通甸坝子和坝子里的一个湖。通甸坝子，实际为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的狭长槽地。在今天通甸乡政府所在地通甸街以南、福登村以北的宽谷中，古代有一个大湖。现在大湖虽然早已消逝，湖床成了陆地，但掘开地表，地下就是湖石和泥沙的积淀层，当地民间也有古代这里有大湖的传说。可见，文中"西望大泽"即指老君山第一高峰西面山下的古代通甸大湖。大湖南边有一座山，因大湖而得名，叫大泽之长山，它就是今通甸槽地南部的福登山。

关于白氏国，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白民之国（此处氏为民之误，应为白氏之国——笔者注）在龙鱼北，白身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经文是说，有一个白氏国的部落，坐落在龙鱼的北面，它在《山海经图》中的图形为一个披着长发的白人。产骏马，名叫

乘黄，背上有角，形状像狐狸，骑上它，可以活到160多岁（这是对乘黄马有特殊功力的写意之笔，未免失之夸张）。根据对各卷经文的互读可以得知，龙鱼是大泽中特产的大鱼，产龙鱼的大泽，即在今通甸槽地中福登村和通甸街之间的宽谷地带，宽谷地带（古代大泽）北面的通甸街处，就是古代白氏国的国邑故址。

经文中还有“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一句，这是说大泽是后稷进行水下作业（“潜”）之处。说明后稷曾经在大泽和白氏国这一带活动过。这里对后稷其人也作个粗略介绍。

后稷是黄帝之子（详见后文第8段），约生于4000多年前，是我国农业的伟大创始人，后稷的古代传说很多，有的说后稷走遍九州，尝遍百草，发现稻、麦、荞、菽、麻可以食用，采来五谷草籽，教人播种，开始创造了农业生产；有的说，后稷从天上偷了五谷种籽，来到地上，教会人耕种。古人非常尊崇后稷，称他为神农氏。从“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的记载看，古代大泽的附近，应该是白氏国的农业耕作区，后稷利用大泽水进行灌溉和田间耕作，但从高处往下看，只见水田和大泽连成一片水域，好像后稷是潜入大泽中作水下作业，于是才有以上的经文。由此可见，后稷当是白氏国的部落成员。后稷生前还云游九州，传播农耕技术，死后葬于“都广之野”（见《海内经》），即葬于今保山市河图乡红庙行政村西北的皇家坟山之上，扶永发曾登临该山考察，发现后稷坟还隐约可见。白氏国的遗址通甸街和保山市的皇家坟山，都是我国农业创始人后稷的重要纪念遗址。

经文（7）：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

经文说，在中国西北边境、赤水东面，有一个部落，叫长

胫之国。

经文从这里由中国西部，开始转人对西北边境的地理记载，赤水是河流名称，《山海经》中记载了两条赤水，一条指流经云龙、漾濞，汇人澜沧江的支流河漾濞江—黑穗江；一条指怒江。上文所载的赤水指怒江。怒江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南麓，流经西藏，称那曲，从西藏察瓦隆流人云南省后，称怒江。怒江流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贡山、福贡、泸水三县，从泸水县上江乡流入保山市，再经德宏州出境，从缅甸注入太平洋。其中怒江流经的北自贡山、南至保山的流域地区，就是远古中国的西部和西北部边境，即“西北海之外”的范围。经文“赤西之东，有长胫之国”的长胫国故址，指今怒江州福贡县境内怒江东岸的鹿马登乡驻地的卡谷娃底村。

经文（8）：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经文说，有一部落，叫西周之国。部落的人都姓姬，吃五谷。有一个人，叫叔均，叔均驾着牛，做出开始耕地的样子，这是西周国在《山海经图》中的图形符号。帝俊生了后稷，后稷从天上把百谷的种子带到人间。后稷有个弟弟叫台玺，生了叔均。叔均就代替他的父亲和后稷播种百谷，还创造了牛耕的农业技术。那里有一个人，叫赤国妻氏，有山，叫双山。

这段经文涉及的地理和历史人物较多，谨分别作如下解读。

（一）西周国故址，指今福贡县石月亮乡驻地的利沙底村。利沙底村坐落在怒江东岸的台地上，南距长胫国故址鹿马登乡卡谷娃底村 30 多公里，1984 年怒江州文物普查队曾在该乡怒

江西岸的米俄鲁村，发现新石器文化和青铜器文化遗址、遗物，据专家鉴定，在四千多年前，怒江两岸就有了人类生息活动。这些情况说明，远古时代怒江沿岸已经有了原始人类组成的氏族部落，这是不容置疑的。

（二）帝俊、帝喾和黄帝。经文说："帝俊生后稷"。《山海经》中多处记载的帝俊和帝喾是黄帝的别号，三种称谓实际只是黄帝一人。是知"帝俊生后稷"，后稷是黄帝之子。

（三）"赤国妻氏"，据考怒江古代称赤水，"赤国"为怒江的一个部落，指"西周国"。"赤水妻氏"指后稷的生母姜原。

（四）"有双山"，指西周国所在地有两座山。经考，西周国位于今怒江东岸的利沙底，利沙底坐落在东面的碧罗雪山和西面的高黎贡山之间，"双山"就指这两座山，而非指山名。

经文（9）：

西海之外（据上下文考，此文"西"字之后，脱一"北"字，应为"西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

经文说，在中国西北边境，大荒当中，有一座山，叫方山，山上有棵大青树，名叫柜格松，这里是太阳和月亮升起和落下的地方。

方山，指今福贡县利沙底乡境内、怒江西岸高黎贡山的亚哈巴峰，又称月亮山。亚哈巴峰海拔 3000 多米，呈长方形，高高地耸立在高黎贡山顶峰，故古称方山。山峰顶部，有一个高 40 余米，宽 36 米多的巨大溶洞，溶洞呈椭圆形，中间有一棵大青松，溶洞背面衬着蓝天，从山下仰望，就像一轮十五的满月，高高地永远挂在天边。因此当地傈僳族给它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亚哈巴"，汉语翻译过来就是"石月亮"，此处现在已开发为怒江州的旅游景点，把它称为"月亮山"。月

亮山坐落在怒江西岸，如从山下的江岸往上看，就好像太阳和月亮从那天边的大溶洞里落下去；如转到月亮山的东面（怒江的背面），从下往上看，又好像太阳和月亮是从天边的溶洞里面升起来。所以经文说方山为“日月所出入也”。

经文（10）：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食谷，使四鸟。

经文说，在中国西北边境、赤水西岸，有一个部落，叫先民国，吃五谷。《山海经图》中，先民国以使虎、豹、熊、罴四兽的图形为地理符号。

据释注家郝懿行考证，经文中的“先民国”为“天民国”之误。在《淮南·坠形训》篇中，记载了三十六国，其中就有天民国。天，古字写作“兲”，或写作“飛”，“兲”与“先”字形相近，以致误为先民国。所以此处赤水西岸的部落应为天民国。

据上下文考，天民国位于怒江西岸，“方山”的北部，其国邑故址，指今福贡县以北之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城所在地茨开镇的茨开村，位于怒江西岸谷地中。

经文（11）：

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经文说，有一部落，叫北狄国。黄帝的孙子叫始均，始均生了北狄，繁衍成为北狄国部落。

北狄国在西北边境、天民国以北、赤水西岸，指今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乡驻地的丙中洛村。丙中洛坐落在怒江西岸、高黎贡山的主峰卡瓦卡博山下。这里古代以北狄为地片名和人名，现在遗存下来的地片名还有狄麻鲁，人名有狄南等。这里是古代北狄国的故地，这在当地独龙族和怒族的《创世纪》传说中，也有流传。《创世纪》中说，远古洪荒年代，

洪水淹没了大地，有两兄妹爬上高高的卡瓦卡博山顶，才幸免于难。（卡瓦卡博，为高黎贡山北部的最高主峰，位于怒江西岸，丙中洛村西北角，海拔5128米，为怒江州内的最高山峰，山顶常年积雪，形成巨大冰川。《山海经》中记载了中国北部有五座“冬夏有雪”之山，卡瓦卡博为其中的一座——笔者考注）洪水退落以后，两兄妹发现地上只留下他们两个人，于是依天意，结成夫妇，重新繁衍人类。他们一共生下九男九女。九男九女长大后，又配成九对夫妻，分别走到九条江的流域去定居生活，繁衍后代。这九对夫妻就是：大哥阿棒和大姐阿南为一对，走到出太阳出来的东方金沙江，成了汉族；二哥阿顶和二姐阿领为一对，走到澜沧江流域，成了藏族；三哥阿肯和三姐阿开为一对，走到卡瓦卡博山西面的独龙江流域，成了独龙族；四哥阿省和四姐阿者为一对，走到太阳落山的西方俅江流域，成为缅甸的阿铺族；五哥阿狄和五姐阿请为一对，留在卡瓦卡博山下的怒江流域，成了怒族……从此以后，九条江流域的人类就重新繁衍和发展起来。

《创世纪》中的这段传说表明，远古时代，在怒江西岸的卡瓦卡博山下就居住着一个阿狄氏族，这与《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关于西北边境，有一个北狄国部落的记载是完全能够吻合的，把北狄国故址，考定在今贡山县卡瓦卡博山下的丙中洛，也是正确的。

丙中洛是古代北狄国部落的故地，还可以从北狄国部落人口的迁徙历史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四千多年前，北狄国部落开始在丙中洛组成，经过几十代生息繁衍后，人口逐渐繁密，人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为了求得部落人口生存发展的空间和物质条件，他们大约在三千多年前，与当时中国出现的大迁徙人流汇合，向他们的周围地

区进行迁徙、拓展。从后来北狄人分布的情况考察看出，古代北狄国部落的人口迁徙，主要向南北两个方向流动。一部分人口逆怒江北上，越过青藏高原，向北方迁人，并与当地的世居民族融合，发展为北方的北狄民族；一部分人口则向西行，翻越高黎贡山，沿着独龙江南下，向缅甸的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流域迁人，并与当地的民族融合，发展为南方的阿铺族（今景颇族）和俅人（独龙族支系）。还有少数人口越过碧罗雪山，向澜沧江、金沙江流域迁人，到了始祖黄帝的发祥地兰坪及剑川、丽江一带定居。

北狄国人在迁徙中，还把北狄部落的地片名和命名俗，也带到了迁人的地方，用来为迁人地命名、为后代命名。今天，在北狄人迁人的贡山独龙江地区和境外的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流域，还能发现大量的北狄国的古地名和人名。如独龙族的人名中有狄面顶（狄，今称作迪，狄与迪同音，仅为用字不同）、迪路、迪秀英、迪新华等；地名中有狄麻鲁、狄政当、狄南当、狄南、狄子江、狄不勒江、狄不图村、狄洛朗村等。这些地名和人名，像历史的活化石，把几千年前的历史记载下来，使后人循着它的踪迹，终于找到了远古中国西北边境的北狄国发源地，它就是今天怒江州最北部、与西藏交界的贡山县丙中洛。

经文（12）：

有芒山。有桂山。有摇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项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摇山，始作乐风。

经文说，有一座山叶芒山，有一座山叫桂山。有一座山叫摇山，山上有一个人，名叫太子长琴。颛项生了老童，老童生了祝融，祝融生了长琴，长琴是颛项帝的曾孙，名号叫太子长

琴，他住在摇山上，开始创造了各种乐曲，风行世间。

据上下文考，北狄国处于当时中国的西北极边，从这里开始经文记载北狄国东北部、今云南西北部边境的地理。

芒山，指今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境内的白芒雪山。白芒雪山位于德钦县城东部，为该县出入境的主要通道，海拔4000多米，山顶冬春积雪，每年12月到第二年6月为雪封山期，一年中只有4至6个月可以通行。

桂山，指白芒雪山向西延伸的山脉，海拔4000多米，德钦县城坐落于桂山的半山地带。

摇山，指太子雪山，又称梅里雪山，位于德钦县城西部。太子雪山为南北走向，主峰叫卡格博，海拔6740米，为云南省内最高峰。山顶终年积雪，万年不化，形成巨大的冰川，非常壮观。《山海经》记载了古代中国北方有五座“冬夏有雪”之山，太子雪山为其中的一座。

太子长琴，长琴是颛顼帝的曾孙，故号太子长琴；太子长琴住在摇山创作乐曲，后人就把摇山改称为太子雪山，并且一直沿称至今，成了太子长琴和他居住的古代摇山最有力的证据。太子长琴创作的乐曲首先在摇山——太子雪山一带流传，所以今天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族、傈僳族居民能歌善舞，继承和发扬了音乐始祖太子长琴的乐风。

经文（13）：

<u>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u>

经文说在芒山、桂山、摇山一带山野中，生活着三种长着五彩羽毛的鸟类，一种叫皇鸟，一种叫鸾鸟，一种叫凤鸟。

经文（14）：

<u>有虫状如菟，胸以后者裸不见，青如猨状。</u>

经文是指在芒山、桂山、摇山一带的山林中，有一种形态

像兔子的兽类，这种兽胸脯后面的身体裸露着，皮色青得像猿猴，把它裸露的部分掩盖住，使人看不见了。袁柯先生提出，这种兽可能就是古代称为菟的动物。

经文（15）：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沮玉门，日月所入。

经文从这里由西北海之外，转向中国西部地理的记载。经文说，大荒当中，有一座山，名叫丰沮玉门，太阳和月亮从这里落下。

丰沮玉门山，指今大理白族自治州中西部的永平县境内的博南山。博南山是滇西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山，西汉就设立博南县，修筑五尺道，通永昌郡（今保山市），为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古称博南古道。今天也是通往滇西边境保山、德宏、怒江等地的交通要道。《山海经》记载了当时中国西部的六座“日月所入之山”，博南山——沮玉门山是位于中西部的“日月所入之山”之一。

经文（16）：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花爰在。

经文说，有一座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个巫师，从这里上天下地，(与神灵沟通，采集药材)。山上有各种各样的药材。

灵山，指今永平县境内龙门乡大龙行政村与北斗乡黑豆场、二米六行政村之间的十山神山。十山神山，喻意十个巫师常在此山上下活动，因此而得名。灵山在《山海经》其他卷中又称巫山，灵山、巫山和十山神山，取意是相同的。说明十山神山是古代山名，它保存到现在，证明灵山指永平的十山神山的考定是十分正确的，后人把古代的灵山——巫山的山名搬到

四川境内，那是不对的。据说永平县在前几年进行地名普查中，把“十山神山”更名为“石山神山”，虽是一字之差，却完全失去了这座古代名山的原意，应该恢复原来“十神山”的古山名。

巫咸等十人，是当时中国西方的巫师。远古时代，人们笃信神灵，经常进行祭祀祈神的活动。《山海经》五藏山经在记载每条山系的同时，都要在每条山系后面载明该山系的山神名号，祭祀山神的规格、祭品和祭祀礼仪。在其他经卷中，也多有各种神灵的名号、所司职掌的和祭祀活动的记载。巫师则被认为可以同神灵沟通的人与神灵之间的中介者，他们主持各种祭祀仪式，宣示神灵的旨意；他们还兼司医药，采集药材，为人们治病。因此巫师在远古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

巫咸等十巫居住在“巫咸国”部落里。《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古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这是说，巫咸国是由巫师群组成的一个部落，它位于女丑的北面（女丑之说详见下文），“右手操古蛇，左手操赤蛇”是巫咸国在《山海经》中的图形符号。巫咸国有一座登葆山，群巫就从此山上天下地。可见巫咸国是巫咸等十巫所建的部落，登葆山和灵山——十山神山，是他们进行巫祝和采药活动的名山。十巫所在的巫咸国故址，就在今与永平县接壤的云龙县长新乡永香行政村的驻地永香村；登葆山，指今永香村东面的竹坡岭。

经文（17）：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瑶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

处，是谓沃之野。

（据《山海经》各卷互读得知，这段经文中“西有王母之山”一句中的“西有”为互换之误，应为“有西王母之山”；“有沃之国”一句中脱了“民”字，应为“有沃民之国”。需作更改和补充。）

经文说，有一座西王母山，一座壑山，一座海山。有一个沃民国，沃民在那里居住，他们吃着凤鸟产的蛋，饮着天降的甘露，想要品味的滋味，都能尝到。那里还有甘华树、甜相梨树、白柳，有视肉兽、三骓马，有璇瑰玉石、瑶碧玛瑙，还有白木、琅玕、白丹、青丹，还有很多银和铁。那里鸾鸟在自由地歌唱，凤鸟在翩翩起舞，各种飞禽走兽在那里聚集，和睦相处，所以那个地方就叫沃野。

这段经文，开始从中西部的永平、云龙，转向对两县西北的兰坪县境内的地理记载。文中涉及西王母、沃民国等重要历史人物和部落，谨分别作如下解读。

（一）西王母。西王母是古代的一位重要人物，《山海经·西次三经》说西王母“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是说西王母主管上天的灾厉和五刑残杀之气；又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这是西王母在《山海经图》中的图形符号。在民间，西王国传为拯救受苦人类，消除灾难的王母娘娘，要进行顶礼膜拜。

（二）西王母山——玉山。《山海经·西次三经》说：“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是知西王母山是指玉山。为了找到古代的玉山，扶永发作了大比例尺地图的测算，我们又多次进行了实地考察，现在已经证实，玉山就是今兰坪县河西乡玉狮行政村所在地的玉狮山。玉狮山本来的山名叫玉石山，玉石山与玉山，只有繁简之别，意思是相同的。玉石山古代产玉，直到

20世纪40年代还有人在山上开采玉石，人们还把玉石山上加工玉石的地方取名为玉石场，玉石山、玉石场都是因为山上产玉石而得名，说明玉石山是保存了玉山的古山名，极为珍贵，也说明西王母居住的玉山，就是这座玉石山。这座玉石山现在已经改为玉狮山，这还是20世纪30年代后的事。原来，当地农村里有一位教书先生，发现玉石山周围有青岩、箐口、金龙、白地、江头河等地名，忽然诗兴大发，就把玉石改成玉狮，然后把这些地名连缀成一首打油诗，诗曰："玉狮吼青岩，声响箐口，金龙绕白地，腰现江头。"打油诗在当地传开后，久吟成诵，原来的玉石山便随之被改名为玉狮山，山上的玉石场也跟着改称为玉狮场。地名只是符号，但有时又代表历史、记载历史。玉石山改为玉狮山，虽然是一字之差，却使玉石山失去了原来的历史意义。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西王母所居的玉山这段历史，我们建议当地政府把玉狮山重新恢复为玉石山或玉山，使它恢复原来的古山名。

（三）嫯山，指今兰坪县河西乡箐花行政村驻地的箐岩头山。此山坐落在玉狮山（玉石山）附近，海拔2966米，东起箐口坝村，西至河东村，北接箐河，南止箐花河。

（四）海山，指今兰坪县通甸乡通甸槽地东面的碧登山。通甸槽地的南部古代曾有一个大湖，前已论述。古时大湖又称"海"，如滇西最大的湖——洱海，古代称为"西海"。碧登山坐落在古代通甸大泽（大湖）的东面，所以古代称它为海山，即因大湖而得名。

（五）沃民国，其故址在今兰坪县通甸乡西南的水俸行政村驻地水俸村。水俸村居山，位于兰坪县玉坪山脉的东端，海拔2740米。这里有宽阔的山场，茂密的森林，水草丰盛，各种飞禽走兽汇聚群处，是一个山清水秀，物产丰饶，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优美山区。可以想见，4000多年前，沃民国部落的先民自由自在地在这里生活，吃着鸟蛋、饮着甘露，尽享大自然赐予的山珍奇味，并且把这里称为沃野，这是确切可信的。

经文（18）：

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在名少鵹，一名曰青鸟。

经文说，有三只大青鸟，长着红红的脑袋，黑黑的眼睛，一只叫大鵹，一只叫少鵹，一只叫青鸟。

经文说的这三只大青鸟，在其他经卷也有记载。《山海经·海内北经》说："西王母梯几"（应为"凭几"——笔者注）而戴胜杖（"杖"字为衍文）。其南有三只青鸟，为西王母取食。"这是说，西王母凭靠在一张矮几上，头上戴着玉佩，南边的三只青鸟在为她寻找食物。《山海经·西次三经》又说："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说的是三只青鸟栖息在三危山上。三危山，指今云龙县漕涧镇境内的三崇山上的大雪坪。三崇山坐落在西王母所居的玉山——今兰坪县河西乡玉狮山（玉山）的南面。从上述记载考知，三只青鸟栖息在今云龙县的三崇山上，它们有极强健的体魄和高超的捕食能力，在经过人们的驯养和特殊训练后，成为专门为西王母寻找和提供食物的大鸟。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山海经》各卷对三只青鸟都分别作了记载。

经文（19）：

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经文说，有轩辕黄帝的纪念台（纪念台在西方），凡是射箭的都不敢向西方射，这是因为敬畏轩辕黄帝威灵的缘故。

轩辕台和轩辕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始祖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和纪念台，找到轩辕台和轩辕国，就意味着找到了中华民族的

发源地。过去的许多学问家为寻找轩辕台，作过许多考证，但他们对《山海经》的看法不全面，把它当成神话、巫术、小说，不以《山海经》为根据进行考证，结果虽然花了不少心血，找到的轩辕台也不止一个，但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轩辕台。轩辕台到哪里找？正确的方式，只能是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按照经文所指示的方向去找。《山海经》是我国古代最早也是最有权威的地理宝典，《山海经》各卷中对轩辕台和轩辕国的地理方位、地理特征、地理联系都作了准确的记载，只要坚定地按照《山海经》进行深入切实的调查考证，真正的轩辕台和轩辕国是不难发现的。下面我们就按《山海经》的记载，对轩辕台和轩辕国作一次由近及远的寻找。

从上文记载中，已知轩辕台位于古代中国西方，但西方是一个大范围，轩辕台确切位置还不清楚。我们先从轩辕台周围的地理情况进行研究。《山海经·西次三经》有这样两段记载：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地。”“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无草木。洵水出焉，南流于黑水。”

前段经文是说玉山是西王母住的地方。后段经文是说玉山西面四百八十里（相当于现在的16华里），是轩辕丘（丘与山同义），洵水发源于轩辕丘，向南注入黑水。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考出西王母所居的玉山，指今兰坪县河西乡的玉狮山（原名玉石山）。河西乡的西面与通甸乡接壤，玉坪山的东端为两个乡之间的中界山。玉坪山是兰坪县境内的四大山脉之一，该山横贯营盘、拉井、石登、金顶、通甸三镇二乡，西迄营盘镇至澜沧江东岸，东起通甸乡槽地与河西乡相接。玉坪山的东段坐落在金顶镇境内，山势为坐西朝东，南北走向，兰坪县城设于玉坪山东麓山下的江头河村，有一条箐河，发源于玉坪山，东流穿过县城，在江头河村头注入沘江河，沘江河西流至金顶文

兴街处转向南流，进入云龙县后汇入澜沧江。澜沧江古称黑水，前已论述。这条发源于玉坪山，注入江河，最后汇入澜沧江的源头河，就叫江头河。由此考知，西王母所居的玉山西面的轩辕丘，就指今兰坪县境内四大山脉之一的玉坪山山脉；发源于玉坪山，南流注入黑水的洵水，是指今天发源于玉坪山与泚江汇合后南流注入澜沧江的江头河。

以上我们从轩辕台东面的玉山反求，找到了轩辕丘。找到轩辕丘后，离找到轩辕台就不远了。下面我们又从轩辕台南面的女子国进行反求。

《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以下三段连文：

"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此"字为衍文——笔者注），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据上下文考知，此处"畏轩辕之丘"者，实指轩辕台，非指大范围的轩辕丘——笔者注）。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

三段经文大意是说：在巫咸国北面，有一个女子国，周围环水，《山海经图》中以两女子图形为地理符号；在女子国北面，穷山的附近，有一个轩辕国，该国的人长寿，短命的也活到60来岁，《山海经图》中以人面蛇身，尾巴盘在头顶的图形为地理符号；在穷山的南面，轩辕国邑的北面，有一个轩辕台，形状是方形的。人们敬畏轩辕黄帝的灵威，不敢向这个方向（西）射箭。《山海经图》中有四条蛇互相盘绕的图形，就是轩辕台的地理符号。

上文我们已考出巫咸国故址，在今云龙县长新乡永香行政村驻地的永香村，巫咸国北面女子国的故址，即指永香村北面、云龙县白石乡松木行政村的水城村，水城村三面临水，故

名（详说见下文女子国条）。水城村北面，就是与云龙县接壤的兰坪县金顶镇，故知女子国北面的轩辕国故址，即指今金顶镇文兴街，其国邑在文兴街谷地的西南角。这里就是轩辕黄帝诞生的地方。轩辕国附近的穷山，指今金顶镇文兴街所依的二五山至兰坪县城所在地江头河村所依的玉坪山山段。这段山属于玉坪山山脉的东延部分，也就是古轩辕丘的一部分，古称穷山。

穷山，又称江山，《山海经·大荒西经》第25段经文载曰：

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

不寿者乃八百岁。

（据上下文考知，此段经文记于本卷第25段，上下不能连文，殊属错简，应前移至第20段，方能上下连文，并与海外西经的上述记载相互吻合。出现这种错简情况的原因，主要由于古人把文章写在一片片各自独立的竹简上，最后才把无数简片连缀起来，编织成书卷，这样就难免在编缀过程中，发生错简编织的情况，致使上下不能连文和造成歧义。《山海经》为多人所作，又经历了数百年才编缀成书卷，因此书卷中错简的现象时有出现，造成阅读和考释的很多困难，本卷经文之第25段就是一例。故此，为使第25段的解读不致发生歧义，笔者把这段经文前移到此，与第19段经文连文解读——笔者注。）

经文说，有一个轩辕国，坐落在江山之南的吉地上，这里的人多长寿，短命的也活到60来岁。这段记载与《山海经·海外西经》的记载是一致的，只是《山海经·海外西经》称轩辕国附近的山为穷山，此处则称江山，说明穷山和江山是有两个山名称谓的一座山，从实地考察情况看，这座山称为江山更为确切。因为这座山为南北走向，它的南边山下，紧连金顶文兴

街的谷地，这里就是古代轩辕国的国邑故址；山的北端则与兰坪县县城所在地的江头河村紧连。古洵水就发源于此山的北端，河水从山脚注入泚江，所以取名为江头河，而江头河的发源山也因故取名为江山，这就是江山的取意和历史由来。说明金顶镇境内南起文兴街，北至江头河这段南北五公里长的玉坪山山段，就是古代中国所称的江山；这又雄辩地证明，江山（今金顶镇境内玉坪山山段）的南边、金顶镇文兴街谷地的西南角为古代轩辕国的国邑故地，这一历史的考定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轩辕国考出以后，轩辕台的位置就自然显现出来了。

上文说，轩辕台的南面是轩辕国、北面是江山（穷山），轩辕台就在轩辕国和江山的中间。从实地考察的情况看，轩辕台实指玉坪山向东伸向金顶镇文兴街谷地的二五山山前的一个土丘，南距古轩辕国国邑故地文兴街西南角仅一华里，北距江头河约四公里，从文兴街二五山山脚拾级而上，只要十几分钟就登临古轩辕台故地。轩辕台故址是一个长方形土丘，上面没有任何建筑物和标志。土丘一侧，立着一个小亭台，供上山的香客休息。从轩辕台往上攀登，在该山的半山平台上有一座三圣宫，山顶有一座金顶寺，当地香客经常到这些古刹里举行朝祭活动。

二五山取名于什么年代，取意是什么，这些问题当地没有人能够说明。遍读古籍，才发现“二五”一词是易经卦爻名，《词语大词典》注曰：“二五指别卦中的第二爻与第五爻”；“二为阴，五为阳”；“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天地定位，二五怀胎”。《三国·魏王弼注》曰：“利见大人，唯二五焉。”《易·乾》曰：“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述词典的记载集中说明，二五是古人对伟大人物怀

胎和降生的吉卦；以二五之卦爻名于山，表明此山是伟大人物出生的名山。金顶镇二五山，就是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始祖黄帝在此孕育和降生而命名。

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总要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遗迹。在金顶文兴街二五山的对面、沘江东岸有一座凤凰山，山口有一条通向云龙的山道，这个山口一直被称为黄帝口，至今不改。过去没有人知道黄帝口缘何称起？轩辕台定位台，黄帝口的千年不解之谜才得到破译，现在可以断言，金顶文兴街对面凤凰山的黄帝口，是古代的地名遗存，起源于黄帝时代，因黄帝经常从这个山口出入而得名。

二五山与轩辕台的定位，黄帝口的破译，使历史在这里得到重合，同时也向世人昭示，二五山——轩辕黄帝孕育和诞生的故里——是中华民族起源的伟大圣地。

经文（20）：

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

经文说，大荒当中，有一座龙山，太阳和月亮从这里落下。有三个大水潭，名叫三淖，是昆吾取食的地方。经文从这里由兰坪重新转向南面云龙、保山、腾冲一带的地理记载。龙山，指今云龙县表村乡所在地的碧罗雪山山岭，山下有三潭池水，有鱼虾。

经文（21）：

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

经文说，有一个人，穿着青衣，用袖子遮住自己的脸，名叫女丑尸。

经文说的是女丑尸体埋葬时的形状。女丑是在古代中国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中死去的，因此《山海经》中多次提到女丑

之尸。

《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据扶永发考证，女丑出生在古代中国西部地区的丈夫国北面，是替人作法行医的女巫，在古代中国东部区的汤谷一带供职。汤谷是帝俊的妻子羲和生下十个男孩的地方，（见《山海经·大荒东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帝俊的十个男孩就是"十日"，而非"天上的十个太阳"。后来"十日"把女丑用火烧死。女丑死后，尸体运回她的出生地，埋葬在丈夫国的北面。据考，女丑被杀的地方汤谷，指今宾川县海稍水库一带；丈夫国故址指今云龙县长新乡驻地的沘江河东岸。女丑之尸葬于长新乡北面包罗行政村驻地的山坡地上。

经文（22）：

有女子国。

上文已考出，女子国故址在今云龙县白石乡松木行政村所属的水城村。水城村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它的北面是从兰坪县金顶镇流来的沘江；南面是从白石乡流出的稗子田河，两条河把水城包围在中间，所以经文说："女子国……水周之。"水城村就因三面环水而得名。

经文（23）：

有桃山。有茧山。有桂山。有于土山。

这段经文是本卷第 12 段的重简。第 12 段经文说："有芒山。有桂山，有瑶山。"本段经文则将"瑶山"错简为"桃山"；茧是"芒"的古字，其义同；"桂山"两文相同。上述各山在第 12 段中已经作了解读，于土山为桂山附近的山岭，这些山都在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境内，此处不再重述。

经文（24）：

有丈夫国。

这条经文应载于第21段经文之前，方可上下连文。笔者从第21段经文解读中，初步考出了丈夫国的位置，这里根据各经记载，再作一些解读。《山海经·海外西经》说："丈夫国在维鸟北，其为人衣冠带剑。"这是说，丈夫国坐落在维鸟山的北面，丈夫国的人穿衣戴帽，腰间佩剑，神情礼貌而威武。经文还说，维鸟山"在女祭北"。据考证，女祭是一个女巫师，居住的故地在今云龙县果郎乡永安村，永安村北面，为云龙县检槽乡境内的打鹰山，山上百鸟汇集，古称维鸟山。打鹰山北面，为云龙县长新乡，长新乡所在地的沘江东岸谷地，就是古丈夫国的故地。

经文（25）：

有弇州之山，五采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舞之风。

经文说，有一座叫弇州的山，山上有五彩斑斓的鸟，名叫鸣鸟。《山海经图》中以朝天仰头的鸟的图形为弇州山的地理符号。鸣鸟是凤凰一类善鸣能舞的鸟，因此奏乐歌舞便成了当地的一种风气。

弇州山，指今云龙县旧州乡澜沧江西岸的碧罗雪山，山上有各种珍禽奇兽，居住在山上的白族、傈僳族居民能歌善舞，热情好客，保持着古代的乐风。

经文（26）：

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这段经文为错简，已前移至第19段经文中解读。

经文（27）：

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

弇兹。

经文说，在西海沙洲上（“陼”指沙洲），有一名名叫弇兹的神，长着人的脸，鸟的身子，耳上挂着两条青蛇，脚下踏着两条红蛇，这是弇兹神在《山海经图》中的图形符号。

据《山海经》各卷记载，远古时代，中国四方分别有四个水神，镇守水域，他们是东方的禺——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山海经·大荒东经》）；南方的不延胡余——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山海经·海外北经》）；西方的弇兹（其形见前）；北方的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见《山海经·海外北经》）。据考，西海指滇西最大的内湖指大理洱海。“西海陼”，指洱海沙岸，这里就是西方神弇兹镇守的地方。

经文（28）：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人。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头山（“山”为“上”之误，应为“头上”——笔者注），名曰嘘（据前后文考，此处“嘘”为“噎”之误，应为“名曰噎”——笔者注）·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邛”为“印”之误，应为“印下地”——笔者注）。下地是生噎，处于四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经文说，大荒当中，有一座山，叫日月山，是天的枢纽，主峰叫吴姖天门山。山上有一个神，名叫噎；长着人的脸，没有双臂，两脚反架在头上，这是噎在《山海经图》上的图象符号。颛顼生了老童，老童生了重和黎。那时天与地隔得不远，人神杂处，互相干扰，为了断绝天与地的通道，颛顼帝就命令南正重用力把天往上举，命令火正黎用力把地往下按，终于把天与地远远地分开了。黎降回到地上，生了噎，噎住在大荒的

最西端，主管日月星辰运行的次序。

经文所说的天之枢纽——日月山，与《山海经·西次三经》所载的天山为一座山，只是称谓不同。该经说：“……天山，多金玉，多青雄黄。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经考，天山——日月山，指今云龙县槽涧乡与怒江州泸水县之间的中界山——志本山；英水指自志本山发源的槽涧乡境内的讲拐河；讲拐河西南流，与漕涧谷地上的温泉汇流。古人称温泉为汤，所以经文说英水（讲拐河）注于汤谷（温泉）。

经文（29）：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

经文说，有一个人，名叫天虞，他在《山海经图》中，以反长着双臂的人像为符号。

据上下文考，天虞是指天山——日月山上的一个神。天山，今已考出指今云龙县和泸水县之间的中界山——志本山。

经文（30）：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经文说，有一个女子，正在给月亮洗澡，帝俊的妻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开始给她们洗澡。

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山海经·大荒南经》也有一段：“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是说，帝俊的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正在甘渊水边给十个太阳洗澡。

我国古代有阴阳五行之说，指一切事物内部都是由阴阳两部分组成，有阴必有阳，阴阳相克相生，相依相成，组成事物。因此有天就有地，有日就有月，有男就有女；天代表阳，地就代表阴，日代表阳，月就代表阴，男代表阳，女就代表阴。上面两经文所说的太阳和月亮，实指生男生女。说是俊帝

的妻子叫常羲的，生了十二个女孩，以月亮的“月”给她们取名，俊帝的另一个妻子叫羲和的，生了十个男孩，以太阳的“日”给他们取名。这样才有常羲和羲和分别为她们所生的十二个月亮和十个太阳洗澡的记载。另外，帝俊是黄帝的别称，有四妻、四十四子女，说已见前。

常羲为月亮孩子洗澡的地方，指今云龙县槽涧乡所在地的槽涧盆地之中，这里是常羲居住的地方，常羲就在讲拐河与温泉汇流的汤谷水边为她的十二个月亮女孩洗澡。

黄帝（帝俊）的另一个妻子羲和所居的羲和国，又指东南方的宾川县，羲和给她的十个太阳男孩洗澡的甘渊，在今宾川县乔甸乡的海稍水库附近。

经文（31）：

有玄丹之山，有五采之鸟，人面有发。爰有青鸾、黄鹜、青鸟、黄鸟，其所集者其国亡。

经文说，有一座山，叫玄丹山，山上有一种五采鸟，玄丹山在《山海经图》中，以长着人的脸，头上长着头发的鸟为地理符号。还有青鸾、黄鹜、青鸟、黄鸟，这些鸟聚集在哪个国家，那个国家就会灭亡。经考，玄丹山指今云龙县检槽乡内的打鹰山。

经文（32）：

有池，名孟翼之攻颛顼之池。

经文说，有个池子，名叫孟翼攻颛顼池。

这段经文与篇首“禹攻共工山”有内在联系，都是属于古代炎黄战争长期延绵中产生的事件地名，应移到篇首记载，这样才能前后照应，上下连文。此文放在这里，属于错简。

根据《山海经》和其他古籍的记载看出，古代炎帝与黄帝之战，后来是共工和大禹之战，再后是孟翼同颛顼之战，虽然

每次战争都以炎帝一方被黄帝一方战败而告终，但战败的炎帝一方始终不服，仍在养精蓄锐，一旦时机成熟便重新与黄帝一方开战，使炎黄之战的余波一直延续到五帝时代结束之时。

孟翼同颛顼之战，发生在五帝时代的末期。当时，位于金沙沿岸的共工国部落已被大禹消灭，共工战死，为了巩固帝位防止共工国余部的再起，颛顼帝把他的两个儿子叔歇和中骗安置到共工国的故土上居住，在金沙江沿岸建立了“叔歇国”和“中骗国”两个部落。颛项帝和他的九个嫔妃，也经常到那里游玩，在石鼓街下面的江湾水域中洗澡。但在另一方，共工死后，他遗下的两个儿子术器和孟翼，也在暗中组织部民，进行着复仇的准备。有一次孟翼趁颛顼和九嫔在江湾水池里洗澡的机会，带领他的部民向颛顼帝发起进攻。不料颛顼的儿子们早有防备，击败了孟翼的进攻，使孟翼想在池中捉鳖的计划没有得手。事件发生后，颛项帝洗澡的那个江湾水池，就取名为孟翼攻颛顼池。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颛项帝死后，他和九嫔的尸体就葬在原共工国的故地务隅山，即今丽江县大具乡虎跳峡下口金沙江江岸的山上。

经文（33）：

<u>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钜，日月所入者。</u>

经文说，大荒当中，有一座山，名叫鏖鏊钜，太阳和月亮从这里落下。

据上下经文考读，鏖鏊钜这座山，指今云龙县长新乡永香村内的竹坡岭。(详见下文)

经文（34）：

<u>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屏蓬。</u>

经文说，有一种兽，名叫屏蓬，它在《山海经图》中以长

着两个脑袋、一个身子的兽为图形符号。

屏蓬这种兽，《山海经·海外西经》又作这样记载：

“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背有首，黑。”对屏蓬、并封两说，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并封、屏蓬是一种兽，应称“并逄”。并与逄都含有合的意思，一身两首也有合象含意，说明这种兽生着雄雌两种生殖器官。

经文说“并封在巫咸东”，我们在上文已考知巫咸国故址，指今云龙县长新乡永香行政村驻地的永香村，永香村东面为竹坡岭，是知屏蓬——并封兽出没的鏖鏊钜山，就指竹坡岭。

经文（35）：

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门之山，有人名曰黄钜之尸。有比翼鸟。有白鸟，青翼，黄尾，玄喙。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

经文说，有巫山、壑山、金门山——这是三座大神山。金门山上，有人，名叫黄钜尸，有比翼鸟。有一种白色的鸟，长着青翅膀，黄尾巴，黑嘴壳。有一种红毛狗，名叫天犬。天犬降落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会发生战事。

这段经文记载的神山，有的已经在前面提到，这里又集中记载，类似这样的重复记载在其他经卷中也时有出现，可能这是古人为了强调某些地理和事物的一种方法吧。

巫山。《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这是说巫山是一座盛产各种药材的神山，天帝的八库仙药贮存在山上，由黄鸟守护它，防止觊觎仙药的黑蛇偷窃它。巫山，即指前文所载的灵山，即今永平县龙门乡大龙行政村与北斗乡黑豆场、二米六行政村之间的十山神山（地名普查中改名石山神山）。

壑山。此山上文已载，指今兰坪县河西乡箐花行政村境内

的箐岩头山。

“金门之山。有人名曰黄钜之尸。有比翼之鸟。”这段经文可以同《山海经·海外南经》这样一段经文互读：“南山在结匈东南。比翼鸟在其东。”据考，结匈国故址，指今云龙县龙街镇沙鲁行政村内的碱水坡村，其东南方的南山，指今永平县境内的博南山（上文已考出），“比翼鸟在其东”，指比翼鸟栖息的金门山，就是南山东面的主峰，即博南山主峰。比翼鸟、白鸟在此峰栖息，黄钜尸（神）在此峰居住，天狗也在此峰生活。说明博南山主峰是古代的著名神山。

经文（36）：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经文说，在西海的南岸，流沙的边沿，赤水的后面，黑水的前边，有一座大山，名叫昆仑山。有一神，它在《山海经图》上以人面虎身，长着花尾巴，尾巴上有白色斑点的图像为符号（据《山海经·西次三经》的记载，此神即指管理昆仑山的大神陆吾），居住在昆仑山。山下环绕着弱水，山外有炎火大山，只要投进去东西就会马上燃烧起来。有个人，头上戴玉佩，长着老虎的牙齿，豹子的尾巴，住在岩洞里，名叫西王母。这座山上什么珍奇的东西都有。

这是一段以昆仑山为中心的综合地理记载，内容丰富，涉及广泛，谨对文中的要点分别作以下解读。

昆仑山（丘）。《山海经》中对昆仑山有多处记载，其所包括的地理范围则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昆仑山，包括远古时代的整个中国大地，也就是《山海经》所涉及的地理范

围。由于位于滇西北的横断山脉地区，其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0%以上，因此古代就以横断山脉地区为载体的中国大地称之为昆仑山。扶永发《神州的发现》对昆仑山的范围作了这样的界定："古昆仑山的范围……，就是今日云南西部纳溪河（在宾川县境内）—达旦河（在永胜县境内）和毗雄河—苴力河（在弥渡、南涧二县境内）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的横断山脉地区。大致说来，今日东经101°以西、北纬23°以北的纵谷地区，是《山海经》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5页）狭义的昆仑山，就是本文所载的"西海之南"的昆仑山。西海，指今天滇西最大的内湖——洱海；洱海位于横断山脉的南延地带，是知"西海之南"的昆仑山，不专指洱海南岸的山，而是指包括洱海周围在内的四面群山。洱海周围实际有两条山脉，一条是大理点苍山，在其西岸，一条是大理市与鹤庆、宾川两县之间的界山，在其东岸，两条山脉为南北走向，洱海位于两条山脉之间。"西海之南"的昆仑山，实指今天大理市境内洱海东西两面的大理点苍山和大理与宾川、鹤庆之间的界山。这段古昆仑山，在古代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山海经·西次三经》中说，这段古昆仑山，"实惟帝之下都"，山上有天帝在人间的宫殿，有为天帝管理大山的大神陆吾，有专为天帝管理衣冠服饰的神鸟"鹑鸟"。山上什么珍奇的东西都有。

流沙。流沙指河流，河中多沙，故名。《山海经》中记载了两条流沙河，一条指赤水的源头支流河，在保山市境内，一条指黑水的源头支流河，在大理州境内，本文"流沙之滨"中的流沙，指大理州境内的流沙河。这条河发源于剑川县境内老君山（古称"钟山"）西麓，源头称白石江，白石江南流入洱源，称黑穗江，黑穗江南流与漾濞江汇合后，西南流入云龙，

自云龙境内注入澜沧江（澜沧江古称“黑水”）。因此自白石江一黑穗江一漾濞江至澜沧江入口为止的这个河段，古称流沙河，流沙河流入今漾濞后，在今点苍山的西面山下环流，所以经文说昆仑山（点苍山）在流沙河（黑穗江—漾濞江）的河岸上。

赤水。《山海经》中记载了两条赤水，一条是黑水的支流河，指云龙县境内的黑穗江，一条指赤水主源河，流经怒江州和保山市境内。本文“赤水之后”的赤水，指赤水的主源河。这条赤水指怒江。怒江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南麓，在大理苍山的西部流经滇西边境，经文故称赤水在昆仑山之后，即指怒江在大理苍山的西面。

黑水。《山海经》中记载了四条黑水，一条指澜沧江，一条指发源于洱源的弥苴河及洱海，一条指保山境内的东河，一条指永平境内的羊火塘沟至六米河河段。后三条黑水都是黑水主源河——澜沧江的支流。本文所指“黑水之前”中的黑水，是指弥苴河及洱海。弥苴河发源于洱源县长木箐山谷中，东南流，在大理注入洱海，为洱海的主要水源河。洱海经西洱河出口，西南流，注入澜沧江，为澜沧江的主源河流。因此澜沧江古称黑水，其水源主流之一的弥苴河及洱海，也就称为黑水。是知经文所载“黑水之前”的昆仑山，实指洱海东岸、大理市挖色乡所居之山，也就是大理市与鹤庆、宾川两县之间的中界山。

弱水。指发源于兰坪县境内、流入云龙县的沘江在汇入澜沧江后，从这里起至黑穗江汇入澜沧江为止的澜沧江河段。扶永发考明：这段澜沧江河道向西南方向凸起呈一弧线状，环绕在昆仑山下，好像高山中的一道深渊。与经文中“弱水之渊环之”于昆仑山下的记载相吻合（见《神州的发现》第56页）。

炎火山。经文说："其外有炎火之山"，这里指《山海经》地理范围以外的昆仑山附近，有一座正在燃烧的火山，这座火山指今高黎贡山西境的腾冲县死火山，四千多年前腾冲火山尚处于活动期，所以文中有"投物辄然（燃）"的生动记载，说明作者当时亲睹了火山活动的实情。现在腾冲火山早已熄灭，但仍有丰富的地下热源向外喷发，成为我国少有的温泉和热气资源丰富的地区。扶永发考定《山海经》地理范围在滇西时，腾冲火山是其三个主要力证之一。

西王母洞。西王母是我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居住在西方的玉山，故名西王洞，说已见前。上文又提到西王母，指说西王母为"穴处"，就是在洞里居住。为此笔者曾亲临西王母故居今兰坪县河西乡玉狮行政村境内的玉狮山（即古代之"玉山"）作过察访，发现玉狮山上确实有个可供人住的唯一岩洞，洞口海拔 2700 余米，洞内为石灰石溶岩结构，直径约 11 米，宽约 13 米，洞口下临箐沟，溪水常流，访之当地居民，都说 20 世纪 50 年代还有人在洞里关牲口或临时暂住，后来洞顶溶岩崩塌，才停止使用。随后扶永发也到此洞考察，证明此洞就是西王母"穴处"的遗址。

经文（37）：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阳之山，日月所入。

经文说，大荒当中，有一座名叫常阳的山，是太阳和月亮落下的地方。经考，常阳山指今云龙县果郎乡天灯行政村境内的小五宝山。小五宝山古代的名称为"太阳山"，与常阳山取意相似，近代才改称小五宝山。

经文（38）：

有寒荒之国。有二人女祭、女薎。

经文说，有一个部落，叫寒荒国，部落中有两个人，一个

叫女祭，一个叫女蔑。

《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对寒荒国的有关情况也有记载，经文说："形天与帝在比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据考，常羊山即上文所称之常阳山）。……女祭、女戚（据考，女戚即女蔑）在其北，居两水间，戚（即蔑）操鱼（据考，应为"觛"，即酒杯），祭操俎。"

两文互读，是知常阳山是形天所葬的名山，女祭、女蔑所在寒荒之国坐落在常阳山北面、两条河水的中间，女祭、女蔑是两个女巫师。《山海经图》中画着女蔑拿着酒杯、女祭捧着图案的图像，这是寒荒国的地理符号。据上下文考，寒荒国的故址，在今云龙县果郎乡汤邓行政村境内的沘江河畔。即在果郎乡天灯村小五宝山（古常阳山）北面。

经文（39）：

有寿麻之国。南岳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寿麻。寿麻正立无景，疾呼无响。有大暑，爰不可以往。

经文说，有一个部落，叫寿麻国。南岳娶了州山的女儿女虔。女虔生了季格，季格生了寿麻。寿麻国的人站在太阳地上，没有投下影子，高声呼喊听不到回音。由于气候非常炎热，人们不到那里去。

从经文看出，寿麻国是寿麻建立的氏族部落，寿麻又是南岳的后代，南岳据说是黄帝的后代。《冠篇》载曰："帝鸿初为南岳之官，故名南岳。"这是说黄帝的儿子帝鸿，也就是五帝中的第三位丹朱帝开始曾在南岳做官，就叫南岳。南岳的妻子女虔生了寿麻，说明寿麻是黄帝的孙子，寿麻国属于黄帝世系的部落。文中说，寿麻人站在太阳地上，正立无影，疾呼无响，这种情况只有处在北回归线的附近，气候非常炎热的地方才会出现。扶永发已考出寿麻国的位置："该国故地在今云南

西部耿马县西部孟定镇境内的孟定坝中。孟定坝为南定河宽谷盆地，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海拔在500米以下，南距北回归线极近，为热带季风气候。该坝是云南境内海拔最低的坝子，也是云南境内气候最为炎热的地方之一”（《神州的发现》1998年第2版，第37页）。寿麻国的考出，又为滇西为古代中国的载体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经文（40）：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即立，无首，厥咎，乃降于巫山。

经文说，有个没有脑袋的人，手里拿着戈和盾，站在那里，名叫夏耕尸。起初，成汤讨伐夏桀到章山上，战败了夏桀。夏耕尸因为冲在前面，成汤斩下了夏耕尸的头。夏耕尸没有头，也没有倒下，为了逃避罪责，就跑到巫山躲起来。

成汤伐夏桀是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重大事件，成汤战胜夏桀后，推翻了500余年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商朝。《山海经》记载的历史也就到成汤伐夏桀为止，并成书于商朝初年，说明它是中国远古时代的最早地理宝典。这段经文通过夏耕尸反映了成汤伐夏桀的历史，也反映了被推翻的阶级不甘心失败并转入地下斗争的社会情况。

经考，章山，指今云龙县宝丰乡境内的松坪梁子山。夏耕尸逃往的巫山，指永平县龙门乡与北斗乡之间的十山神山（现在改称石山神山）。

经文（41）：

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

经文说，有一个人，名叫吴回，只有左膀，没有右臂。

吴回，《大戴礼·帝系篇》中说：“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史记·楚世家》中也说：“帝喾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

后复居火正，为祝融。”这是说吴回是老童次子，其兄重黎任火正，被帝喾杀了以后，由他接替兄职，升火正，成了火神，称为祝融。这与前文“颛项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不一致。前文说重、黎为二人，上文说重黎为一人。史家对此也未作评说。我认为吴回因其身居火正，被尊为火神，才能入经记名，因此无论吴回的出身如何，他为古代火神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

经文（42）：

有盖山之国。有树，赤皮枝干，青叶，名曰朱木。

经文说，有一个部落，叫盖山国，那里有一种树，树干树枝的皮是红色的，树叶是青的，名叫朱木。

朱木，《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说：“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爰有……朱木，赤枝，青华，玄实。”这是说，在帝尧、帝喾、帝舜所葬的岳山，也有这种朱木，岳山已考出指今弥渡县寅街乡东南面的山。是知朱木所生的盖山国部落故址，即在古岳山——今弥渡县寅街乡东南面之山的附近。

经文（43）：

有一臂民。

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载：“一臂国，在其北（指在三身国北——笔者注），一臂、一目、一鼻孔。”是知，一臂民指一臂国的部落居民。文中一臂、一目、一鼻孔为一臂国在《山海经图》中的图形符号。三身国故地，在今云龙县大栗树乡驻地的大栗树村；一臂国的故址，即指今大栗树村南面的云龙县宝丰乡驻地的跑马坪。

经文（44）：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项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

经文说，大荒当中，有一座山，叫大荒山，太阳和月亮从这里落下。大荒山有一种长着三张脸，一条臂膀的人，是颛顼传下的后代，叫三面一臂人。三面人长生不死。这里就叫大荒野。

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不死民在其东（指在"交胫国东"——笔者注），其为人黑色，寿，不死。"两文互读，知不死民是一个部落名称，叫不死民国，三面一臂之人是不死民国在《山海经图》中的地理符号，不能理解为不死国的人都长着三张脸，一条臂，长生不死。经考，交胫国故地，在今大理州巍山县青华乡民强行政村的阿嘎村；不死民国的故址，即指今阿嘎村东面的巍山县巍宝山乡龙潭行政村驻地的谷波罗村。

经文（45）：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经文说，在西南的边境，赤水的南边，流沙的西边，有一个人，耳朵上挂着两条青蛇，驾着两条龙，名叫夏后开。夏后开就是夏启王，他三次到天上做客，得到天乐《九辩》和《九歌》，带下人间。夏启王在高达二千丈的天穆山上，根据天乐创作了《九招》乐典，开始在那里演唱起来。

西南海之外，指今滇西西南边境的保山地带；赤水之南，指怒江南部的保山一带；流沙之西，指保山市怒江西岸的坝湾乡；天穆山，指坝湾乡坐落的高黎贡山。古代夏启王就在这里的高黎贡山上创作了流行九州的《九招》乐典。

经文（46）：

有互人之国。炎帝三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能上下于天。

经文说，有一个部落，叫互人国。炎帝的孙子叫灵恝，灵恝生了互人，互人国的人能乘云驾雾，上天下地。

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郝懿行注曰："互人国即《山海经·海内南经》氐人国，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其他诠注家都认为互为氐之讹，应为氐人国。据各文互读，是知互人国即海内南经中的氐人国，它是炎帝的后裔氐人的氏族部落，人面鱼身、无足是氐人国在《山海经图》中的地理符号。建木是一种神奇的树，《山海经·海内经》载："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这是说，建木这种树是黄帝植造的，有百丈高，中间没有树枝，枝桠长在树顶，树下盘根错节，氐人国的人缘着它攀登上天。《淮南子·地形篇》又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这里就直接把建木写作众帝凭借它下地登天的神树了。且不论建木是不是神树，但建木为氐人国东部特有的高大树种，这是可以肯定的，据建木长在"都广"考之，《山海经·海内经》就有关于都广之野的记载，经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上文已考出后稷葬地故址，在今保山市河图乡红庙行政村西北的皇家坟山，从这里往东至澜沧江，就是都广野（即都广山）的范围，从"氐人国在建木西"考，建木树的故址即指今保山市瓦渡乡境内的澜沧江西岸，氐人国国邑就指瓦渡乡澜沧江西岸以西、今保山市金鸡乡驻地的金鸡村。

经文（47）：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经文说，有一条半枯的鱼，一半是人形，一半是鱼，据说

它是颛顼死后复苏时变化而来的。当时有风从北方吹来，把泉水吹得溢到外面；有条蛇趁机托体于复苏的颛顼，变化成了一条鱼，它就叫鱼妇。

这是一个神话。类似这样的神话写法，我们在以上经文中已经遇到不少，它反映了四千多年前古人对事物的观念与认识。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本质认识，但也还有许多事物不为人们所知，而困惑着人们。所以说古人那些神人共存共生的观念形态，我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总体上看，物质的本质的东西始终占据着《山海经》的主体地位，这样记实而无雕凿痕迹的典籍，才真实地反映了古人的观念形态及其所认识的地理和历史现象。

经文（48）：

有青鸟，身黄，赤足，六首，名曰鸀鸟。

经文说，有一种青鸟，身子是黄的，两足是红的，长着六个脑袋，名叫鸀鸟。

这种六个头的鸟，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也有记载，经曰："开明南有树鸟，六首。"我们在上文已经考出，开明是指管理昆仑山的大神陆吾，陆吾又叫开明兽，昆仑山指今大理洱海周围的苍山等群山。由此可知，鸀鸟也属于昆仑山上的一种神鸟，它们就栖息在昆仑山上天帝的宫殿南面的树林里。

经文（49）：

有大巫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

经文说，有一座山，叫巫山。有一座山，叫金山。在西南方，大荒的一角，还有一座偏句山和一座常羊山。

经文中记载的四座山，上文已提到三座，这里又重述一

次，以示重要。这三座山，一座叫大巫山，就是上面提到的巫山，又称灵山，指今永平县龙门乡与北斗乡之间的十山神山（现在改名叫石山神山），据说它是天帝在上面贮存了八库仙药、十巫师经常上下于天和采药的古代名山；一座叫金山，就是指前文所述的金门山，指今永平县境内博南山东面的主峰，据说它是天的枢纽，是天虞神和天犬所在的地方；一座叫常羊山，就是前文提到的常阳山，指今永平县果郎乡天竹行政村境内的小五宝山（原来的山名叫太阳山），它是古代记为太阳和月亮运行的方位山，称为“日月所入”之山。

偏句山，初考指今永平县龙门乡李子树行政村境内的巴拉场山。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要说明，自从扶永发先生新著《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在 1992 年问世以来，我曾将扶著与《山海经》原著互读过六遍，每次都写下读书笔记，并尽可能地利用征集文史资料之便，到怒江各地进行访问考察，加深自己对两书及扶氏神州发现的理解。现在我将批读两书的笔记及所作的考察整理成“试读”拙文，目的仅仅是向读者介绍扶氏神州发现的观点以及怒江与古代神州的关系，为读者亲近《山海经》原著及扶著，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文中有对扶氏的发现理解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扶永发先生和读者赐教指正。

（原载《怒江方志》2000 年第 43、44、45 期）

后　记

1989年冬，我到兰坪县澜沧江沿岸作古浪峨人族源追踪考察。路过金顶镇文兴街时，顺道登临街后二五山游憩。无意间于“三圣宫”古刹里发现扶永发1989年8月10日题写的木牌，上书红漆大字“轩辕黄帝故里”，引起浓厚兴趣，随后陆续读到扶先生研究《山海经》的系列文章及所著《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自此成为扶氏神州新发现一家之说的追随者。十余年来，我以《神州的发现》为导引，通过对《山海经》求索、考证，深信扶氏关于《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山即指滇西之横断山脉、远古神州中国发源于滇西横断山脉地区是一个重大发现，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

虽然目前对扶氏之说公开著文支持者还不多，但是古往今来，但凡一个重大科学发现的认同与论定，总要经历许多曲折与磨砺和时间的考验，何况扶永发神州的发现是关系中华民族起源历史的大事。有着这样的自信，也就不揣浅薄，把自己多年学习和研究《山海经》所写的拙文嵬集成书，奉献读者。本书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对扶氏之说的关注与讨论，也就是愿足矣。

敬请大家赐教。

作者